

長壽湖

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

譚松 采写

一九五七



谨以此书
祭奠歿于重庆长寿湖的右派亡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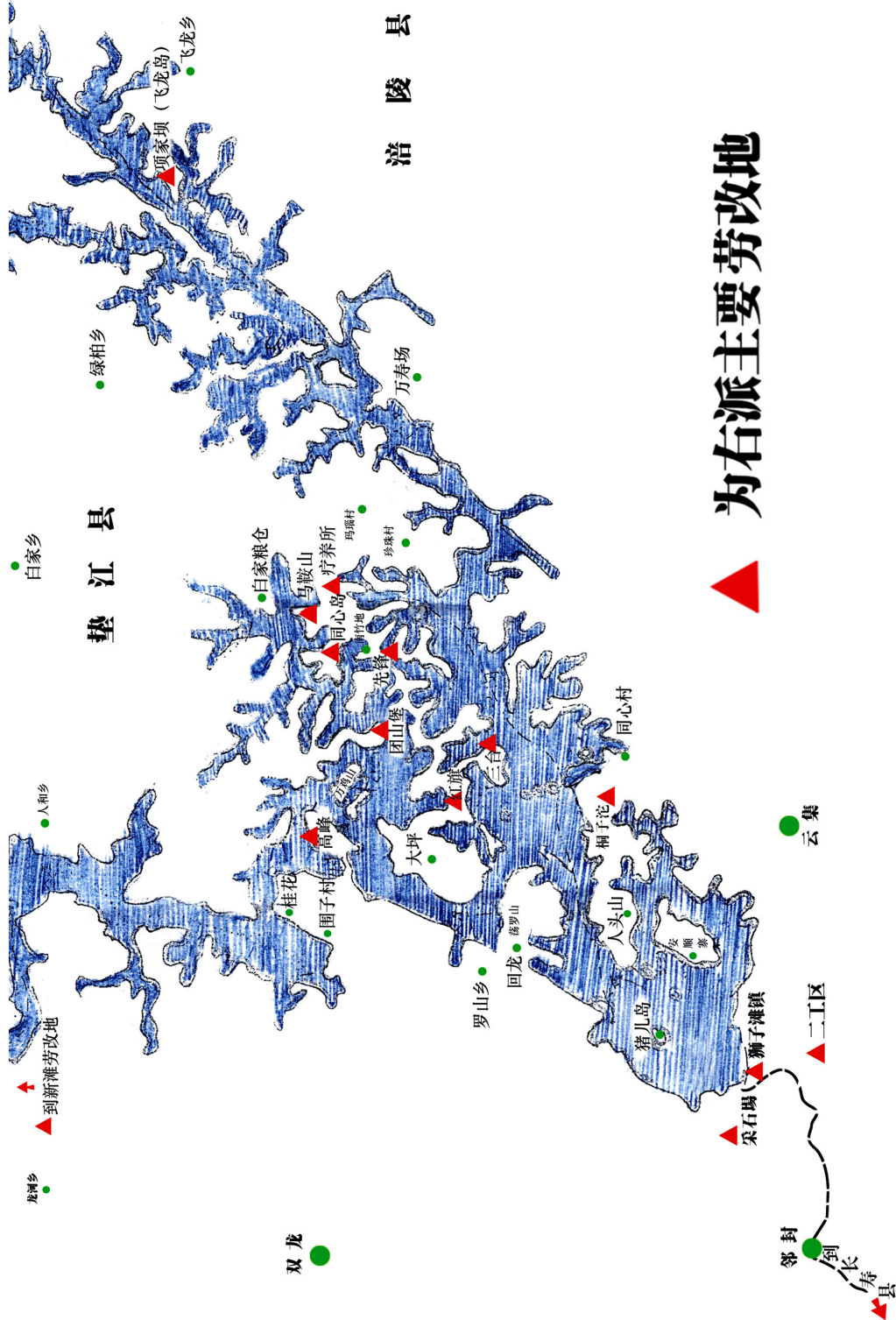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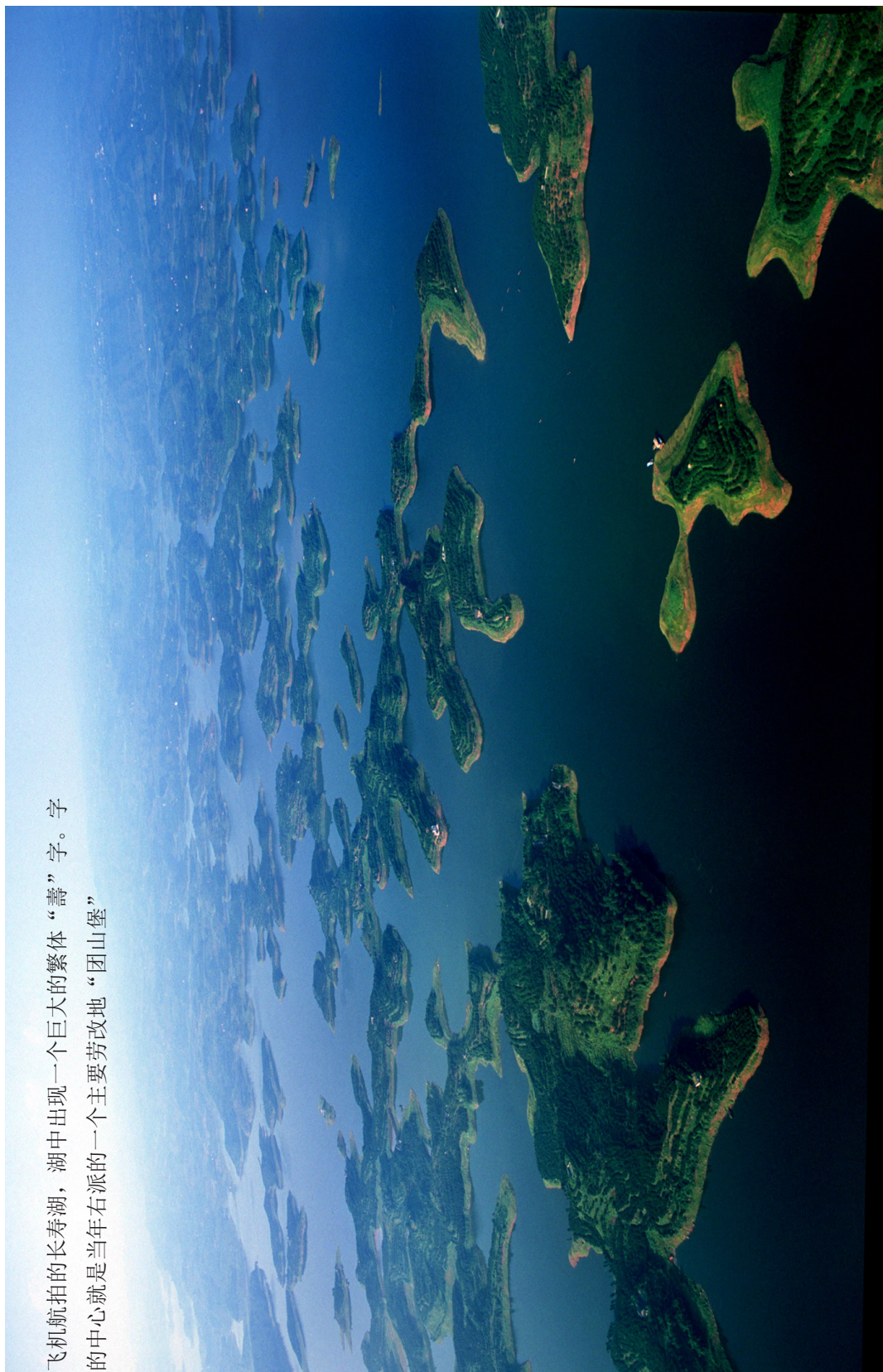
一个历史罪恶的记录，就是一个沉重的现实警告。
对一个行使权力的统治者来说，最沉重、最无情的
莫过于历史罪恶的记录。

——夹边沟记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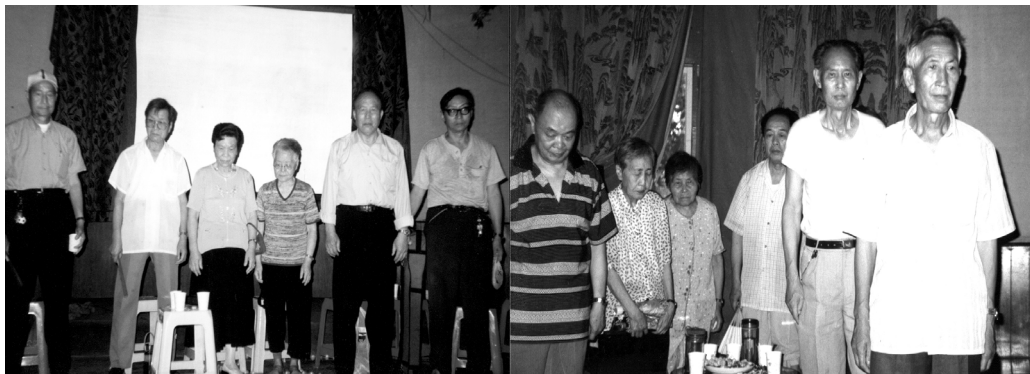
长寿湖示意图



飞机航拍的长寿湖，湖中出现一个巨大的繁体“壽”字。字的中心就是当年右派的一个主要劳改地“团山堡”



深切悼念去世的长寿湖难友



2002年6月11日，长寿湖幸存右派在长寿湖猪儿岛为当年去世的难友默哀

五七莫須罪，齊囚長壽湖，山城赤子
難忘，勞改二十年，血汗流遍荒島，鬥爭
伴隨苦難，青春去不返，湖水葬孤魂，
遺恨有誰憐。

長壽湖右派白永康遺作
癸未長壽湖右派范廣文書

部分长寿湖右派劳改地

长寿湖方圆 245 平方公里，拥有大大小小 200 多个岛屿，其中一些作为右派集中劳改地，主要的有同心岛、高峰岛、三台岛、飞龙岛、先锋岛、团山堡等。



三台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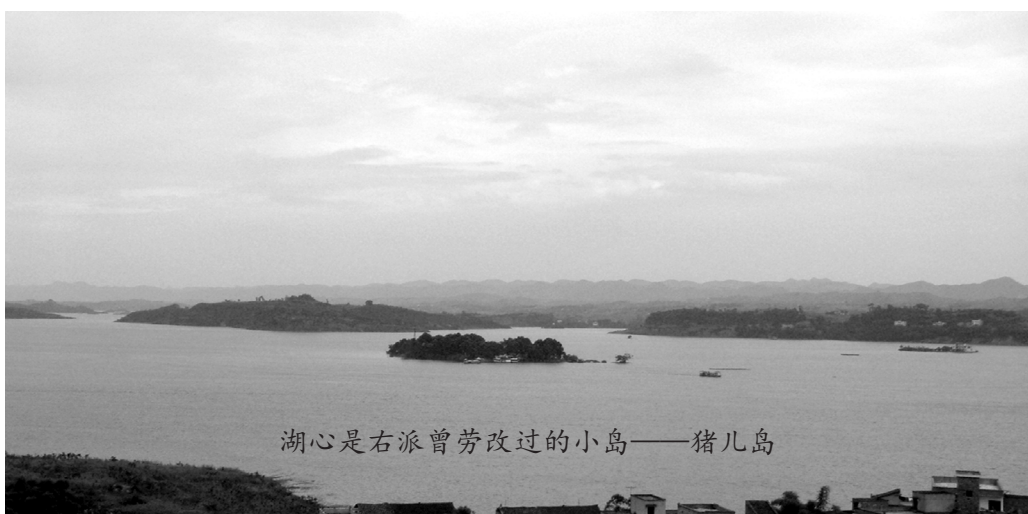
同心岛



高峰岛



新滩



湖心是右派曾劳改过的小岛——猪儿岛



长寿湖右派主要劳改地之一 ——狮子滩（李文书摄于1960年）



红旗后湾



石高滩

石高滩



芦剑滩

芦剑滩



门坎滩

红旗后湾、石高滩、芦剑滩、门坎滩的图片来自光碟《长寿湖我们怀念您》

长寿湖右派劳动



长寿湖右派捕鱼（李文书摄）



长寿湖右派劳动（陈华摄）



长寿湖右派李文书犁田



长寿湖右派劳动（陈华摄）

右派当年住过、生活过的地方



当年右派住过的房子（位于团山堡）



当年右派住过的房子（位于同心岛）



右派当年的养猪场（位于飞龙岛）



饥荒年建的疗养院（位于同心岛）



飞龙岛上开批斗会的地坝



先锋岛队部

在通往苦难记忆的路上，荒草不再生长！

长寿湖部分幸存右派合影



长寿湖幸存右派中，有四人永远留在了长寿湖，成了长寿湖最后的“守墓人”——李长文、冉德瑜、余洪洲、李宁熙于长寿湖团山堡劳改旧地前（2003年6月）



（男）前排左起：李国元、赵子生、陈孟汀、张学渊。

后排左起：张元任、邓家齐、朱恩源、张汝闾、顾大铭、郑光全（1988年）

（女）前排左起：陈敏戎、闵淑群、李多明、陈思贤、胡甫琳、陈朝芳、潘明信、戴学珍、李武珍

后排左起：徐显镛、廖品云、胡庄、王义珍、刘曼若、陆远富、杨映雪（1988年）



长寿湖右派“改正”十周年时（1988年）部分难友第一次聚会。



谭松在长寿湖采访（2001年11月）

夕阳沉下去了，青春、理想、爱情，连同100多个鲜活的生命，也沉下去了。没有坟茔，也没有墓碑，我目光穿透冷冷的湖水，灵魂长跪在无碑的岛前，冷寂苍穹里，有杜鹃啼血的声音——

——长寿湖，一定要建一座文字的纪念碑！

（谭松，2002年6月）

中华民族百年的血泪沧桑啊……

我不幸看到了你喧嚣下面沉默的真实；

我有幸读到了你遗忘后面苦难的记忆。



长寿湖夕照（陈华摄于1962年）

历史在继续

——《长寿湖：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序

钱理群

长寿湖，长寿湖，从1956年起，你静静地流淌到今天，你的身边，发生了多少泣血的故事，你见证了怎样的历史沧桑！

放下这本《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我的眼前，总是浮现着两个历史场景——

1969年某月，长寿湖畔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右派分子白永康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的全部“罪名”就是在私人日记里写了“反动诗”。

2002年7月，右派分子谭显殷的儿子、青年作家谭松被重庆市看守所关押，据说是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证据是他采访了长寿湖的右派，记录了当年的历史，“专门收集新社会的黑暗面”，这就是“同一个强大的专政机器对抗”。

时间相距三十三年，历史仍在继续……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自称“太平盛世”，却和二十世纪后半期一样，大兴文字狱，因言或文获罪似乎成为常态。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依然被视为“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的对象，只是变换了罪名：当年叫“反革命罪”，现在则强加“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就表明，三十多年来，中国虽然有了进步，但一党专政的观念、体制却没有变：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且是中国的基本现实。那些企图用“经济决定论”的逻辑，以经济的发展来掩盖表面繁荣下的血腥，痴谈“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人，不是糊涂，就是蓄意的欺骗。

但我们还是发现了内在的力量与心理变化：如果当年的镇压者自恃有强大的专政机器，敢于大言“镇压有理”，似乎理直而气壮，那么，今日之统治者们再以此相威胁，就给人以声嘶力竭之感。一本《重庆长寿湖右派采访录》，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作家，就让他们如临大敌，兴师动众，足见其色厉内荏，虚弱得可笑。

相反，今天的被审问者，却挺立在历史的法庭上，对镇压者进行大义凛然的历史审判，这是一个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所谓“历史在继续”，不仅是指专制体制镇压人民的历史在继续，更是人民的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反抗的历史，还在继续，而且更加自觉。

把本书的写作与出版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这是这些年民间方兴未艾的“拒绝遗忘，见证历史”的书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成果。无数的历史受难者，在饕餮之年，或动笔，或口述，留下了他们亲历的历史和反思。这见证性写作，如历史研究者所说，它是“积极的，反抗的，它拒绝孤独，也拒绝顺从”，“积极地争取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见证不是私人心理上的一架情感天平，而是公共认知的一个道德法庭。在这个法庭上，不仅苦难经历者作见证，而且整个正义社会也是列席的证人，

见证者以全社会和全体人类的名义呼唤正义，为的是不让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灾害发生到任何别人身上”（徐贲：《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写作》）。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书写，不仅见证了历史的惨烈，而且留下了历史的精神。正像本书的作者一再感叹的那样，“我怎么老是在一些七、八十岁老人身上看到久违的正义、久违的良心、久违的勇气？”“难道，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确实，在“共产党用红艳艳的谎言欺骗了老一代，又用金灿灿的利益（物质）败坏了新一代”（作者语）的历史与现实下，走出欺骗的大泽，有了觉醒的老一代的经验和在炼狱中升华出来的精神，对于被利益败坏的年轻一代，是一个重要的警醒，如果老一代的精神能够为新一代所了解、继承和发展，是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的。这也是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本书的作者，是右派的后代，是一位当代青年，这本身也有重要的意义。本书的一位受访者、长寿湖老人韦绍新“抖抖索索”地在作者采访本上写下的这段文字是具有震撼力的：“我为有你这样的青年感到骄傲，为我的亲密朋友谭显殷有这样的后代感到自豪”，“我佩服后代人比我们勇敢。我已年老并身体不行，否则真要同年青人一起战斗，直到我们的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为止”。本书作者的感受和回应也同样扣人心弦而发人深思：“我大汗淋漓地走出死亡和新生共存的医院，身后，分明感到传来一种召唤，一种无声而深沉的精神感召……”这样，这本书就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历史回忆记录的范围，而应该视为两代人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精神对话。本书的“采访记”与“采访后记”是形成了一种结构的，将其对读，能够引起我们的无限遐思，本书也就具有了深长的历史与思想的意味。

还要说及的，是这些右派老人，不仅写历史，更直接参与现实的抗争。我曾经说过，在当代中国，有三大民间运动，即维权运动，网民运动和志愿者运动。这些运动当然是以中青年为主体，但其中也活跃着老一代人。北大和全国各地的右派老人的维权活动，已经构成了中国维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人所瞩目。在我看来，这正是1957年“五·一九”校园民主运动的一个继续，至少是存在着精神上的连续性的，这本身就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永远“打不死”的抗争精神，永远“熄不灭”的民主火种，由这些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所始终坚守，实在令人感动，不能不肃然而起敬意。它必然为年轻一代所继承和发扬。

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

2011年4月10日

前言

1956年，重庆市长寿县狮子滩镇修起了一条拦河大坝，两条河水被阻断，形成了一个拥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子的人工湖——长寿湖。

长寿湖距县城30公里，县城距重庆约100公里，当时交通不便，广阔湖区是只有毒蛇豺狗而无人踪的野荒之地。

1957年底58年初，刚诞生的长寿湖派上了用场——作为劳改之地接纳由重庆市吐出的部分“阶级敌人。”于是，627名以“右派分子”为主，“历反分子”（历史反革命）为辅的“劳改大军”先后被解押进岛，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他们中的百余人未能活着离开长寿湖，饥饿、劳累、殴打、疾病、批斗、自杀等等，使他们鲜活的生命无声无息消亡在湖光山色之中。

除此之外，长寿湖还先后接纳了1030名“下放干部”（绝大多数是被认为有各种“问题”、不受信任的干部）和1455名青年学生（几乎全部是所谓“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这两类人中也有人在长寿湖献出了生命。

40多年过去了，长寿湖早已成为重庆市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天，龙凤呈祥的花彩游船满载欢歌笑语的红男绿女，嬉湖水、赏青山、摘橘子、品鱼虾……

农家乐的炊烟香气四溢，富豪们的红楼星罗棋布。看不见22年漫漫血泪，听不见无辜冤魂声声悲鸣。没有坟茔、没有墓碑、没有文字，没有哀悼、没有祭奠、没有反省。举目四望，唯有岛上满山翠绿果林，是当年右派们的“遗物。”

可是，有谁知道那是右派们的“遗物”呢？

40多年过去了，老的一代逐一“谢幕”，带走了一曲曲悲欢离合。

40多年过去了，新一代满目金黄，看不见一段段千古奇冤。

40多年过去了，泪揩了，血消了，历史真相被掩埋在谎言和遗忘之中。

……

2001年初，我开始走访当年的幸存者，决心要找回那一个即将被岁月淹没的“长寿湖。”

历史，不能只记住“1957”这个年代符号，不能只记住55万这个（官方的）人头数字，不能只记住“阳谋”这个鬼怪名词，不能只记住“章”、“罗”、“储”几个著名人士。

历史，还应当记住千千万万祭献给“阳谋”祭坛上的无辜小民，记住他们破碎的家庭，记住他们断裂的爱情，记住他们流泪的母亲，记住他们悲苦的妻子，记住他们不幸的子女。

最重要的，是让子孙后代记住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一幕不可思议的荒唐、那一幕亘古罕见的奇冤、那一幕难以想象的残酷。

记忆和记录，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爱——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天空不再黑暗。”

谭松 2003年12月31日于重庆

目录

序言	13
前言	15

一，夫妻右派

在长寿湖，有夫妻双双劳改的右派，也有在劳改中结为夫妻的右派，这儿是其中的七对：

一、一个善良而漂亮的女右派	22
二、那罪名惊出我一身冷汗	29
三、一分为三的骨肉亲情	30
四、一次不幸的亲眼目睹	36
五、长寿湖，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右派	44
六、我栽在“向党交心”运动	54
七、一九五八年，三口之家一分为三	60
八、我十次大难不死	63
九、一个十四岁小女孩的“历史问题”	66
十、长寿湖也有美好回忆	69
十一、我原本不会当右派	72
十二、我那时很年轻	73
十三、都怪读了胡风的几本书	76

二，瞧这一家

长寿湖“分子”李长文、冉德瑜的一家。

1949年进入“新社会”后，这一家中先先后后有8人“非正常死亡”：

一、一听“毛主席万岁”就反感	80
二、丈夫——枪杀，女儿——饿死	84
三、她被“狗”咬死	91

三，老革命

有一群资历深长的“老革命”，他们也被“阳谋”的血盆大口吞噬。

- 一、一个死不认罪的顽固右派·····96
- 二、敢坚守良知？判20年劳改！·····99
- 三、一个大难不死的幸存右派·····108
- 四、投奔延安、热爱艺术的代价·····123
- 五、长寿湖又一个延安老革命·····132
- 六、“好哇，你要杀毛主席的头！”·····135
- 七、我整整跪过二十四小时·····139

四，文人墨客

当年，这些诗人、作家、记者，笔走游龙，口吐莲花，何等英气才华！
忽喇喇一阵阴风刮过，长寿湖上，坠下一群“落毛凤凰”。

- 一、一个毛主席赞扬过的著名诗人·····143
- 二、被“改造”成驼背的记者·····148
- 三、对党爱得要死，被党整得要死·····150
- 四、一对夫妻记者的遭遇·····154
- 五、长寿湖学历最高的右派·····159
- 六、我因“不爱说话”当了右派·····161
- 七、因真话惹祸，靠假话获益·····163
- 八、杀人与划我右派，就这么简单·····166

五，海外归来

1949年，一个崭新的王朝站立起来了！

芸芸海外赤子，捧一颗滚烫的心，跨越万里风尘·····

几十年过去了，苍茫大地，乱坟凄凄，荒烟袅袅·····

几个幸存者，吁吁残喘，抚遍体伤痕，满面泪迹。

- 一、搞什么航天飞行？喂猪去！·····176
- 二、投奔“新中国”，换来终身悔·····182

六，工会（厂）干部

重庆市工会和工厂里的中箭落马者：

一、1957年，我憋了一肚子不满·····	190
二、“工团主义反党分子”·····	195
三、宁可错抓十万，不可放过一个·····	197
四、长寿湖的“守墓人”·····	201
五、当右派，只因书记想让我走人·····	204
六、一念之差，毁了一生·····	206
七、不写是对党不忠诚·····	211
八、最不幸的是我的妻子儿女·····	215

七，技术人员

当年岁数大的，没能等到今天的采访，这儿只有三个当年的年轻人：

一、不说假话？定个顽固右派！·····	223
二、活到这把年龄，憋得要死·····	227
三、毛主席说，5%的人是坏人·····	231

八，舞台人物

文艺团体中的右派分子不少，但好多都没能熬过那段岁月。幸存者似乎大多看透了人生这幕荒诞剧，不愿向一个后来者掀开那一角沉重的幕布。拒绝者继续沉默，接受者大多话语不多。

一、唱了几首歌，坐了20年牢·····	238
二、一辈子都记得你共产党·····	248
三、解放前我敢说，现在我不敢·····	252
四、幸亏江青没找到我·····	254
五、“改造”就是让人变成奴才·····	256
六、那时我年轻，麻麻哈哈·····	258

九，逃亡者

长寿湖没有高墙铁网，刺刀哨兵，然而，劳改分子中鲜有逃亡者。20年漫漫岁月，纵然大悲大苦、九死一生、沉湖上吊，亦不越雷池半步。听了李文书的经历，我于是明白：“毛泽东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其独特的时代。整个国家在这个时代里被整合成一块无孔无缝的大铁板。“分子”们纵然逃出

长寿湖又怎样？面对的，是一个 960 万平方

- 一、一个长寿湖逃亡者的自述.....264
- 二、一个长寿湖逃亡者的经历.....277

十，国家干部

他们，曾是无限忠于共产党的好干部：

- 一、牛比右派宝贵.....306
- 二、十三岁的“集团军司令”.....310
- 三、我不想入党，又说了一句俏皮话.....316
- 四、书到用时方恨少.....320
- 五、指标正好没用完.....323
- 六、还有两个右派名额.....327
- 七、敢仗义执言？劳改 20 年.....329
- 八、要推翻共产党，我愿意去干！.....332
- 九、“陈初蓉，打！”.....335
- 十、简直是法西斯专政！.....337
- 十一、一个中了“毒”的北大才子.....340
- 十二、30 元补助与 20 年劳改.....344

十一，唉，教师

在长寿湖的“分子”中，教师群体人数众多，死亡人数也众多，今天，幸存者中心有余悸的也众多。这似乎是一块最重的灾区。

- 一、这辈子完了，下辈子还教书.....353
- 二、吃饱饭比什么都重要.....360
- 三、这是劫难，没办法.....366
- 四、沉默是金.....369
- 五、我哪里敢说话？.....370
- 六、那 4 斤 8 俩四川粮票.....373
- 七、我仍然害怕.....386
- 八、她死于“改正”前夜.....388
- 九、在孤独中消殒的高贵生命.....392
- 十、一个“起义右派”和一个“内划右派”.....404
- 十一、“孤岛风雨夜，凄然囚徒心”.....406

十二、早知如此，我就跟国民党走了！	410
十三、长寿湖是人间地狱！	414
十四、竹子有节不能卖	417
十五、从“洋买办”到“6835”	421
十六、“铁马冰河入梦来”	426
十七、吃人的“黄狼将军”	430
十八、不批斗右派丈夫的代价	433
十九、那件血衣，我保存了好几年	438

十二，“另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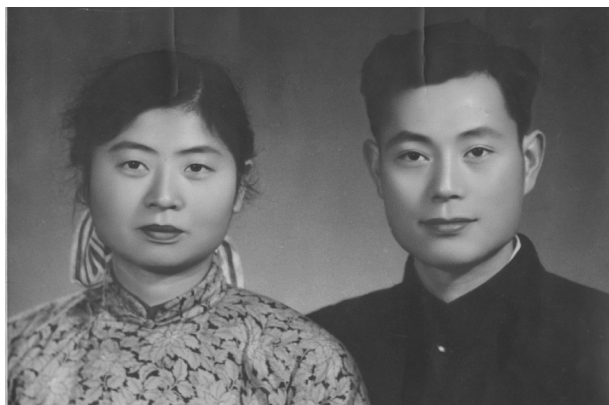
他们不是“分子”，而是“分子”的妻子、子女，
也有长寿湖的农民、管教干部、学生和下放干部。

一、一个有良知的管教干部	455
二、风雨人生——我在长寿湖的经历	458
三、长寿湖，我的那些右派恩师	469
四、飞龙岛上的老农	478
五、在苦难中坚守	482
六、1967年，我两次在长寿湖见到父亲	485
七、那血泪横飞的一堂课	488
八、我走向父亲死亡的地方	492
九、我一想起就头昏	497
十、一个将门后代的遭遇	500
十一、父亲，我看你来了！	515
十二、“解放”后，我们全家的遭遇	522
十三、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	527
十三，一个女右派的九死一生	532
十四，一个右派的逃亡之路	541
十五，我其实很幸运	564
十六，后记	581
十七，墓碑	593

一、夫妻右派

在长寿湖，有同为右派下放劳改的夫妻，也有在劳改中结为夫妻的右派，这儿是其中的七对：

- 1、王义珍、 陈大中
- 2、李武珍、 蒋维亮
- 3、刘曼若、 张慧光
- 4、朱培德、 赵瑞珠
- 5、练冰梧、 熊先尧
- 6、李多明、 陈 欣
- 7、罗成溶、 刘 焰



王义珍、陈大中结婚照（1962年）

一个善良而漂亮的女右派

王义珍

1957年重庆南温泉疗养院医务人员

1935年生



我这个人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要求“进步”，我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音乐艺术，1957年之前，我成天嘻嘻哈哈，性格十分开朗。

那个时候，经常进行政治测验，凭良心说，我不是不努力，我其它测验都很好，就是政治时事题考不起，硬是考不起，考一次败一次，不及格。不及格就要把姓名登在黑板报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王义珍，没得啥子嘛，书记还不是每次都没及格。”

我们书记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

我一听，不服气了，说：“那为啥子不公布书记的分数，不把他的名字上黑板？”

把我打成右派当然不是以这个罪名，他们抓住我说过“报纸上有很多假话”给我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的的确确说过那句话，那也的确确是事实。

斗争我的时候，要我交待反党的思想根源。我没有“根源”，不晓得哪个说，憋得满面通红，只好反反复复地说：“是嘛，是嘛，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过不了关，非得交待为什么要反党？为什么仇恨社会主义？动机、目的等等。前面有个右派交待得很好，深挖思想根源，我想照着他那样说，但刚说两句就混乱了，照着说我都说不来，没办法，只好连连说：“我错了嘛，我错了嘛。”



1956年，为庆祝“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王义珍（疗养院文艺队队长，右一）率领文艺队从南泉步行到李家沱。

挖不出“思想根源”，被认为是顽固抗拒，把我判为极右，发18元生活费，是我们单位几个右派中处罚最重的。当然，也有我出身不好、哥哥在香港的因素。

下放长寿湖之前，我绝望得很，认定这辈子完了，再也回不了这个城市。临行前，我把毕业文凭、获奖证书、

私人信件、日记本等全部烧毁。我没有成家，也没有男朋友，只有一个妈妈（后妈），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亲人。

下长寿湖后，我先在狮子滩打石头——男右派打，我扶钢钎。在长寿湖，我看到很多老革命、学者、专家。我心想，既然这么多优秀人物都是右派，我这个政治上落后的人也算不上冤枉了。陈孟汀（原重庆市文教部部长，右派）就冲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划不来（意为“冤枉”），我们这些为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都到这儿来了。”

打了一段时间石头，我被派到湖里面最偏远的的一个点（飞龙岛项家坝）开荒。那里没有灯，没有房子，睡在草棚下的包谷杆上，我天天去担土来造简易的泥巴屋。收工后，还要下到湖里去挑水做饭，那段日子与世隔绝，像回到原始社会。

不久，派我到三台岛喂猪，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意重大。首先，喂猪可以偷吃点猪食，配给猪的精饲料有胡豆、红苕。大饥荒那几年，这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妈的命。我妈在重庆活不下去，到长寿湖找我，帮我喂猪，吃口饭，当然也吃点猪饲料。我和我妈都活下来。其次，我在猪场解决了终身大事。

猪场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叫陈大中，是市机械局的右派，在猪场负责打扫粪便、修补圈栏、割猪草。他手脚勤快，干活卖力，人也善良，但是他情绪很低沉，唉呀，太低沉，成天闷闷不乐，也不多说话。我性格开朗，爱唱爱跳。我看到他太消沉，想影响他一下，一来二往，产生了感情。

我们俩虽然一个消沉一个开朗，但旗鼓相当的地方很多。首先，我们都是右派，地位相等；其次，家庭出身都不好，门当户对；第三，都因为一句话落难，本是同根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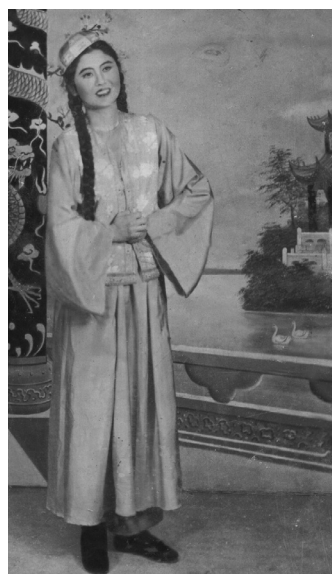
但是，我们是右派，结婚必须要领导同意，领导要不同意，打死我也不敢。

在长寿湖那种困难环境下，我遇到了不少好人，管我们猪场的陈大姐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下放干部，离了婚，前夫也是右派，她对我们比较好，不整人。我们几个对她说：“你不做事，活我们干完，我们遇到啥子事你帮我们解决。”

我找她“帮我解决”的事就是同意我结婚。她很痛快地就同意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你不明白，她要是不同意，我说不定一辈子单身了，我不敢结婚，真的，你不明白。

1962年，我同陈大中结了婚，我27岁，他28。

那个时候物资供应还很匮乏，我们凭结婚证购买了一个热水瓶，一个脸盆，几斤水果糖。我们回重庆结的婚，在我妈妈的那间小房间里，请左邻右舍吃了几颗糖。



“庆祝”之后王义珍
着装留影 1956年



王义珍、陈大中婚前在
三台岛养猪场队部前留影。

结婚后刚刚半年，市机械局就下令把该局在长寿湖的右派全部召回。我们两个又喜又忧，喜的是，回去当然好，忧的是我回不去，新婚就得分离，而且我已经怀了孕。

陈大中：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在机械局的朋友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会难得，先回去一个，再想办法调另一个。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在1963年春回到重庆。

王义珍：这一分，就分了12年。1963年我生了儿子陈小峰，我每天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带不了儿子，只得把他送回重庆。我每年春节探亲，见他们父子俩一面。

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长寿湖的右派来说，是最最重要的日子。我们最最担心的，就是监管人员以种种理由，最常见的就是“改造不好”，不准探亲。（注：五一校的右派李恩章就因这个“罪名”整整七年不准探亲。）

有一个叫聂承奎的右派（市委办公厅右派，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管教干部先不准他探亲，大年三十天黑后，领导大概是吃得愉快，心情好，突然对他说：“你走嘛，回去探亲。”聂成奎回家心切，连夜出发，为了赶第二天到重庆的船，他步行往长寿走，60多里路，半夜时走不动了，蹲在一家农民的屋檐下，冷抖抖的过了一个年三十。

我也有一次连夜步行的经历。那是1969年1月，我们一帮右派，十来个人，从飞龙岛出来，在狮子滩等第二天的车到长寿。当天晚上，突然有个人来给我们报信，他说：听说上面刚刚来了一个文件，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今年春节右派分子一律不准探亲。

我们立马慌了手脚，乱成一团。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探亲了，去年春节，也是因为文革，不准探亲。我们一群人中有几个很有斗争经验的人，如曹贞干、李普杰、高志长等，这一帮团市委的右派脑壳好使。他们召集大家紧急商量，李普杰说，我们离开飞龙是经过批准的，不违规，现在没得到正式通知，走了，怪罪不到我们。所以，必须赶快离开狮子滩，步行到长寿。

大家一致同意。

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60多里路，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年货，大背兜、小背兜，沉甸甸的。最麻烦的是我，除了鱼鱼虾虾、红苕干、豆腐皮等等，还背得有我的小儿子陈伟，他才两个月。他们非常关心我，把我所有的年货全部分担，一个人分一部分。李普杰说：“王义珍，娃儿只能你一个人背，背不背得动？”我说：“背得动，背得动。”他们不放心，跑去找了一把秤来，一称，娃儿连皮（包裹）一共15斤。我说：“15斤，得行，得行。”他们还不放心，说：“路上没人换你哟，你不要小看15斤。”

多年来，我都记得他们。

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寒风冷嗖嗖地吹，我们十来个右派大包小包，背兜箩筐，急急匆匆往县城赶，一路走，一路担心有人追上来。我儿子很乖，不哭，但越来越沉，我咬紧牙一声不吭，大家憋足了劲要回家，我不能拖后腿。高志长人高马大，挑着担子虎虎虎的在前面走得没了影，喊遭不住的是成中霖（西南政法学院右派），我们叫他“老翘脚。”他年龄大了点，东西又多。还抱一个大菜板，一路上他老叫歇气。我们说，你把菜板丢了嘛，又不值钱，他舍不得，说走都走了这么远。

曹贞干脑瓜灵，但挑力不行，他不停地换肩，喘气，从箩筐里拎出一网鸡蛋，抓出几个，想扔，掂了掂，又放回去，挑上担子再走，实在走不动了，又把鸡蛋抓出来，还是舍不得，

如此好几次。还有一个右派杨健，半路歇气时，掉了一条羊毛围巾，走了一阵才发现，他心痛得要死，要返回去找，我们好容易劝住他，他垂头丧气，路都差点走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走到县城，累得东倒西歪，赶紧找了一个招待所住下。不一会，有人跑来说“快点快点！老翘脚不行了，倒在厕所里。”我们慌忙跑出去。“老翘脚”和另一个右派上厕所，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那个右派挣扎了半天才出来，但“老翘脚”硬是没办法。他们几个男的进去把他抬出来，他面色惨白，狼狈不堪。有人说：“老翘脚，你要是把那个菜板丢了嘛也要松活点嘛。”

在县城，仍然害怕长寿湖的人追上来，现在拦回去就太冤了。我们眼巴巴的盼船，每分每秒，真的是度日如年呀……

到家后第三天，长寿湖又有探亲的右派回来了，他们说：“根本没那回事，你们虚惊一场。”

我们几个右派都说：“不后悔！不后悔！”

那些日子里，一点关爱就可以拯救一个人，让人终身难忘。

文革初期，我在飞龙岛劳动，一天，突然来了一帮人，抓我到三台岛批斗。我在三台岛喂猪的时候，渔场的一些小青年听说我文艺方面比较在行，找我帮他们编排文艺节目，我请示了管教人员，同意之后才去的。文革一来，有人揭发说：王义珍教革命青年拉二胡，拉的反动曲子“梁祝。”造反派认为，我同那些青年相处得很好是违反了“阶级斗争”，我是坏人，必须抓去斗，肃清流毒。

船到三台岛时，天已经黑了，我看见上面屋子里灯火通亮，听见一阵一阵的喊打喊杀声，长寿湖夜晚寂静，声音十分震耳十分恐怖。我吓得全身发软，双脚打颤。我望着上面屋子里透出的灯光，觉得命要丢在那点，狮子滩的批斗会上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我想到陈大中，想到我儿子，他们在重庆……

那一坡石梯坎，我硬是走不动，差点瘫倒在地上。

（注：我曾经三次登上三台岛，那一坡窄窄的石梯还在，上面的屋子已面目全非，四下一片寂静。我顺着那坡石梯往上爬，眼前活鲜鲜地出现一个年轻女人，她善良、漂亮、柔弱、无助，在黑漆漆的夜空里浑身发抖，像一只羔羊，走向灯火通亮的屠场……）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不要怕，他们是要吼的，没做的事你不要承认。”这几句话你现在听起来很一般，但那个时候我



杨健和他后来在长寿湖农村娶的妻子



王义珍（前排右一）在三台岛与青年学生打成一片

要沉下去了，一块小木板就可以救我命。他的话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一下子就不发抖了，真的，很怪，我不再抖了，爬上坡走进了会场。

这个人叫顾华银，是下放渔场的学生。

在长寿湖，我同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一带缺医少药，农民听说岛上有个女右派是医生，纷纷找上门来，管教干部批准后我就去给他们看病。我是无偿劳动，没一分钱报酬，还要担很大的风险，万一救治中出了问题，肯定要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为了保险，该开三片药的我只开两片。农民朴实，你对他好，他巴心巴肠报答你，才不管你右派不右派。文革我挨斗后，不准我再去看病，把药也封了。农民不管那么多，照样找上门来。有一次，一对农民夫妇急匆匆赶来，我知道是找我，赶紧躲进屋。

管教干部把他们拦住。农民说，儿子病重，要找王医生。管教干部说：“啥子王医生？她是坏人，你们晓不晓得？”

农民说：“那不管，我们只晓得她能救我儿子。”

“救儿子找公社卫生院。”

“公社看不好，非要王医生。”

“给你说了她是坏人。”

农民冒火了：“啥子坏人好人？我是贫下中农，是啥子人？！我儿子要是死了，告诉你，我要找你负责……”

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听他们吵，心里很难过。我究竟是个什么坏人？娃儿要死了，当医生的不准去救？

最后，在农民的威胁下，管教干部让步了。我背着药包出门时，他一脸恼怒地瞪着我。

我在长寿湖21年，前前后后救治了多少人早记不清了，但农民记得，他们至今对我非常好。前几年，我小儿子结婚，专门到长寿湖度蜜月，十多天时间，每一顿饭在不同的农民家里吃，农民排着队请我们，一大早就来等，生怕等不到。农民拉着我儿子的手说：“当初没有你妈就没有我儿子，右派，好哇，好，右派。”

当然，长寿湖也有专门整人的人，有一些就是右派本身。有一个叫XXX的右派，劳动时悄悄记下大家说的话，唱的歌，然后向管教干部汇报。XXX以前被别人整，她认为只有整别人自己日子才好过，果然，她后来混得不错。

陈大中：共产党就喜欢这种人——汇报别人、整人的人。

王义珍：小儿子跟我住在长寿湖，大儿子跟爸爸住在重庆。我除了喂猪之外，还要出去看病，经常忙得昏天黑地。我把儿子放在一个箩筐里，给他盖一个小棉被，锁上门，任他哭。有一次回来，看见他两只小手乱舞，脚乱蹬。我仔细一看，他把小棉被咬烂了，吃进了一嘴的棉花，我骇得心都差点跳出来，要是棉花堵了气管，他这条小命就报销了。

大一点之后，我把他放在背篋里，在墙上打一根钉子，一根绳子栓在他身上，另一



王义珍护校毕业留影
(1955年)

头系在钉子上。我没有其它办法，只有晚上回来，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母爱。

他长到四岁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送回重庆。岛四面环水，粪坑又多，他活蹦乱跳，掉下去怎么办？

（注：长寿湖“分子”尹从华的小儿子就是掉到湖里淹死的。）我总不能把一个四岁的男孩栓在钉子上。

我把他送到重庆，陪他住了两天，走前的一晚，我彻夜难眠。清晨，天还没亮，陈大中送我到朝天门。离开家门前，我在灯下细细看他，亲了又亲。他同我在长寿湖四年，从没离开过，我舍不得。轮船要开时，我使劲抓住陈大中的手，心像被掏空了，我到了船上都是没有停地哭……

（王义珍泪流满面，陈大中眼睛也红了）

陈大中：儿子整整三天坚决不吃饭，非要妈妈。我没办法，只好请假把他送回长寿湖。

王义珍：那几天，儿子不吃不睡，我在长寿湖也不吃不睡，那种痛苦比当右派都可怕。陈大中把他送回来，我抱着他不松手。

陈大中：我看这种日子不是个办法，十几年了，王义珍调不回来，一个家分成两半。王义珍很难，我在重庆一样的挨斗，一样的劳动，一样的过“过街老鼠”的日子，回到家里还没有老婆，与其如此不如回长寿湖，情愿不要这个城市户口。

我找领导谈，自愿申请到长寿湖。领导说，你要考虑好，这次下去，肯定再回不来。我回答说，我已经想好了，不后悔。

1975年，离开长寿湖13年之后，我又返回来。

王义珍：当时我们想，一家子就在长寿湖度过余生，根本没指望什么平反昭雪的好事。1979年，中央文件下达，我和陈大中双双获得“改正”。我调回了重庆，但是陈大中回不来，机械局的人说，他是自己申请下去的，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我找到我的单位南泉疗养院，单位表示，我回来都不好安排，意思是年龄大了，业务荒疏了，哪里还能接受一个“外人”？我到处找人，托关系，希望收留陈大中，但是处处碰壁，我好绝望。

陈大中：我后悔得不得了，右派“改正”又造成我们分居，早晓得我肯定再忍耐几年。

王义珍：我四处求人，上上下下又折腾了一年多，他才终于回到了重庆。我们没有房子，我在市电机厂医务室上班，晚上在注射室铺一个凉板（一个清洁工借我的），带小儿子过夜，陈大中住机械局集体宿舍，与几个单身汉挤一间屋。所以，我们虽然回到重庆，但仍然分居。

1982年，我终于分到一间屋子，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这一年，我们刚好结婚20周年。



王义珍小儿子陈伟在
飞龙岛右派驻地前



1979年长寿湖农民在飞龙岛
送别王义珍



“结婚20年，我们终于有家了。”王义珍、陈大中摄于重庆（1982年）

采访时间 2001年5月5日 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采访后记

王义珍是我小时到我家来过多次的“长寿湖分子”之一。她给我的外观印象是苗条修长，慈眉善目，眼睛常含着笑意，举手投足显得轻灵活泼。

我永远记得那对笑盈盈的眼睛，漂亮、亲切，盈满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慈爱。

再见到她时已经是30多年之后。推开门，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双笑盈盈的眼睛，满面的和蔼亲切，连身材都保持着当年的苗条修长，虽然，头上已是斑斑白发。

可惜，她当年“政治”不行，屡考屡败，这一败，一生的代价就大了。

“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多年来，它显得比医术重要、比亲情重要、比善良重要、比良心重要、比道义重要、比是非重要、比诚实重要、比真理重要。有了“政治”，上述那些东西统统可以不要，甚至，为了获得“政治”，必须先把那些东西剿灭掉。

从毛泽东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到江泽民大力呼喊“讲政治”，社会主义五十年过去了，无数个王义珍，张义珍，李义珍的大半生也过去了。

但愿未来那些喜欢政治、擅长政治的伟大人物、英明领袖、领导核心们不要再冲着像王义珍这样美丽、单纯、善良的女人下手。



2002年6月，王义珍、陈大中重返三台岛养猪场留影（谭松摄）

那罪名惊出我一身冷汗

陈大中

1957年重庆市机械工业局办公室秘书



我长寿湖的事，王义珍已经讲了，我讲一下当右派的经过。

我“出身不好”，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县长。1949年我只有15岁，初中娃娃，还不大懂事。解放之后，天天听共产党宣传，说国民党很坏，享乐腐败独裁专制。我想，既然如此，国民党应该被打倒，我父亲也应该被打倒。

1957年，我在重庆市机械工业局办公室当秘书。当秘书经常跟随局领导活动，跟他们走多了，看多了，发觉不对味。他们不像是报纸上宣传的“一心为公”的共产党人，倒像报上宣传的“享乐腐败”的国民党人。这些领导，三天两头进出宾馆酒楼，讲吃喝，讲享乐，换老婆。有一个领导，短短几年之内竟换了七个老婆。我觉得共产党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共产党在我心目中很圣洁，很崇高，全心全意为人民。

1957年，动员我们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以为共产党认识到自身的一些问题，要改正，我很高兴，觉得这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党。鸣放会上，我提出：共产党在作风上要改进，追求享乐不好。国民党就算是好党，享乐腐败也要垮台。

后来打我右派，那罪行把我惊出一身冷汗：陈大中公开攻击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不好，国民党好。”

采访时间：2001年5月5日 地点：重庆市石桥铺



2004年12月14日，陈大中因病去世，终年70岁。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要王义珍日夜守在他身边，并一直抓住她的手。但是，他最终还是撒手而去，留下了他长寿湖患难的发妻。

一分为三的骨肉亲情

李武珍

1957年重庆市劳动局干部，1932年生



我太怀念我妈妈了，她后半生太苦！

刚一解放，我父亲就被抓起来，说他参加过反动帮会“一贯道”。“一贯道”是个民间帮会组织，我父亲是个普通市民，一个小人物，共产党把他判了一年管制，父亲胆子小，害怕，服毒自杀了。他死后我和妈妈相依为命，直到我当右派下放劳动改造。

1955年搞肃反，把我关起来审查了几十天，反复追问我父亲那点问题。解放前他加入“一贯道”时我才十来岁，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把我放了，不说个所以然，莫名其妙整一通。还有，“三反”运动时，我作为工作队员，到华福烟厂搞运动，亲眼看到刑讯逼供，逼得那个厂长用刀片割断自己的血管。1957年鸣放时我把这些事拿出来，结果同别人发生争执。我同建设局局长的老婆吵了一架，我说：“我不怕你是局长老婆。”他们都来谴责我，只有团支部书记罗仁俊半开玩笑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嘛，梁山弟兄越打越亲热。”就为这句话，他受到批评，说他居然站在我这个有“问题”的人的立场上。我当时性子烈，一口给局长老婆啐去，厉声说：“我不相信你还能把我打成右派！”



李武珍当右派前在劳动局

那时我才25岁，说不上懂事，政治上的事更是不懂。本来我表弟写信提醒过我，叫我千万不要响应号召参加鸣放，不要提任何意见。我觉得他没得道理，鸣放是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说得对嘛，是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嘛，是该打倒呀。

罗仁俊也被打成右派，他其实并没有鸣放，给他安的罪名是：罗仁俊没有管理好我们这帮年轻人，在大鸣大放中，这帮年轻人猖狂得很。

罗仁俊很可惜了，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又会说又能写，本来还准备送他去罗马尼亚去培训。他当右派后，下放劳动时手致残了，现在他已经去世。

我们劳动局有80来个干部，共打了10个右派，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十，其中8个被下放劳动，现在只有两个还活着，包括我。

当右派后，我非常悲愤，想拿命同他们拼了，但是，我想到母亲，她只有我一个亲人，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她也活不下去。

1958年，我被下放到南川农村劳动改造，给我安的罪名是“自由主义”和“思想问题”。走时人事科对我说，对你还算宽大的，划成中右，下去劳动，一年后就调回来。

离家前，我对妈说，我一年就回来。妈难过得很。

为了争取回来，我在南川拼命地干，我什么都干过，挑粪、砍树、同男的一起去打矿、到大山里背铁矿石。最痛苦的是背铁矿石，一大早出去，晚上才能回来，中午吃一个自带的饭团。大山里潮湿，棉衣都被打湿。那个山叫“擦耳岩”，又高又陡，山路窄得要擦着耳朵，我都不知是怎么爬上去的。铁矿石是铁坨坨，越背越重，有的人实在背不动了，一路上丢掉几块，我也想丢得很，但要过称，我想挣表现，比别人背得多，表现好才能早点回去——妈一个人在家里盼我呀。

我们在南川不到一年就回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后来听说是这个原因：右派中有很多技术人员，他们帮助当地建了一些小型水电站，这引起了县领导的重视，觉得这些右派很不错，很能干。于是南川给省里打报告，提出要把他们的干部拿来换我们右派。市里得知这一情况后很紧张，一天夜里，突然派来大卡车，连夜把我们拉回重庆。当时我们房子都盖起来了，猪也喂养了，走得匆忙，珍贵的猪都顾不上。把我们拉走那天晚上，还架起了机枪，我吓得紧紧趴在车厢里，不敢动，生怕他们开枪。

回到重庆后，集中学习半个月的政治，然后把我們下放到长寿湖。

漫长的“改造”这才开始，我妈妈的悲惨日子这才真正开始！

我妈一辈子吃的苦太多，13岁就去丝厂当童工，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我当右派远离家乡，给她打击太大。我走时，她抱着我哭得死去活来。每天晚上，她都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看月亮一寸一寸移动，通宵不睡。妈妈后来生病，癌症，就和她长期忧郁、伤心、孤独有关。她到重医去看病，瘦得像干柴，医生担心她走不回家，就说，老太婆，你哪个不喊你娃儿陪你来？医生说，我妈只能活三年了。妈叫我不管她，她死了就算了，只要我能活出来就行。为了减轻我经济上的压力，妈妈拖着病体，挣扎着去帮人家干点杂活，挣点小钱。她有时还要给我寄一点粮票来，一个月，两个月后，就要寄一点。

我在长寿湖没日没夜的劳动、挖土、喂猪、挑粪，哪里需要就把我赶到哪里去干活，唯独妈妈需要我照顾，我去不了，尽不了一个女儿最起码的关心和孝道。

（李武珍泪水流出来）

我说过，解放后还不如解放前，解放前独生子还不当兵。我是妈妈的独生女，完全不考虑我家的实际情况。那些日子，妈不时昏倒在地，每次都是普通老百姓来救助她，有的人还把白糖化成水给她灌下去。那个年代白糖是很紧缺的东西。还有，医院的另一个癌症病人，把她的奶粉分给我妈妈吃，还经常给妈妈包一小包带回家。多年后我去南岸区找她，想谢她救命之恩，可惜她已经去世了。没有这些人在妈妈最困难时的帮助，



李武珍在南川劳改后
转到长寿湖前

我妈可能早就死了。

但是，当局完全无视我家的这种困难，非要我在长寿湖“劳动改造”，共产党做事一点不讲良心。

我第一个女儿小小 1960 年生 在长寿湖。你问她为啥叫小小？她……小小……她的身世很不幸，农场的人都知道。取名“小小”，当然……当然有原因。

（注：李武珍欲言又止，我未追问，我已从其他人那里了解了这段伤心事。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带给一个女人，或者说两个女人的悲剧，但这也是个人的隐私，此处隐去。）

1962 年我在同心岛与孙静轩（重庆市文联右派，诗人，详见本书《一个毛主席赞扬过的著名诗人》）结婚，婚后还不到一年，孙静轩就调离长寿湖，去了成都。那时我已经怀了孕，好几个月了。

生了可可（第二个女儿）之后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我拖两个女儿，天天上坡劳动，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个背篋（收工时捡点柴），一只手拖锄头，一只手拖小小，到了山坡上，我把两个娃儿放在土坑里，任风吹日晒。远远听见她俩在哭，拼命叫：“我要妈妈呀。”我也想哭，不敢哭。每天的劳动量要完成，不完成要挨斗。收工时背一背柴，抱一个拖一个往回走。



李武珍当右派前

最缺德的是每天晚上学习——思想改造。我累得死去活来，请求宽松一下，让我照看孩子，不行！思想改造雷打不动。我只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抱着娃儿躲到暗处打个盹。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妈查出得了直肠癌。我万分焦急，回不了家，又没有钱。这边，照顾不好女儿，重庆，照顾不了妈妈，成都，照顾不了丈夫，我一个女人，好难呐！

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孙静轩提出离婚。我理解他，他独自一人在成都，长年累月，没人关照，也难。还有，我在长寿湖改造，遥遥无期，哪年是尽头？我只是觉得，他不该在这个时候，在我最苦最苦最难最难的时候提出分手。

1965 年，他来长寿湖办离婚，我抱着可可同他一块去邻封镇办手续。那天天气寒冷，阴惨惨的，我忍住眼泪，把可可递给他，说：“你抱她一下。”

他离开长寿湖时，我把平时腌的两只鸭子交给他，让他去看看我妈，我说，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不要把我们离婚的事告诉她。

（讲叙至此，李武珍难以自抑，泪流满面。）

我当时一个孤单单的女人，承受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有多大！

我当然想到过死，经常想，但我晓得我不能走这条路，生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它属于小小、可可和我妈妈。我一走了她们怎么活？而且还要给我再加一个“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罪名。

说到“畏罪自杀”，我想起一件事。那是文革期间，大概 1970 年左右，我突然收

到一封信，是孙静轩从大邑县弯丘五七干校寄来的，他告诉我，他的朋友，作家刘星火被整死了，他感到绝望，一是想要外逃，二是打算自杀。他叫我辛苦点，把小可拉扯大。他还给小可写了封信，叫她要听妈妈的话。

我看了信，焦急万分，连夜给他写了封信，我说，你跑出去只有死路一条，能跑到哪儿？粮票、户口把你栓得死死的。长寿湖的莫德仲跑到云南边境都被抓回来。自杀，就更不可取。共产党正好说你有了罪。你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你有罪，你害怕了，所以要自杀——“畏罪自杀”。我说，两条路你都不能走，无论如何你都要坚持活下去。

我还叫小可给她爸爸写了些话，小可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了些字。

我不敢到附近的场上去交信，我天不亮就起来跑到很远的兴隆场去交了这封信。嘿，刚交了信回来，就有人来抄我的家，把孙静轩那封信抄走了。我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信看上去也没被拆呀。

其实，孙静轩这个人还是很重情谊的。他在长寿湖伙食团做饭时，一心希望那些右派能吃好些。他做发糕，还要讲究色、香、味，还去买点红来点在发糕上。我说，那些都是次要的，生存环境这么严峻，饭都吃不饱，什么色彩不彩色？最让我着急的是他老称旺称。他在给右派们称粮食时，称杆总是翘得高高的。在同心岛如此，到新滩后仍然如此。我一看他称那个旺称，心里就着急，一个人多一点，几十个人就要多好多，月底怎么不亏欠嘛。亏了就得自己补，他哪有钱粮去补？果然，每次他都差账。后来全靠右派作家李南力自己掏钱给他补上，才救了他。

把长寿湖同南川相比，在南川精神上要轻松些。长寿湖除了劳动，成天人与人斗，身心压力极大。我们劳动局下去的8个右派中，3个死在了长寿湖。

一个是陈遥之，他投湖自杀；一个是贾厚友，饿死了；第三个是孙毓澄，落水淹死。

孙毓澄死之前还托我回家时看望他妈妈。他家里把过中秋节凭票供应的饼子全部托我给他带来，我带给他之后不久就听说他遇难了。孙毓澄是一个很斯文的人，他不会游泳，在一次划船运粮时船漏水，他掉下去淹死了。

贾厚友是一个相当有才华的人，歌唱得很好，琴棋书画样样都行，他鸣放时画了一幅漫画，说他讽刺了局长，因此划为右派。在长寿湖，他被整得不成人样，他死前我见到他一次，他支一根木棍，端一个烂碗，到食堂打饭。我见他脚肿得很大，脸也肿。他死在二工区。他妻子从城里来到他的坟前，哭得死去活来，我见她在地上绝望地翻滚，双手抓满泥巴。后来她带走了他的一件蓑衣，作为纪念。



贾厚友（1926—1961年）

一年中我们只有春节才有几天探亲假，你不晓得，我们回家探亲时的那个心情！

那年春节，我把我种的一个大南瓜和一些鸡蛋给我妈背回去。那天没赶到车，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决定连夜走到长寿县。我一个人害怕，便同工会一个姓罗的男右派一块走。我们走一段又歇一会，夜里露水把衣服打湿了，罗右派（我把他名字忘了）把他的草帽

拿给我戴。在县城等船时，我晚上不敢睡，一会怕有人把南瓜偷走，一会又怕不小心把鸡蛋打烂。手抓紧背篋一夜都不松手。

上了船，船走上水，慢，我们归心似箭，更觉得慢，路上数岸边的树，一棵，两棵，蜗牛似地往后移。一年只有那么几天假，路途上过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可惜，觉得心痛。只要远远看见，甚至不是看见，而是感到了朝天门的灯光，我就兴奋得心扑扑直跳，赶紧收拾自己的背篋、年货，早早地背在身上，站在船舱边。

到了朝天门，争先恐后下船。冬天，水枯，下船后要过一大片沙滩。我前面抱一个娃儿，背上背一个背篋，心急火燎往上赶。沙子往下陷，越急越走不动，每次过那片沙滩，我都出一身大汗，不过心情很愉快，要到家了！

说起朝天门，又想起一件事。那一年我把妈妈接到长寿湖，在上船前的那段路上，我先把箱子背到前面，叫女儿小小（她大一点）守着，然后返回去背妈妈，背到箱子前放下，又背箱子，然后又返回去背妈妈。就这么一段一段地移，一路上其他人都把我们这祖孙三代人看着。

多年呀，成天最盼望的就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一家人能团圆。

妈妈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一直思念她，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想哭。现在日子好过了，不缺吃，喝牛奶不成问题，又没有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但她享受不到了，一天都没有享受过。

那些年，最“争气”的是两个女儿，她两从小在山坡上敞放，风吹日晒，居然不生病。幸亏没生病，否则她们可能完了（那偏僻荒岛，哪儿去求医？），我也可能完了。

两个娃娃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总想让她们受教育。她们每天要走十几里路去上那个农村小学，路上要拿根棍子，怕草丛中的蛇。冬天她们没鞋穿，脚冻得通红，像红胡萝卜。

1970年，我又结婚了，他是市总工会的右派，郑汉生。

孙静轩托他在长寿湖的好朋友聂云岚等人给我找个人，聂云岚他们很热心地为我张罗。同心岛有个右派郑汉生，40岁了还孤身一人。郑汉生自身条件不太好，个子矮，又不能干。黎民苏他们早早就找了个农村姑娘，郑汉生就不行。聂云岚说，郑汉生还有个特长——会劈柴。我同他结合当然不是看中这个特长。

他身体不好，自理能力又差，病了，躺在床上不吃饭。我煮点泡饭，叫可可端去，可可送去的饭，他都吃，我看见他那个样子很同情。

结婚后，按我本意，我绝不愿再要孩子，两个女儿已经把我磨得够惨，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再生养孩子我压力大。但是，郑汉生有权利要一个他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我完全是为他着想才生的葱葱（第三个女儿）。

婚后我并不感到轻松，郑汉生这个人管不住他那张嘴，用重庆话叫“干精火旺”，经常张口呱呱呱呱一阵乱说。那是啥子年代？要惹事呀！孙静轩也敢说，又同捕鱼队那



李武珍 1974 年从长寿湖回到重庆留影

帮不服气的人抱成一团。经常有人警告我，弄得不好要出事，再抓一个反党集团容易得很。同郑汉生生活又是担惊受怕。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要对她们负责，要平平安安把她们养大。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怕惹事，只想有个安稳的家，过点小老百姓的安宁日子。

1974年，鉴于我妈孤苦一人，重病缠身，劳动局终于恩准我回到重庆。妈妈上医院总算有人陪了，可惜她生命也快到尽头。

我与郑汉生的婚姻原本勉强，我回城两年后，我们分手了，女儿葱葱留给他。我不是不牵挂她，她才几岁，怎么不挂牵？没办法呀。葱葱长大后不理解我，觉得我抛弃了她和父亲，我有苦说不出。

后来我又结了婚，他也是长寿湖的右派，这你已经看到了。

我三个女儿，现在分别归属三个家庭，小小跟着我；可可判给孙静轩（她中学毕业后去了成都）；葱葱同郑汉生生活。三个女儿都是我心头的肉，都让我牵肠挂肚。小小柔弱、抑郁，胆小怕事，工作不顺心；可可性子急躁，倔，非常讨厌政治。她说：“妈妈，我们一家就是被政治害的！”后来高考她坚决不复习政治，结果政治只考了30分，她的总分距录取线只差7分。可可本是非常聪明的孩子，可惜了。葱葱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我们找关系反反复复说情，几个月前才给解决。

这种破碎怪谁？怪我？

我自己受苦不要紧，但影响到娃儿我很难受。

1957年反右运动，害了几代人！

采访时间：2002年1月9日；2009年11月29日

地点：重庆市杨家坪；重庆市博物馆



“1957年反右运动，害了几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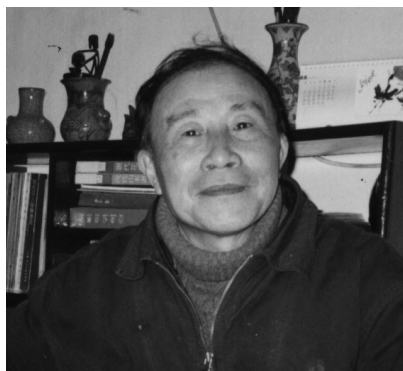
（李武珍 2009年11月）

一次不幸的亲眼目睹

蒋维亮

1957年重庆市文化局团支部书记

1933年生



解放那年（1949年），我在重庆清华中学读书，解放后我参了军，空军地勤，驻扎在中朝边境。我也曾踏上朝鲜的土地。几十年后我了解到，志愿军当了俘虏回国的，被整得很惨。有个女兵，被发配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遭强奸18次。我出了一身冷汗，谢天谢地，我没当“回了国的俘虏”，而当了右派，我也许情愿当右派。

1955年，我从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转业到了重庆市文化局。

我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心里总渴望追求真理，认为一个社会应当公平、自由、民主。1949年我对“新社会”是由衷热爱拥护的，年轻人嘛，面对一个新时代，高兴。

在部队时，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对劲，好多首长一脚把原配夫人蹬了，从大学生里（包括清华大学）招来一些年轻、漂亮、有文化的女大学生，说是参军，实际上给他们当老婆。有个部长，一个怪难看的糟老头，娶了一个马来西亚回来的女学生。那女学生真是个美人儿，年龄还很小，说“娶”是文明语言，实际上是强迫。记得刚解放不久，见到一幅苏联的画，叫《春寒》，上面画一个富有的糟老头娶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娃，画讽刺旧俄时代不相称的婚姻。我看那幅画心理上很反感，但我想那毕竟是一幅画。后来睁眼一看，噢，这种事身边到处都有！下了地方，见得更多，我于是想，这些都是老首长，老革命，打江山辛苦，辛苦了就要享受。

当时，我只是对这种事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绝没有想到这同我一生的命运有什么关联。

我到文化局后，由于能说会写，还能在外国人面前说点洋文，因此很受重用。我当了团支部书记，还被认为是“接班人”。那个时候，有外宾来，我都要接待，每天还要把外宾的活动情况写成文字发电到北京，所以，每晚发完电我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

一个晚上，我写完电文，匆匆闯入主任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呆了，主任正在和一个年轻女人亲热！我面红耳赤，手足无措，赶紧退了出来，但是晚了。

主任是个从延安来的老革命，我的顶头上司。老革命搞年轻女人我已经见得多，但是当场撞见，而且是顶头上司，事情就不妙了。主任担心我说出去——其



蒋维亮在华北空军
政治部留影（1953年）

实我没吭一声，我不敢，我晓得这事的厉害。



蒋维亮从空军转业前留影(1954)

几个月后，鸣放开始了，我经常在外陪外宾，根本没鸣放，什么意见也没提。不过，要整我，并不在于提没提意见。

他们找了两句话给我定了罪：一、蒋维亮说，他要用艺术这个鞭子来抽打共产党员的灵魂。二、蒋维亮说，鸣放时共青团员可以不讲立场。其实这两句话都不是我说的。第一句话来自一个搞创作的人员，原话是“用艺术的鞭子抽打丑恶的灵魂”，我觉得这句话不错，记在了本子上，本子被人发现、汇报、加工，成了我当右派的罪行。第二句话是别人问我的话，当时我根本没有回答，后来批斗我时，不管三七二十一，

蒋维亮从空军转业前留影(1954) 就往我身上压。

主任资历老，权力大，他不放心我，给我顶“帽子”打发我走人。

不过，17年后，1974年，把我从长寿湖解救回来的也是他。

文革期间，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一些骂江青的话，他当演员的老婆发现后揭发他，他因此挨斗挨整。这一家伙把他整清醒了：挨整的滋味，难受呀！1974年，我同他在大溪沟偶然相遇，他十分亲热地叫我：“蒋维亮同志，蒋维亮同志！”我很冷淡，不想理他。他很真诚地对我说，1957年的事过头了，一定要设法把我调回来。我没当真，但是当年我就从长寿湖调回了城！他帮的忙，想来他良心还在，那个年代，不容易了。

批斗我时，我还在想，辩论嘛是人民的权利，因此我不停地为自己辩解。哪知越辩解越遭整。你越说自己根本没想到要反党，你越被整得惨。一盆一盆的污水铺天盖地往你身上泼，泼得你昏头转向，到后来你自己都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不是个罪人。

我们文化局有个搞川剧改编的文人叫王相成，他解放前曾与老舍一起工作过，写过不少书。1957年他根本没有鸣放。那天开会，有人叫他站起来交代问题，他马上站起来，站得规规矩矩，低着头说：“我从旧社会来，有罪，有罪。我向党低头认罪。”斗他的人说他老奸巨滑，他连连承认：“是，是。”他一心想求平安，但是，仍然被划为右派。

不过，由于他一点不辩解，批斗会上他少吃了许多苦头。我这才明白，受了冤是绝对不能喊冤的，否则整得更惨。

划我右派的材料报上去审批时，宣传部门管文教的干部认为我不应划右派，把材料退了回来。哪知道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到了重庆，他到团市委去问，你们打了多少右派？团市委的说打了多少多少。毛泽东嫌少，说：“一个单位要打个百分之一、二、三呀。”

这件事发生在1958年3月，团市委的报纸上刊登了的。



1958年3月毛泽东在重庆

这一下又掀起了抓右派的热潮，以前不打算划为右派的，一个接一个地补划。右派

实在补不上了，就划为“坏分子”。例如，与我同在文艺科的刘犁和陈应善就被强划为“坏分子”。刘犁的罪名是“经常在文化宫逛，想要女朋友。”陈应善也是我们科的，爱唱歌，他娶了比自己小得多的年轻妻子，被定罪为勾引诱惑女青年。他和他父亲（即重庆著名的山水画家陈漫漫）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结果陈应善被抓捕入狱，新婚的妻子也同他离婚了。所以，这些“坏分子”完全是强加的。最有趣的是市话剧团的万声，他们剧团的肖培禧等人被划为右派打下去了。在一次座谈会上主持人要大家发言，点名要万声发表对肖右派的看法。万声说：“我看到肖培禧呀，这些人——”说到这儿他就打住了。主持人问：“有啥？”万声说：“没有了。”那些人于是认为，“没有了”里面更有问题，万声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最恶毒的。他们话剧团的几个人，包括万声，都是后来被补划为“分子”再打下去劳改的。



蒋维亮划右派前
在文化局留影

抓了“坏分子”又抓“历史反革命分子”，总之，抓的“敌人”越多，成绩就越大。毛泽东来重庆点了把火，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又在已经很高的抓人指标上再加一个百分点，这百分之一专门加在知识分子多的地方。

我当右派后，工资从每月60多元降到每月3·5元，转到长寿湖后加到7·5元。经济上我一贫如洗。

那些年，我见到死人最多的不是长寿湖，而是南桐农村。1958年冬，教育局和文化局的右派集中在南桐矿区两河乡修简易公路。这时粮食已经很紧张了，每人每月只有17斤毛粮，右派们饿得不行，什么野草野菜都找来吃。毛粮连同谷壳一起磨成粉，包谷连同芯芯一起磨来吃，还有南瓜叶等等。吃不饱，但劳动强度很大，右派们挺不住了。

文化、教育系统的右派们，都是些知识分子，一些人年龄大了，经不起折磨，成批地死。我当时搞点测量的技术活，四处走。每天走到教育局那个队门前时，都会看到几具尸体，前一天的埋了，第二天又摆出新的。有一天，我看见尸体中有我在树人中学的英语老师冯素光。

我们文化系统有一个叫曹绥志的人，他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的创作员。他死后我们把他埋在坡上，由于大家都很饿，没力气挖坑，便找了个凹下去的地方把他放进去，然后捡点泥巴和石块把他草草盖上。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从四川大学赶到南桐来，非要去看看他的坟。实际上哪有什么坟嘛。我们带她到埋曹绥志的地方，她一看见那个到处是洞的“坟”，一下子就痛哭起来。我们赶紧又去找些石块泥巴把洞封上。

还有一个叫唐成淼的人，是市话剧团创作室打的“坏分子”。他被开除公职，下放南桐农村。一天，他听说场上一家食店要卖红烧肉。一大早，店没开门他就去等。好不容易开门了，肉还没买回来，又等。肉买回来，洗、切、煮，再等。锅里冒出阵阵肉香，唐成淼使劲闻，虚汗直流。突然，他面色惨白，浑身发抖，身子一歪滑到地上。

肉煮熟了，唐成淼也断气了。

1960年2月我们转到了长寿湖，仍然不断有人饿死。我当时在采石场，饿得昏昏糊糊，

每天看天都像是黄昏，不时把水当成天，天当成水。后来，我们这些身体垮了的人集中在一个寝室，我睡上铺，下铺给年龄大一点的人。没多久，下铺的人死了，抬出去，我移到下铺睡，再来人，我又搬到上铺。我记得上上下下搬了三次，每一次都是下铺死了人。可惜我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只记得有一个人是邮电系统的。不久我被转到狮子滩医务室，那个“死亡寝室”后来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记得最清楚的是刘犁之死。刘犁同我一个科——文化局文艺科。那天，我听见有人喊：“这是哪个睡在沟沟里？”我跑去看，在狮子滩机械厂旁的一个沟里，面朝下伏着一个人。我把他翻过来一看，是他，刘犁！他满口是泥巴，嘴角流出一串口水，面青面黑，眼睛还睁着，但已经断了气。

他到狮子滩来找吃的，转了半天，没找着，支持不住倒下去了。他1930年生，死时刚刚30岁，还没有结婚。

他为啥被打成“坏分子”，因为他爱在文化宫找女娃儿耍。一个单身汉想要女朋友，正常得很嘛。毛泽东来了重庆，要多抓阶级敌人，他因此就被打成了“坏分子”。

那个年代，越老实，越按要求认认真真改造，越吃亏，越容易死。采石场有一个西师地理系来的右派，非常年轻，只有20多岁，不知是学生还是老师。这个人身强力壮，正处在生命最饱满的时候。那时，越是体力好的，越要派去干重活、累活。于是，许多重活都让他去干，还把他派到劳动强度大的水稻组。但是，吃的定量都一样，你想，这怎么受得了。

水稻组派了个农民师傅来管右派，这个人很“左”，把很多杂活重活都派给他去干，其中一项就是让他去挑饭。挑饭至少要走半个小时。一次，在挑饭中，他饿慌了，就把别人罐子里的饭翻过来，从底下挖了半个汤圆那么大一块来吃，然后又把饭翻回去。

吃饭时，那个农民师傅首先发现饭缺了一小块，接着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不得了，马上把他拖出来斗。不仅斗，而且从第二天起就扣他的饭，把他的饭扣下来分给水稻组的人吃。既不准他吃饭，又要他继续劳动，你说他活得出来？

那天，白天强迫他干了活，晚上又派他到湖边去守麦子。麦子一包一包包裹好了用油布盖上。他就坐在那个土地庙守夜。第二天夜里，他死在那儿了。

他们去验尸，以为他是偷吃了麦子胀死的。他嘴里的确有麦粒，但是检查麦包，发现每个麦包都完好无损。麦粒哪儿来的呢？又查看，发现他是把掉在地坝石缝里的麦粒掏出来吃，因为他嘴里有泥沙和草根，而那泥沙和草根同石缝里的泥沙完全一样。检查时还发现他嘴里咬死了一条四脚蛇（壁虎），但他已经没有力气把它吞下去了。

这个人叫张泽光还是叫张泽云我记不准了，希望你去调查落实一下。

1960年在采石场还抓了两个人，一个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坏分子”，而是长航下放下来的年轻人。长航有三个年轻的报务员下放到采石场劳动，这三个小伙子个个都长得



蒋维亮（右）在南桐山区修好一个简易公路桥后与陈华合影

很帅，其中尤其是叫刘明登（音）的小伙特别引人注目。他爱戴一顶草帽，走在路上非常潇洒。这三个漂亮小伙子常在一起，人们把他们叫做“三个火枪手”。

一天，他们在路上遇见了管这个地区的支部书记苏新，苏新看了他们一眼就走了。刘明登将手做成手枪状，冲着苏新的后背“啪”、“啪”、“啪”开了三枪。这一下他倒霉了，给他定个罪名，说他要谋杀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他被抓捕进了监狱，后来下落不明。

另一个叫沙居城，是重庆市工业局的。这个人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可这个能力在那个年代只能是灾祸。据说他写了些材料，申诉他的冤情。他的申诉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活动，他因此被抓捕入狱了。

我在采石场还看见一个人被抓，这个人叫邓祜曾，以前是华西大学学化学的学生，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还是个混血儿，母亲是比利时人。我同他在南桐时就认识。那天他被抓来丢在采石场那个谷草堆里，我看见他，问：“老邓，你怎么在这儿？”他转过身，让我看他铐在身后的手铐。我一看，知道他要被抓走，便赶紧去买了两个馒头塞在他身上。他不要，生怕连累我，叫我赶快走。他很快就被押走了，判了刑。据说罪名是“企图投敌叛国”。（注：邓祜曾的情况详见本书《吃饱饭比什么都重要》）

多年后他出狱，去了比利时。现在他已经去世。

有一个右派的死我一直感到很内疚。这个人叫陈遥之，是重庆市劳动局的右派。那天我在厨房遇见他，他脸色很不好，端着一盆正要洗的衣服。他先开口对我说：“老蒋，我恐怕是活不下去了。”

我那些日子自己也焦头烂额，天天要我交待问题，精神压力大，但是我没想到要自杀，因此也没去想他会自杀，所以我没同他多说话。

不一会，传来消息，陈遥之投湖自杀！

我这才知道他端那盆衣服是掩盖他要去投湖的行动。

我好内疚！如果我当时想到这一点我一定要全力劝解他，一定要阻止他。

他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埋在马鞍山的一个竹林下。

长寿湖有一个可怕之处就是挑动人与人斗。

有一个右派叫李 XX，他为了表现他劳动改造积极，挑一担泥巴还要在背上背一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作秀。他摘帽后当了组长，“左”得出奇，一心想监督管理好其他右派。他搞了个“发明”——在宿舍里挂一个本子，每人每天必须要在上面写一条揭发他人言行的话，不写的人自己当晚就要挨斗。用他的话说叫“互相监督，促进改造”。这一招搞得人人自危，大家在一起你防我，我防你，不敢随便说一句话。

不说话也得“揭发”。于是，本子上出现这样的揭发：“某某某平日撒尿只要两分钟，今天撒了整整三分——蓄意偷懒。”还有“某某某今天拉屎没拉在集体的粪坑里。”

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正常的交流，人人噤若寒蝉。我说，我们那些日子里放的屁都比说的话多。

管教干部孙重认为这项发明好得很，准备在全范围推广。

正在这个时候，同心岛上发生一次严重的蘑菇中毒事件，右派们一个个中毒倒地，

上吐下泻。有些人中毒重，生命垂危，岛上慌成一团，揭发登记被迫终止。

我也中毒，拉肚子，但那些天我精神还轻松些——情愿拉肚子，不搞“阶级斗争”。

蘑菇事件后，遇上造反派进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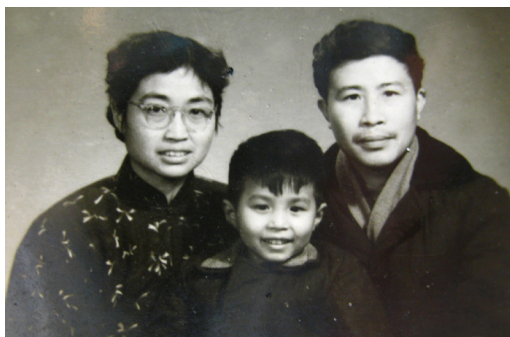
当时，造反的两派斗得很厉害，他们互相攻击对方，有一条是“包庇长寿湖的右派分子”。其中一派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证明自己“革命坚定”，打算对我们大开杀戒。全体右派突然被集中起来，关进一个砖窑里。我们人心惶惶，听说造反派在山头上架了机枪，要把我们一群“坏人”全体剿杀。但是，没有响起枪声，这事被阻止了，我们半夜时分才从砖窑里出来。

蘑菇事件和造反派进岛打断了李氏“发明”的推广，是大幸。

管教干部批斗右派更是不择手段。孙重故意整女右派罗成溶，整整斗了她几十天，斗得罗成溶后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说她什么她都承认，说她是妓女她都认可。

在长年累月无休止的批斗“改造”下，有的人变了，变成了奴性十足的狗。

有一件事印象很深。一天，红卫兵把我们抓来跪成一排，有个红卫兵搜到一本莎士比亚的原著，他左翻右翻，不知是本啥子书，跪在地上的文人右派XXX（作家）主动去讨好，他不敢站起来，跪着用膝盖在地上挪，一点一点挪到造反派面前，先用英文读书名，然后媚声给造反派解说。



蒋维亮 1960 年春节到长寿湖之前与妻儿合影

我们目睹这一幕，心里很不是个滋味，知识分子，宁可死，也不要到这个地步。

也是他，文革中儿子死了，让他回去，他不走，说要以学习、改造为重。

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包括我，但主动“改造”到那个程度，也少见。

那个所谓的“改造”，除了把人改造得奴性十足，还把人改造得十分凶残。有的人变得善于查看主人的脸色和眼神，当他揣摸到主人想咬谁时，便抢先跳出来扑上去。在那个环境中，人被一步步改造成野兽，像狗一样相互咬。我们一方面要学会麻木，这样才能忍受，另一方面又要高度敏感，像野兽那么敏感，提防别人咬你。那时有种感觉，仿佛自己生活在一群狼中，我若不变成狼就活不出来。所以我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咬人。”当时就像中了邪教，教主鼓动我们互相斗，现在回想起来，又是气愤又是惭愧。

捕鱼队就要好些，谭显殷他们认识得快，不相互斗。我们那儿，尤其是开初，彼此斗咬得昏天黑地。后来慢慢清醒了：相互整干什么呀？槽内无食猪拱猪！右派梅吾说：“什么阶级斗争？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别把他们那一套看得那么不得了。”

可我们最初没看清楚，忠心耿耿跟着共产党走，老老实实按共产党的指示办。糟就糟在这儿！后来我总结一句话：对共产党宣传的那一套，信一分糟一分，信两分糟两分，信三分糟三分，信得越多死得越快！

我当了右派后一直不认为自己是右派，我甚至认为，革命就是这样，就像描写苏联

革命的那本书《震撼十日》里写的那样，孙子可以把爷爷押去枪毙，这是革命的需要。革命的列车碾来，牺牲自己的同志，甚至把自己的战友打死了都有的。也就像《苦难的历程》里说的：三次血水洗过，三次碱水里泡过，三次冷水里浸过，我们纯净更纯净。

我当时这样认为，打我右派是革命的需要把我牺牲了，算了，一切从新来过。

后来，越改造我越觉得自己是右派了。为什么呢？，看到大跃进、三面红旗乱整；看到把农民的坛坛罐罐全部收缴了；看到一个老农民，死在去公社食堂打饭的路上；看到那些惨无人道，我开始怀疑：这就是要“奔向共产主义”呀？还有，看到彭老总——我们在部队就这样叫他——说真话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我更加反感——这就是“革命”呀？

于是，我真正开始右倾——变成右派分子了。嘿，正在我对共产党怀疑得最利害时，正在我认为我真正成了“右派分子”时，上面宣布摘掉我“右派分子”的帽子。

采访时间：2002年1月9日；2009年11月29日

地点：重庆市杨家坪；重庆市博物馆

采访后记

在初次采访了李武珍、蒋维亮夫妇七年之后，我又走进了他们的家——位于重庆市博物馆里的新家。

仅在去年（2008年）和今年，就有约15名长寿湖幸存右派与世长辞。在本章所列的七对夫妻右派中，三对已经残缺，还有一对即将残缺。

但李、蒋二老还很健康，思维也清晰，于是我产生了将他们的音容录下来的念头。

这次，两位老人面对镜头又谈了很多。说到激昂处，蒋维亮情不自禁站起身，声音高亢；而李武珍依然是儿女情长，热泪盈眶。

我感到庆幸的是，他们不仅留下了上述文字，还留下了生动的讲述画面。

（与书同名的六集纪录片已经在2016年由谭松与丁然制作完成）

蘑菇事件

“四清运动”期间，进驻同心岛的四清工作组的人表示想吃蘑菇，几个右派于是到山坡上采集了一大堆，在伙食团煮成蘑菇汤。当天，右派们兴高采烈地一人打了一份。

不一会，右派们一个个双手抱腹，哇哇吐得天昏地暗，其中，也有工作组的人。

正在分发蘑菇汤的聂云岚（重庆出版社右派，作家，已去世）见状大惊，慌忙抓起一个大盅，盛上满满一盅蘑菇汤，咕噜咕噜全部吞入肚里。

情况汇报上去，长寿县的医生紧急出动，赶往同心岛。

岛上，右派们东倒西歪，上吐下泻，驻地四围污秽满地，臭气熏天。

整整折腾了七天，据说在用尽了县医院所有的输液剂之后，右派们才逐渐起死回生。

在这次事故中，中毒最重的就是聂云岚，他倒卧床上，面色惨白如同死人，经全力抢救才死里逃生。

事后，有人问他：你已经晓得蘑菇有毒，为什么还要吃？聂云岚哭丧着脸说：“我不吃怎么说得清？采蘑菇的人有我，烹煮的人也有我，定我一个破坏四清运动罪，那就是现行反革命！我只得吃，还要吃得最多……”



同心岛当年右派们的食堂（谭松摄）

长寿湖，一个才貌双全的 女右派

刘曼若

1957年重庆出版社编辑



我年轻时的愿望是当个记者，一个像原大公报杨刚那样的女记者，会写文章，懂外语，可以满世界去采访、报导当地的风光、人物和事件。于是，我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转到了德语系，并立志，这辈子要投身新闻事业。

1949后，我懂得了报纸是党的喉舌，而我出身不好，又是非党群众，要想当记者是很难的，更不要说当驻外国的记者了。

不过，我当了一名编辑，重庆出版社的一名编辑，虽然不是记者，但总算从事文化工作，我决心踏踏实实地在出版社干下去。

1957年鸣放时，我提出了对肃反、三反运动的看法。

我说“肃反是肃清反革命，解放时我弟弟才十二、三岁，怎么也被抓起来当反革命分子整？”那时，我把反革命的概念局限在“拿枪和共产党对抗的战场敌人，或者搞破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等。”没想到“反革命”可以随时空变换而内涵不同。



1947年刘曼若在同济大学，19岁

三反运动，出版社整人整得凶，捆绑吊打、跪煤渣、跪砖头。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出来，路过收发室，里面突然有人大叫：“刘曼若，救救我！刘曼若，救救我！”我往里一看，看到刘跃新（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经理）在跪煤炭渣。那个气氛恐怖，我不敢说话。走过去，又看见魏志澄（老出版家，时任出版部主任）在小会议室吊“鸭儿凫水。”后来听说，他们还把刘跃新抓到后面山坡上，用火柴烧他的生殖器。耳闻目睹，我非常气愤，那是人哪，怎么这么野蛮，这么残暴！党的政策规定，不准打人骂人呀。

于是，我向党提了两条意见：一、出版社的三反运动有些地方搞得不对。二、肃反运动打了一些好人。

有人写了大字报，说我“攻击共产党。”我觉得自己是根据党的鸣放政策，说的都是事实，怎么会是“攻击”呢？我于是拿起笔来，在大字报旁批注：扯谎！

那时，我很天真，不知道说真话就有罪。

其实，我一句话不说也要当右派，原因是我“出身不好”，父亲在杨森手下当过县长。我的哥哥刘抚万人很老实，从不在大会上发言，但也被划为右派，勉强给他找了一条“罪行”——有人告密：“刘抚万说过，积极分子是狗熊。”

说到“积极分子”，你可能不懂，在党组织周围，尤其是运动期间，总有许多表现“积极”的人，他们专门向党告密：某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积极分子因告密受记功，被培养入党。我们在一次开团组织会时传达了党的一个指示：要保护积极分子，否则党就没有耳目了。

我被划为右派，撤职停薪，送农村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 18 元。

1958 年 3 月 14 日，我和出版社几个右派分子来到了南桐矿区双河公社。

在农村，我住在一户陈姓农民家里。为了好好表现，我流产没三天就跟着他们下水田；为了好好表现，我赤脚也跟着农民和石灰墙泥，结果脚踝烧了一个大洞；为了好好表现，脏活重活我都勇敢承担。

在农村，我看到，“解放”了十年，农民生活还是那么苦，吃不饱穿不暖。我在陈家住了近十个月，只吃了一顿白米饭，就是我才来的那天的那顿晚饭。其余时间吃什么？四季豆叶、豇豆叶、南瓜叶、红子（野果）等掺点碎玉米蒸着吃，还有就是没交上公粮的瘪谷子，碾碎后连壳带糠掺点菜叶蒸着吃，叫谷沙沙。而我住的这家，据说还不是最穷的。

一天，农民和下放干部都去公社开会，开会回来，他们一个个喜笑颜开地说：“我们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每家每户不用自己煮饭了，要成立伙食团，敞开肚皮吃饭；农民也不记工分，每人每月发三元工资……”于是，今天到这家砸小锅小灶，明天去那家砸坛坛罐罐……

闹腾了一两个月，突然，粮食没了，说是灾荒年来了。

水肿病在右派分子中蔓延，得病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是市委决定，将这批右派分子转移到长寿湖。

长寿湖粮食定量：21 斤。

右派们看到了活的希望。



刘曼若 1952 年

1960 年初的一天，两河公社的右派集体转移到长寿湖。我记得那天到菜园坝火车站出站时的情景：一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精神萎缩的男男女女身背山地特有的下窄上宽的倒肩背篋，手杵“拐扒子”（用来撑背篋的），慢吞吞地走出来，列队。尽管那时全国人民都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但我们的出现还是十分引人注目。围观的人有的说：“是反革命吧？”有的说：“是劳改犯吧？”另一个说：“不像，你看他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怕是右派吧……”

我走在那个队列中，无地自容。

1958 年我走时两个儿子丢给丈夫张慧光。不料一年后，张慧光也当了右派，下放长寿湖。

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 18 元，穷得一塌糊涂。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刚四岁，一个两岁多，

生活都还不能自理。出版社有一个姓苏的工人，他妻子主动抚养我的儿子，儿子叫她苏妈妈。苏妈妈是个非常善良朴实的劳动人民，她把张仲戈、张仲弋当自己的亲生儿子。苏妈妈没有工作，自己的日子也很难，她拼尽了全力抚养我的孩子，从没要求我们给她增加工资或生活费。儿子想父母，不时闹着要父母，苏妈妈对他们说：“你们父母出差去了。”



刘曼若与儿子（1963年）

张慧光：1974年我和刘曼若回到出版社时，两个儿子已经是大小伙子了。这“差”出得长——16年！

刘曼若：好多年了，我不敢也不愿回忆那22年辛酸、苦难、屈辱的日子，每每想起来我都禁不住要流泪。我还是说几件事给你听听吧。

1962年右派们集中到同心岛，据说，上面有文件，要求把右派分子从劳动战线撤下来，养好身体，恢复专长，等待分配工作。右派们非常高兴，都盼望能结束劳改，调回重庆。

领导破天荒给我和张慧光分了一间夫妻房。不料，半月后又莫名其妙不让我们住了，又赶回各自的集体宿舍。两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两个孩子养起都艰难，怎么敢要第三个？于是，每天我一有空就把自己睡的双层床拉出来，推进去，再拉出来，再推进去，反反复复，不知拉了多少个来回。几天后，我非常幸运地流产了。王义珍来一看：“哎呀，是双胞胎，可惜了！”我一听到“双胞胎”，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我喜欢女孩，希望有一个女孩，这双胞胎，说不定就是两个漂亮、可爱的女孩。我怎么忍心杀死自己的孩子呢？可我是右派分子呀，否则，我一定会留住她们。这是右派妈妈的悲剧，也是我终身的憾事。

按规定，右派分子每年春节有五天探亲假。一年只此一次，谁不想回家看看。可是，我的家早没了，孩子寄养在苏妈妈家，回去在哪里吃住？更主要的是，每人来回要近8元的路费，我哪里消费得起？

1962年正是饥荒年。大年三十，我的二娃想妈妈，忍不住了，趴在屋前的栏杆大喊：妈妈吔，我要妈妈……

只有几岁的儿子，好容易盼到过春节，还是见不到父母。你说，当母亲的心里啥滋味。

还有。有一年过春节，我们没钱回家，其他右派走了，整栋草房只剩下我、老张、我小儿子和另一个右派的儿子。大年三十，伙食团关门了，我去分了五斤米、两斤豆食，在一个小土灶上用一个搪瓷盅盅煮饭。想到过春节，还是应当有点肉，于是我们去赶云集镇。镇上只有一个卖牛肉的，一角九分钱一斤。我们觉得还便宜，便买了两斤回来烧煮。煮了很久，牛肉一直硬梆梆的。儿子跑到伙食团去刨来一些煤炭花（即煤烧过之后剩下的一点内核），煤炭花烧完后牛肉还是硬的。儿子说他再去刨。他只有6岁，埋得深的炭花他刨不出来，于是我又去刨。那牛肉从早到晚都没煮软，后来别人说，你买到老牛肉了。

牛肉没吃成，大年初一，我便一心想让儿子吃碗汤圆，但是没有钱。看着儿子那眼巴巴的眼睛，我忍痛把我的长辫子剪了，拿去卖了七角多钱，请儿子吃了碗汤圆。

后来人家批判我，说：“你们看刘曼若好贪吃！把辫子剪了都要换吃的。”

（刘曼若泪水涌出来）

1961年，我回家看孩子，给他们买了两个5角钱的高价饼子，马上就有人汇报！批判我，说我买高价饼子给儿子吃，还叫穷。我当时好想不通，我当母亲的，长年累月见不到儿子，好容易尽一点母爱，还要挨批斗……

（刘曼若失声抽泣，讲不下去，丈夫张慧光接着讲）

张慧光：我们到长寿湖后，由于经济太困难，刘曼若的一个弟弟每月给她寄5块钱。长寿湖的管教干部对此不满，给刘曼若的每一个亲戚写信，叫他们不要寄钱，说这是支持刘曼若的资产阶级生活，不利于她改造，从那以后，我们唯一的一点外援也断了。

刘曼若：在学习班几个月后，我们没有等来调回重庆的调令，等来了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右派们一个个又被赶去下苦力。学习班的主任、管教干部孙X表示：“我决定把改造右派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我们又开始了漫长的遥遥无期的劳动改造。

孩子慢慢长大了，要进学校读书了。读书要交学费，我们缴不起，只有卖书。我和张慧光多年一本一本积累的书，六分钱一斤就卖了。书卖完了，家里也空了，最后剩下两个花瓶，一个是青铜花瓶（我结婚时编室同志送的礼物），拍卖行按废铜称斤算给了15元；一个是明代万历年的磁器花瓶。最困难时，他们哥俩把花瓶装到背篋里，背到七星岗去卖。青铜瓶当废铜称斤卖，卖了15元，磁器花瓶对方出5角钱，儿子觉得太便宜，又背回来。所以，那个磁器花瓶成了我们家唯一“劫后余生”的东西。

（张慧光将我带到卧室，参观了这个五角钱没卖的宝贝。）

从此，家里能变得出钱的东西，再也没有了。当时，我曾气愤地说：谁要我，我把自己卖了。那时如果像现在这样开放，肯定是有人要的。

无奈中，我只有去求我的小弟弟，求他每月资助我五元钱。小弟寄了几次之后就再也没消息了。我也不好意思去问。后来才知道，这又是长寿湖搞的鬼——管教人员不要他给我寄钱，以助长我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利于改造。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经饿得半死的我还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不过，我承认，我的言谈举止有些“资产阶级”味，比如说，我从不讲粗话，脏话；请人让个路都是“对不起”，“谢谢”不离口；哪怕门开着，我进门也要先敲门……如此等等的生活细节，是长期家庭教养和学校熏陶出来的文明素质，不是一两天改得掉的，也不是右派改造的必须内容。为什么容不得它们存在？难道非要满口粗话脏话才是无产阶级？

还有，我有两件光鲜的衣服：一件是鹅黄色的短袖衣服，一件是两个孩子的胎帽拆了织的鹅黄与浅灰的斜条背心，穿起来确实有点漂亮。另外，我到陌生人的场合，比如狮子滩，就比较注意自己的衣服整洁，尽可能悦目一些。我认为，我虽是右派，但更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人格并不比任何人低下。我应该保持自己的气质和风度，绝不应是一付低头顺眉，衣衫不整，精神萎靡的形象。

这难道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当然，我知道他们对我不满是觉得我有些傲气，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从从不向他们汇报，从不告密。我生来就最恨告密的人，也不学某些人那种吹捧拍马的奴才相。正正直直做

人是我从小受的家教。我骨子里所鄙视的，无论怎么“改造”，我都改不过来，也不愿改。

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刑事罪犯释放了，战犯特赦了，而右派还在劳动改造，自由还遥遥无期。

我孩子快17岁时，到云南支边。那天，我请假从长寿湖回重庆送他，分别时，我对他说：“孩子，发了工资，寄点钱回来，帮妈妈还债。”

孩子要远离家远离亲人了，分别时，我说的却是要他寄钱来还债。

他那薄薄的被子、床单、洗漱用品，都是向出版社借钱买的，我不能不还啊。

火车启动了，一向沉静内向的孩子，突然放声大哭。

二十年前，我妈妈看见三个私立中学校长同时在沙滩被枪决，事后她写信给我说：“……愿世生生，别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后，我也一再告诫孩子：安心做一个工人吧，让你的儿子、孙子都当工人，若干年后，你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都成了工人，那他们也是工人阶级了，他们就不再背知识分子父母的枷锁了。

长寿湖对我说来最可怕的不是劳动的艰辛，不是生活的艰难，而是对人格、对人的尊严的污辱和摧残。

有一个管教干部，叫孙重，他把渣滓洞监牢里的特务手段用来对付右派，安排偷听、鼓励告密，让右派整右派等等。有一次张慧光来看我，他很“开恩”地让我们住在一间房里，然后悄悄安排另一个女右派廖品云（市劳动局右派，已去世）住在隔壁，那种竹片泥巴墙不隔音，让廖偷听我们夫妻的谈话，向他汇报，廖品云把这事告诉了我。

孙重还有很多发明创造。在他眼里，所有女右派都是淫乱女人。他常常对我们右派说：“你们政治上的反动必然导致生活上的堕落。”我在上海读书多年，学外语，性格比较开朗，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见到其他男右派，有时用手拍一下对方的肩，或者递一块东西给对方，朗朗地说：“嗨，老何，吃不吃？”孙重说我道德品质不好，虽然没有乱搞，但是精神上乱搞——精神淫乱。

张慧光：孙重还说，张慧光使用美女计去拉拢其他右派。

刘曼若：对我伤害最大的一次是污蔑我偷东西。有一次，据说有人在工具房里掉了一块手表和15元公债，我碰巧在工具房里修过簸箕，便一口咬定是我偷的。孙重组织开会批斗我，要我交待。他说，刘曼若这个人爱慕虚荣，现在没钱给娃儿交学费，所以要偷。

我气得浑身发抖！

说我政治思想有问题我不害羞，说我“精神淫乱”我也受得，但说我偷东西对我是极大的羞辱。他们反反复复地追问、清查，我心情越来越压抑、悲愤，我想到了死……

张慧光：我看见她莫名其妙地甩头，嘴巴嗫嗫嚅嚅，不知在说什么。我紧张了，糟了，她可能要神经错乱！



年轻时的刘曼若

刘曼若：我心里清楚，不能死，一死他们更认为是我偷的，认为我羞愧难当畏罪自杀……

还有一次我也差点走上绝路。

那是一个冬天，我在马鞍山喂猪，因为下大雪不能出工，张慧光从几十里外的工地上来看我。我们见面当然很高兴。偏偏这天场部通知放《红灯记》，队长硬要我去“接受教育”。这明摆着是不容我们夫妻在一起。

画家崔京生（四川美术学院教师右派）想给我争夫妻团聚的机会，对队长说：“队长，今天下大雪，晚上有两头母猪要下崽，往回都是她经佑的，再说还要给猪圈加草帘……”

“我不信，离开她母猪的崽就生不下来，加草帘我另外派人。”队长一口回绝。

我只好叫张慧光等我回来。哪晓得队长也不准，说队里不能留宿外人。

我忍无可忍，发火了：“张慧光是外人？上星期你老婆孩子来了睡在哪里？现在还在队部里睡觉的女人是哪来的？”

“好哇，你要造反了，居然要和我平起平坐！”队长大吼起来。

“好，我走，我走。”张慧光拉着我走出了门。

我实在困极了，接连两个晚上，母猪下崽，都是我值班。一上机器船，我就找个角角，靠着张慧光的肩睡着了。船靠岸，他摸出10元钱递给我说：“你再添点，寄给孩子们交学费。”张慧光说完就独自走了。

……

下雨了，《红灯记》也放完了。

我们一群右派上了机动船，正要开船，一群“革命职工”冲了进来，冲我们吼道：“五类分子通通到梢船上去！这条船革命职工要坐！”

梢船没有篷，速度慢；我们这条十二马力的机动船，有舱，不淋雨，速度又快。

右派们乖乖下了船，只有我和女右派李武珍缩在旮旯没动。船开了，我想，也许他们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见我们两个瘦弱女人，也许不至于下手。

一个造反派头头，我记得他也姓刘，突然发现了我们，猛冲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辫子往舱外拖，硬把我推到船头上，他只要再用一把力，我就会掉进湖里。

我头痛得要命，挣扎着扭过头狠狠盯了那人一眼。

“哼，你还‘狡’（方言：指抗拒），红星队回去给我好好的斗！”

天一片漆黑，风把雨雪劈面打来。我站在船头，纹丝不动，但我眼泪流出来了，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屈辱！我心里一阵一阵地涌起冲动：往前再迈一步，只一步，一切荣辱与得失、欢乐与痛苦统统化为乌有……

雨水、泪水湿透了我的破棉衣，湿透了我的破胶鞋，也冷透了我的心。

我真的想向前走一步！

我想到娃儿，他们在一心一意等“出差”的爸爸妈妈回家，等我给他们缝新棉衣，买玩具枪，

有人轻轻走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一顶草帽。

风转眼把草帽刮飞了，我不知道是谁，但我永远记得那个还有人性的“革命职工”。

半夜时分，回到同心岛，我跳下船，站在湖边，不知该往哪里走。

崔京生（她因生得胖，我们叫她大胖）一直在等我，听见船的声音，她跑出来，见我呆呆站着，叫道：“老太婆，你怎么啦？”在长寿湖，我三十出头就显出老相，满面皱纹，由于经常板着脸，不苟言笑，其他右派给我取了一个绰号：“老太婆”。

“老太婆，快点，猪儿出问题了！”

余薇野（作家，市文联右派）见我一身水淋淋的，问我出了啥事。

我索索发抖，说不出话。大胖把我拉进饲料间，帮我脱去湿透了的衣服。我忍不住“哇”地一声伏在她肩上大哭起来。

洒了一通眼泪，赶紧往猪圈跑。大黑（一头母猪的名字）当天晚上一胎生了二十只！有几只奶猪已经冻僵了，只有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

大胖、余薇野和我三人围着一堆快要熄灭的火，每人手里捧着两只奄奄一息的奶猪。大胖说：“怎么办？这几只猪怕救不活了。”

在长寿湖，右派若挺不住倒下死去，没人过问，挖个坑，掩点薄土就算完事。猪就不一样了，猪是社会主义的财富，猪死了得查原因，是病么？什么病？怎么引起的？弄得不好，给你一个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罪名。我们非常害怕猪死。撇开政治的恐惧不说，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养的猪病倒死去，我们既痛心又心惊，常常是流着泪掩埋它们。

余薇野说，要有一只恒温箱就好了。当年他老大不足月，在恒温箱里养了半个月。

我说，大胖，老余，我们每人两只奶猪，揣在怀里，下面腰带一扎，不就是很好的恒温箱了吗？

于是，我们各人搓了一条草绳扎在腰上，把冻僵的猪儿揣在怀里，坐在饲料间，历史、家庭、狐狸，漫无边际乱扯……

几个小时后，猪儿活过来了，在怀里乱钻。大胖站起来，“嘣”的一声，腰间草绳断了，两只奶猪落到地上，欢快地跑来跑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发光的初生的毛皮，突然感觉到：活着，生命，多么美好！

我们毕竟比那些死在长寿湖的人幸运得多。

在同心岛，我亲眼目睹了好几个右派的死亡。有一个姓沈的右派，全名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是银行系统的右派。1961年的一天，收工吃饭时，他那块地的活还没干完，他身体虚弱，力气不够，希望吃了饭再干。组长（一个摘帽右派）不准，非要他担粪先把那块菜地淋完。沈没办法，只得继续干。当晚他没能吃成饭，一言不发爬上床睡了。半夜的时候，他冲着睡在他下铺的一个右派喊：“把你的糖拿一颗给我吃嘛，好不好嘛？把你的糖拿一颗给我吃吧。”他下铺的人不知是睡着了，还是不愿给他，反正没理他。第二天早上出工时，推他不动，才发现他已经断了气。

不知你看过戴煌的《九死一生》没有，里面有个情节，一群右派饿得发昏，推了一车糠饼去，吃到糠饼的人活下来，没吃到的就死了，那个年代，缺一顿饭就会死人。



“老太婆”（1964年）

装他进棺材的时候我见到他的尸体，我无法向你描述。

（两次采访刘曼若，刘曼若两次提到这件事。第一次采访之后的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象沈右派在人生最后一个夜晚躺在床上的心情，想象他渴求吃一粒糖的绝望。第二次采访时，刘曼若说出了第一次她不愿说出的那个组长的名字。我听后感到了另一种难过——我不愿意是他——一个我采访过，自身也十分不幸的右派。）

沈虽然死得惨，但死后还给了他一副棺材，有一个叫文英的右派（文英，新华书店炊事员，以前当过和尚，1957年说他是政治和尚，打为右派，死时约35岁），1961年饿死在同心岛，死后把他草草埋在岛上的“灭资岗”（灭资产阶级），埋得很浅，脚还在外面。他妻子来见到他的脚，扑下去痛哭，一边哭，一边叫：“文英，文英，你脚都还在外面，你不愿意走啊！”

还有卢蕴伯。解放前，卢家三姐妹在重庆很有名气，三姐妹都是知识女性，留学日本。解放后卢蕴伯和妹妹卢蕴兰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卢蕴伯在长寿湖自杀。

张慧光：这是一个摧残人才的时代！

刘曼若：我还算好的，不成人样的是贾唯英（女右派，《重庆日报》副总编，1994年去世），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人，我以前听过她作报告，很动人。在长寿湖见到她，一只手支着棍子，一只手挽着一个竹篮，腰间一根草绳栓着烂棉袄，像个乞丐婆，与她当年作报告的风采相差太大。

我没有饿死，也没有自杀，活下来了。但是，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些死去的同伴，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不去，我曾试图把它们一一写下来，可惜没能完成，这儿有一些手稿，你拿去吧。

下面是刘曼若送给我手稿中的部分内容。（原稿于2002年7月2日被重庆市国安局抄我家时收缴）

小窝棚

我常常想起湖边的小窝棚。

—

那是1967年春天，“史无前例”的风刚刚刮进长寿湖。场部前面那棵迎客的黄桷树下，每天都有几个孩子在藏猫猫，他们不时捡起地上被风吹落的嫩叶，放在嘴里嚼一嚼，赶忙又吐出来：“好酸呀！”马路两边的桃花，红着脸要笑不笑的招呼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被微风吹起的涟漪轻轻拍打着湖岸，把停靠在湖边的一双双飞燕摇来晃去，像母亲在荡着摇篮，轻轻地、慢慢地……一切都和往年没有两样，不同的是，我们就要结束游牧式的基建生活，到边远的岛子里去安家务农。

我们暂时住在红星岛，几个月后再搬到马鞍山去，那里正在修盖草房。

我的新工作是放牛。两条老母牛。人们说母牛很驯，所以让我这半老太婆去放。白天，

牵它们到有草的地方放牧，同时割两背夜草回来。活路倒是比打果树坑、挖土轻松。

长寿湖湖岸弯弯曲曲，有很多小山都爱把脚伸到湖心去，因此，往往水路只几百公尺，旱路都有一、二十里。

一天，我划着双飞燕去寻觅草源。我也学那些老练的放牛娃，把老母牛牵在双飞燕的尾巴后面，我慢条斯理地划，它们有礼貌地跟在后面游。（后来我才知道，它们如果使点性子，就会拱翻我的双飞燕，或者拉着我满湖转。）过了一阵，我发现向阳岗湖边斜坡上有一片鲜嫩的“铁绊钩”，牛最喜欢吃这种草。我的船刚一靠岸，两条牛拖起鼻绳就朝嫩草跑去。它们贪婪地啃着，啃着，啃累了，就躺到地上慢慢反刍，这时我才去给它们打好地桩。太阳爬上顶了，照得我懒绵绵的，肚子也咕咕叫了，我放下镰刀，坐到草地上，从口袋里摸出两个馒头细嚼慢咽。我多想找个阴凉地方歇歇。蓦然，我发现对面是一片阴山，山顶苍郁的柏树丛中隐约看得见一座正在搭的屋架：山下面靠近湖边一个土坎坎上有一个小窝棚，茅草已经变成了黑褐色，顶上长有几根青草，还开着一两朵紫色的小花。窝棚的左面有两丛青翠的细竹，迎着微风摇曳摆舞，那轻柔婆娑的姿态，多像西湖边的垂柳；这不禁勾起了我无边的遐思：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理想，我的梦……一切都已过去。



“我常常想起我的青春，
我的爱情。”

后来我不放牛了，那两丛翠竹，那个小窝棚，那一闪的遐想也从记忆中溜跑了。

二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搬到马鞍山，就是我放牛时看见在搭架的那座茅草屋。

这次搬家，不是一般地换个住地，拿领导的话说，是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就是把摘了帽的（右派）和没摘帽的分开。当然，“右派本质不变”，这个区别对待只是量的变化，没有质的改变：摘了帽的星期天可以休息全天或半天。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如斯而已。

给我们派来了一位新的“管理员。”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是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要我们自己搞伙食（在极左思潮下，右派连炊事员都不能当）；第二把火是发动大家把房屋周围平整清理出来，下班后休息；第三把火最引人注目，他说：“某某和某某两夫妻都在这里，又带着一个小孩，应该（是应该，而不是其他词）给他们安个家。现在没有房子，就先到半坡那个窝棚里去住。小是小一点，毕竟是单家独户。”

“安个家！”一个破烂的小窝棚，窝棚再烂再小，他能想到要给我安个家，我已经感激不尽，何况还真有一席之地的小窝棚，我冷了十年的心又有了一丝丝热气。

星期天一早，几乎全队的人都来祝贺我乔迁之喜。原团市委的干部、快手老黎割来两大捆茅草；二簧管演奏员、泥石木全能冠军老余砍来柏树桠枝，给窝棚换了草，还捆绑了一间占窝棚全面积三分之二的大床；五十年代铁饼铅球冠军，我们的石工队长和副队长，抬来一张石磨底座，砌在窝棚前，作吃饭的小圆桌；工会生产部副部长，我们的

学习组长搬来了三个修整有致的树疙兜当凳子；出版社的编辑、诗人，猪场饲养员老余拿起锄头说：“我来铲条到湖边的小路，免得你们打水遭蛇咬。”美院教师、画家、伙食团长胖大嫂老崔吆喝了两个女同志给我们拆洗被子；党史教员、肝硬化病号老周捧着一个大纸箱，上面盖一块鲜蓝色的塑料布，一边走一边说：“我来晚了，送你们一张写字台，写个思想汇报还是可以的。”

“什么？写思想汇报，你好话都说不来一句。”老黎气恼了。

“对，不写思想汇报，就是不写。”

“对，不写思想汇报，内当家写诗，外当家写小说，小二娃做作业，该行了吧！”老周改了口，围着窝棚的人都哈哈笑了。

正热闹时，三十中老校医，我们的医药顾问兼保管员提着一个刮得黄桑桑的楠竹筒颤微微的走来了：“小刘，我看你们没茶瓶，这个给你们打开水吧！”全队只有他叫我“小字辈”，我双手捧着楠竹筒，像捧着一大块闪闪发光的金子，眼泪禁不住直往筒里掉。

我活了近四十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感到满足，我还差什么呢？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真挚的情谊和关心倾注在我和我的家庭是这么多，啊，让那些电灯电话、让那些漂亮的家具、美丽的穿戴都见鬼去吧！我只要这些，只要同志间的真情实意就足够了，就足够抵御那一切政治上的和自然界的风霜雨雪。

时间在欢乐声中悄悄溜走了，太阳爬到天顶，洒下一片金色的光辉，我们的窝棚沐浴在阳光里，显得格外明亮、金黄。

“来，来，来，没东西招待你们，现炒的葵瓜子、沙胡豆，又香又脆！”我正在心里埋怨：这老张不知到那去了？原来他去搞“余兴”去了。

于是，天南海北、文学艺术、爱人孩子在小窝棚里热烈地讨论开了。

小窝棚里春意浓浓。

十五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城市，住进了有厨房、有浴室、有阳台、有厅堂的高楼大厦，这种套间房在这里一关上门，就和外界隔绝。我常常感到冷清，感到孤寂。于是，我常常想起湖边的小窝棚，我可怜的亲切而温暖的家。

1983.7.14 初稿

采访后记

我前前后后共六次前往刘曼若的家，在她丈夫张慧光去世的当晚，她又交给我一份手稿，上面写有这么一些话：

“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战犯等等，可根据不同情况判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刑满就释放。但右派因为一两句真话，就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劳改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有多少人被残酷的压迫逼疯、逼死、饿死、病死，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二十二年后，一纸命令下来，说反右斗争扩大化了。

就算有几个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但却整了几十万倍甚至上百万倍的人，有这么扩大的么？

我栽在“向党交心”运动

张慧光

1957年重庆出版社编辑



我1959年1月才划成右派，栽在“向党交心运动。”

1957年鸣放期间我在峨嵋山，没有参加鸣放。6月份，人民日报的反右社论出来了，还登出了《咱们工人说话了》之类的反右文章。我读起来不是个滋味，说了几句话：“你请人家提意见，提了意见又打人家，这就像请人做客，客人进了门你抄起棍子打人，这个道理说不通。”

我不识时务，这个时候还说话。

（其实不是“不识时务”，而是想不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会使出街头流氓或黑社会老大都要忌讳的手段。）

但是没划我右派，妻子刘曼若当了右派。

1958年初，刘曼若丢下两个娃儿，下放南桐劳动改造，我独自带两个小孩。下半年，党组织宣布反右告一段落，现在是内部向党交心。我这个时候才把我的“心”交出来，



把心交给党（网络图片）

主要有两点：一、匈牙利事件我认为不是反革命事件。二、南斯拉夫不一定是修正主义，它应当有自己的发展模式。

问：你已经看到说真话的下场，妻子也当了右派，为啥还要说话？

张慧光：我是个直性子，心里想啥就要冒出来。我旧小说读得多，深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风义胆的影响。

不过，后来我也惶惶不安。

那时，出版社在李子坝，从一个台台上去是大门。鸣放时领导把门关了，改道从旁边石梯上去，一进门，就看到一垛泥巴墙，1957年至1958年那垛墙专门用来贴揭发、批判的大字报。三天两头有人被点名，如：某某某在鸣放中说过，共产党是啥子啥子。起初还有人反驳、辩论，后来发现完全是党组织在幕后操纵。张三揭李四，李四揭王五，计划科李黛林（长寿湖右派）头一天写人家，第二天就轮到自己。党组织在幕后奸笑。越到后来我们越明白，某人被点名是党内授意，不是群众之间观点不同，观点不同还可以辩论，但一旦被点名，就意味着你是右派了。

大家都非常紧张，每天上班进门爬那个梯坎，脚就发软，看那垛墙，心惊胆颤，生

怕出现自己的名字。我们把那个梯台和那垛墙称为“生死台。”你年轻，不懂那种恐怖。我预感到自己跑不脱，非常紧张，刘曼若已经遭了，娃儿得靠我。晚上我睡不好觉，望着两个娃儿，担心第二天上“生死台。”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难受得很。一天又一天，终于“盼”到了那一天——“生死台”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我的心“咚”地一声落下去，不再悬在半空，咳，心安了，那天晚上，我平平静静睡了个好觉。

给我定的罪名是：乘交心运动向党进攻，交黑心。

到长寿湖后，我学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伸能屈，这个改造还漫长得很，看不到头。说一句话，整得比刑事犯的刑期更长，劳动更重。

那时我们的劳动是很残酷的，比如，每人一天要完成土石方10方。一方是3700斤，10方是37000斤！37000斤你得自己挑，挑到堤上，自己得夯紧。

我们家的情况刘曼若都讲了，我给你讲讲几个长寿湖右派的故事。

白永康是个教师右派，他体质好，耐摔打，干活一个顶俩。轮上给伙食团挑水，别人累得喘大气，他却不当回事儿，天雨、路滑，照样满挑儿走得闪悠悠。大伙都羡慕白永康，说他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象棵实心竹。

那天，突然传来一片喊杀声，一群红卫兵从山坡上黄桷树后面杀声震天的冲下来！气氛十分恐怖，让人想起围猎；不过，困兽还可以逃窜或者反抗，我们连自卫之力也没有。……许多人吓懵了，白永康正在挑水，脸色一下子惨白，像得了热病，浑身颤抖，目光痴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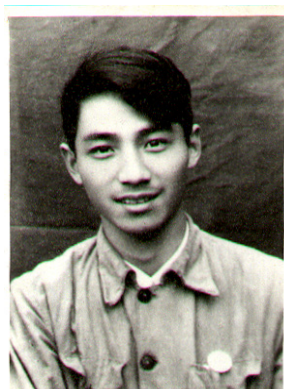
白永康秘藏的两本日记给红卫兵抄走了。事情非同小可，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他都记了抨击性的言词。

我们都认定白永康这回完了。

处置迟迟没来，白永康日子难过。人总是这样：无论结局有多糟，该来的就巴望它快快来。

这中间，白永康曾有过一次绝望的行动——逃跑！晚上吃饭时，白永康不见了，全队马上集合，分两路出发，一队上山搜索，另一队去封锁通向外界的路口。

山上长着青杠、麻柳，林间茅草没顶，葛藤缠身，闹腾了大半夜，不见踪影，人人心里都窝火。就在这当儿，刹啦啦一阵响，脚边的草丛里忽地钻出个人来，一看正是白永康。他神色凄惶，额上脸上挂着血印，抖抖索索对我说：“我，我糊涂，惊动了大家，我对不起你们。”我不知怎样回答，我相信他已后悔，省悟到这举动纯属糊涂，中国地盘尽管大，人的立锥之地却很小。就算你



当右派前的张慧光 1958年12月



张慧光，刘曼若在马鞍山住过的旧居（谭松摄）

能从这儿跑掉，跑出这座山，跑过这个县，甚至这个省，那又怎么样？迟早还不是要给捉回来！我想老白未尝不懂这个理，他是精神负担太重。

从此，白永康被严加看管。抓他时，他表现很平静。警察一来他便伸出双手，铐上之后他回头看了一眼，接着快步登船。行前他悄悄向我话别，说：“此去凶多吉少，看来是永别了。”

当天传回消息，白永康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还有一个叫胡朝聘。灾荒年我和他同住一间屋，同吃一个灶。他这个人十分本份朴实，走路轻轻的，做事一声不吭。他总共只读过三年书，因为家远，早出晚归，中午饿一顿；没有鞋子穿，一年四季打赤脚。他明明不是知识分子，却把他整成“资产阶级右派。”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最初不说，问了好几次他才告诉我，他遭在一次“玩笑”上。那是五十年代初，他苦于找不到对象，有人对他说，可以找领导解决嘛。于是有一天，他在领物单上填写：请发婆娘一个。单子交上去，领导根本没看，大笔一挥：“照发。”领物单传到库房才发现这个“玩笑”。领导很有些下不了台，十分恼怒，怕别人说他官僚主义。五七年反右一来，领导报一箭之仇，把他打成右派。

他下长寿湖时，已经有了老婆，而且夫妻非常恩爱。这事整得他一声声长叹，非常后悔。

在渔场，胡朝聘虽然为人正派，干活踏实，但两次摘帽都排不上号。人家嫌他出力太少，不起眼，其实他是体弱多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一天，我接到一封信，陌生的笔迹，陌生的署名。信是胡朝聘的妻子写来的，她问我：为什么胡朝聘总摘不掉帽子，是不是他改造不好？她叫我实话告诉她。我觉得为难，怎么向她讲呢？几次提笔又几次搁下，日子一天天过去，信还是没有写。

事后想来，我是铸了大错了。就在那年秋后，我到一個公社去出差，一去一个月。等到回来时，胡朝聘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婆娘来过了。”

“人呢？”我问他。

“走了。”

原来他们离了婚。她早不来迟不来，偏偏我不在的时候来，否则，我会弥补我的过失，当面说明原因，他们也许不至于离，这事我直到现在都在自责。

我问他：“胡老大，你为什么就答应了呢！劝过她吗？”

“不必了，这样好些。她还很年轻，又没有娃娃的拖累。其实下来前我就向她提出过，她当时不答应。”

事后我了解到，那天从法院办妥手续出来，他们两人边走边谈，轻言细语，彼此没有一丝埋怨。临别时两人依依不舍，胡朝聘拿出身上仅有的一斤粮票，买来十个馒头（那是灾荒年）非要交给她。他妻子（此刻已经不是妻子了）推了回来，说：“你带回去，你的粮食不够吃。”两人推来推去，车要开了，最后只好平均分配，一人一半。车开时，她回过身来很深情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要多保重，如果有机会，请到我家来……”

从此以后，原本沉默寡言的胡朝聘更难得说话了。后来他自己憋得难受，主动向我谈到了她。

他说：“你不知道她待我有多好，可我让她受了许多苦，想起来真是对不起人家。人讲情义，换了别人也一样。我想忘掉她，不得行，忘不了……我常想，她现在自由了，该找个对象了。我真希望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又有了新家，那我就了却心事了。”

好不容易熬过了灾荒年，阶级斗争的弦松动些了，市场物资也丰富起来。住在城市的敏感的家属们纷纷下来探望自己的亲人，其中也包括一些离了婚的夫妻，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有人曾以自嘲的口吻，用三句话概括了当时情形：一个摘了帽的右派，带上离了婚的妻子，去进不收粮票的馆子。

右派离婚，本是不得已，环境宽松一点，马上就和好。

我萌生了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她突然来找胡老大，老大似乎也想到了这一层。然而，等了一天又一天，希望越来越渺茫。

我对他说：“她不会来了。她不来，说明情况有变，别再想了。”

他很平和地说：“她肯定成家了，这样好，免得再牵挂。”

随后我们各自分开。不久我听说，他终于摘掉了帽子，我很为他高兴。后来我们相见，他告诉我，他回了一趟城，到厂里去找了她。她见到他很是高兴，但告诉他，一年前她又结婚了，胡朝聘也向她报告了喜讯——他摘帽了！话刚出口，她面色大变，眼泪刷刷流下来，她掏出手绢揩了又揩，总揩不干。胡朝聘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瞬间，一张十元的钞票塞到他的手上，同时她转身就跑。等他醒悟过来追上去，人已走远，只看见一个低头抽泣的背影。

“她为什么哭？”我问他。

“大概是为我高兴极了，人一高兴有时反倒会悲伤。”

我真愁，那女人必定失悔了，要是再等等，事情说不定会是另一个模样。也可能她并不幸福，像胡朝聘这样厚道、体贴的人世上毕竟不是很多的。

后来他再没有向我提起过她。落实政策的前一年，他来看我，忽然说：“不晓得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时候冲动起来很想跑去看一眼，又觉得不妥当。”

我晓得他忘不了她。

胡朝聘八十年代去世了，我忘不了他。



胡朝聘 1964 年

第三个是个文人，叫余 XX，他一直生活得惊惊惶惶，总担心有什么灾祸要落到头上，尤其是形势紧一点，更是惶惶不安。所以他一年到头都在观察形势，天天揣摩管教干部的心思。管教干部同谁多谈了几次话，委派谁多做了几件事，他都要不安。管教干部最喜欢听揭发、汇报，余 XX 投其所好，悄悄记下其他右派的言行，向管教干部汇报。余 XX 这个人记忆力特强，可以把你的原话一字不漏记下来，原原本本汇报上去。我同他算是朋友，他连我也汇报。有一次我们一块撒尿，我望着黑沉沉的天叹了口气说：“这个日子看不到头，这辈子可能完了。”还有一次冬天修东风荡，那是个要折磨死人的劳役。还没修完，一场从垫江来的大水把坝冲垮。我松了口气：“好了，好了，我们可以活出来了。”事隔了好些日子，余 XX 揭发我，一字不差，骇得我发抖。

管教干部最喜欢这种告密者，所以余 XX 比较受器重。不过，他犯了众怒。曹贞干、高志长、李普杰、杨正秋等联合起来，共同揭发他。一篇一篇地揭发，由也是搞写作的文人杨正秋执笔（杨改正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陪都夜雾》）。次数多了，管教干部开始对余 XX 产生了疑心，冷落他。余 XX 慌得不得了，那个失魂落魄的样子也可怜。（黎民苏说，管教干部陈 XX 骂他：“你是条狗！”余 XX 慌忙站起来，连连点头：“是、是、是，我是条狗，政治上的疯狗，生活上的饿狗。”）

刘曼若：余 XX 也是为了求生存，如果不是环境逼迫，他也不会那样。他多次说过，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当个组长。你不要小看组长，那是鼓励他生活下去的信心。为了这种“上进”，他付出得多。有段时间我们右派的所有进出信件都要被拆开检查。余 XX 便在给他老婆的信上大谈自己如何热爱养猪，如何甘心为社会主义养一辈子猪……

（注：长寿湖好多右派都提到余 XX，有不原谅他者如向光棣——恶狠狠揭发向之后至今不道歉；有认为他太夫人格者如蒋维亮——余 XX 跪步移到红卫兵面前讨好地解释莎士比亚，等等。1979 年，余 XX 改正之后又拿起笔写作，我读过他的多篇散文诗，文字还算优美，但毫无风骨，连一点痛苦都没有。半年前书店里见到他新出版的一部书。在后记中他开篇写道：“我有幸生活在这个千年难遇的盛世……”

余 XX 的不幸不在于他当了 20 年右派，吃尽了苦头，而在于他被改造成“终身残废”，再也站不起来。作为一个作家，在经历了个人、家庭的巨大灾难，在目睹了国家、民族的惨烈浩劫之后，没有痛苦的反思，仍然是长寿湖的德性。这种不幸，是余诗人的真正不幸，当然，也决不是他个人的不幸。）

张慧光：长寿湖有三个管教干部值得采访，一个是改右学习班主任。这个人非常典型，他公开宣称：我要把改造右派工作作为我的终身事业。他整了好多人，至今不向任何人道歉。

第二个是改右学习班书记。他自己也有“问题”，想通过对右派严酷无情来表现积极。他后来被排挤，贬到了团山堡，他内心也很孤独。1979 年之后，他也没向右派道歉，但是，对右派热情，见面握手，求他帮忙（他后来在市人大法制处），他也热情相助。



在 2000 年 9 月长寿湖的“分子”聚会上，管教干部郑修成（左）与当年的“右派分子”握手。正中为管教干部陈锡元。

第三个是改右学习班指导员郑修成，这个人在长寿湖还算温和，1979 年之后，他逐家逐户登门向右派道歉。现在我们成了朋友，他进城来经常到我家耍，是个有良心的人。

八十年代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回声》，本来我打算专门写长寿湖，但总编不同意，结果只放了几篇回忆文章。长寿湖故事还多，下次你来我再给你讲。

采访时间：2001 年 5 月 7 日，2002 年 3 月 25 日，地点：重庆出版社

(本篇采访录的部分内容采用了《回声》中的文字)

补记:

张慧光老人于2009年9月20日去世。

张慧光自述:我少年时代在抗日烽火中度过,家被毁,人流亡,历尽苦难,几度失学。抗战胜利后在浙江衢州中学高中毕业。1949年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时参军入伍,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至重庆。曾任重庆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编审(相当于教授级高级编辑),主编过系列文学著作《萌芽丛书》、《红岩丛书》等。业余从事写作,杂文、小说、散文等。

采访后记

我曾多次登刘曼若、张慧光的家,2009年6月,我又一次前往,家中只有刘曼若。

又说起长寿湖,刘曼若又是热泪盈眶。

一个多月后,张慧光突然打来电话,约我前去他家。

很少有右派主动打电话来。我立马动身。

在山城的酷热里,老人精神矍铄,思绪清晰,面对镜头,滔滔讲起往事。

仅仅一个月后,他突然离去了!

冥冥中他预感到什么吗?在我们最后的一次相见里,我永远留下了他的音容与讲述。

当晚,我赶到他家,他妻子刘曼若久久地抓住我的手,良久,又交给我一份文稿:“我没写完,现在再没心情写了,你拿去吧……”

9月20日的夜晚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夜风带来淡淡的秋凉,离去前,我在纸上写下:“刘阿姨,您一定要活着看到《长寿湖》一书的出版。”



刘曼若,张慧光1952年留影



五十年后(2002年)
夫妻俩在长寿湖狮子滩坝下留影

一九五八年，三口之家一分为三

朱培德：1957年重庆市委组织部干部，1931年生

赵瑞珠：1957年重庆市民政局干部，1933年生



赵瑞珠：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我正在学校读书。刚16岁，就遇上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我激动得再也坐不住，丢下书本，参加了解放军。大西南解放后，我随西南服务团来到重庆，进入市民政局。

1957年鸣放，我提的主要意见是关于肃反。

肃反运动时，我是民政局肃反工作的党内小组长，在那个位置上，我看到了肃反运动的一些问题。一是不实事求是，比如，随意说人家杀了多少多少人，结果根本没这回事，整错了。二是搞逼供讯，用暴力强迫人家承认。我认为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对整错了的人，应当给人家平反、道歉。

另外，我们有一个局领导是个老红军，开会时常常打瞌睡，我对此又提了一条意见。这两条意见变成两条罪状：一、与坏人内外夹攻，攻击党的肃反运动。二、攻击共产党的老干部。

再就是说我同丈夫划不清界线。朱培德是市委组织部干部，他比我先划为右派。不同他离婚，就是划不清界线。

1958年初，突然宣布我是右派。那位老红军局长说：划你右派，就是因为你态度不好。这年，我才25岁，女儿刚刚半岁。



1958年4月，单位通知我到四川通江县劳动改造。当时，朱培德已经去了长寿湖，我一走，女儿怎么办？我只得拍加急电报把婆婆从上海叫来，让她把女儿接走。

那是一个黄昏，我在江边送女儿，我低头给她喂最后一口奶，我眼泪流下来，滴在她的脸蛋上。喂完奶，婆婆抱着她登上船，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心都撕碎了！婆婆家人口多，有兄弟姊妹10人，生活已经很困难，活生生又增加一口人，要是没奶吃，怎么办？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害怕听见女儿的哭声，我强迫自己转身往回走。天，好象黑了，大脑一片空白，眼前昏昏糊糊，我歪歪倒倒，一下子摔进一个黑洞洞的船舱！

鲜血从脚上流出来，我痛得浑身打颤，你看，脚上这块伤疤，就是那天晚上留下的。

一个好端端的三口之家，一分为三，我去通江，丈夫在长寿湖，幼女去上海。这是为什么？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女儿突然失去母亲，失去母奶，终日啼哭，在去上海的船上，她哭闹了几天几夜，到上海后，瘦得不成人样，我得到这个消息，痛不欲生。

（就是这个女儿，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了当地的最高分，但由于父母是右派，被大学拒之门外，她又一次猛然消瘦——几天之内，体重下降8斤。）

我在通江和綦江农村劳动了两年后调到民政局属下的福利院。1962年，我受不了家庭破碎之苦，主动申请到了长寿湖。不久，我又将寄养在上海的女儿接来。我们破碎了五年的三口之家，在长寿湖团聚了。

（赵的丈夫朱培德也是上海人，高中毕业那年上海解放，他随西南服务团进川，先在北碚搞减租退押工作，1953年到重庆市委组织部。）

朱培德：我被划为右派，还有后来吃那一连串的苦，包括被抓进监狱，与我性格有极大的关系。我做事情太认真，还喜欢提意见。我常跑基层，只要我了解搜集到的情况同领导讲的不一样，我就要向领导反映，而且不厌其烦。次数一多，领导烦了，说：“你是部长还是我是部长？”到了这一步我还不清醒，总怕领导不了解情况作出误断，继续喋喋不休地反映。

结果就不用多说了。

后来回想起来，1957年我只要稍微“聪明”一点，顺风使使舵，这辈子就是另外一个活法。1957年之前我曾听说过共产党内部斗争激烈残酷，但没有亲身体验，感受不深。1957年之后，我才知道厉害。不过我这个人本性难移。“认真”的秉性一辈子改不了。不对就是不对，怎么说还是不对。所以，“改正”后我当纪检干部，那些官员都怕我这个性格。我一直坚信，凡是错误的，就要斗争，真理必须坚持，一代人不行，下一代人接着干，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67年，我因为“翻案”被抓进长寿县监狱。在监狱里我带头高唱国际歌，精神没有垮，我坚信自己是无罪的。”

赵瑞珠：抓他时，我吓得不敢，那声势和场面很恐怖。他们把他从车上抛下来，他腰受的伤至今没好。我赶紧把两个女儿关在屋里，不要她们看到爸爸被抓。我给他收拾东西，居然还给他装了一本毛主席语录。

他被抓后，我束手无策，不要说救他，自身都难保。我担心自己也要被抓进去，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给丈夫的弟弟写信，告诉他，一旦我被抓，就来把我的两个女儿接走。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对我们好的是当地（大洪湖渔场——距长寿湖几十公里的一



1957年反右漫画

个渔场)的农民。农民说：“哪有这么多坏人？我们看你就不是坏人。”动乱最厉害时，我带着女儿住到了农民家里。在农民那里，我看到中国的农村太穷了，中国的农民太苦了！终日吃不饱，穿不暖。一位队长对我说：我宁愿当你这个反革命，每月总有几十斤供应粮吃。看到农民的那种贫苦，我觉得我的苦难减轻了。

(注：1979年朱培德夫妇获得“改正”后，他们在长寿湖长大的小女儿，16岁的朱艺考入了四川大学，也算是命运给他们迟来的一点安慰和补偿。)

赵瑞珠：我们夫妇对党的感情仍然很深，自己虽然受了不少苦，但对党并没有怨气。党是要犯错误，冤枉一些人也属正常。只是毛泽东给国家造成的灾难太大。

共产党本身还是好的，当年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都正确，但它丢掉了很多优良传统。现在很多人入党不是像我们当年那样，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一切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党应当经常到基层来调查，问题主要出在下面……

采访时间：2001年6月16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

这是一对共产党内的好干部，正直、忠心耿耿、不畏权势、疾恶如仇。我听好些人提到朱培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他干工作认真严谨、铁面无私，扳倒了好几个颇有后台、不可一世的贪官、霸王爷。老百姓为他欢呼、放鞭炮。

朱培德说：“我一直坚信，凡是错误的，就要斗争，真理必须坚持，一代人不行，下一代人接着干，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他们还认为，共产党这棵大树的根是好的，只是有些叶子腐烂了。



长寿湖右派劳改旧居 (谭松摄)

我十次大难不死

练冰梧

1957年公安学院重庆分院（西南政法
大学前身）理论教研室教员。

1926年生



我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但我很早（1945年）就同共产党有了联系，参加过成都金堂县的乡下暴动，解放时参加剿匪工作，1951年3月进入公安部门。

我到重庆是1954年，由四川省公安厅调到公安学院重庆分院（现西南政法学院前身），在理论教研室教哲学。

1957年党组织动员我积极参加运动，其实，无需动员我也要积极，我正要入党，支部已经通过了，正在关口上。组织上派我到市工会搞反右，当副组长，还指派我在四川外语学院大礼堂作报告，批判大右派分子董时光。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嗓门特别大，中气十足，你看我现在声音都响亮，那时候年轻，热情高，又要争取进步，更是吼得响。我在台上批判右派分子，气壮如雷，效果好得很。

我风光了几天，接下来角色转换，批判我的大字报出来了。

首先出来揭发批判我的人叫苏X。他把我平时的一些言论，掐头去尾，剪接拼凑，编成一个个吓人的罪名。他在大字报上推论说：练冰梧出身地主，他父亲在土改时自杀，因此他仇恨党。

我父亲的确是地主，但他是个开明人士，一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解放前我们兄弟五个都参加了革命。正因为他开明、进步，解放后搞减租退押时没有点他的名。别的地主挨斗但他安然无恙，他自杀是因为害怕，他看见开会斗打其他人，声势凶猛得很，他心理上恐惧，上吊自杀了。

我同苏X无冤无仇，他为啥要突然跳出来整我呢？原因是他出身地主。他不仅出身地主，还继承了产业。他感觉自己处于危险中，很可能被抛出来打成右派，他想以攻为守，通过整其他人表示进步，表示革命。

不过，光有苏X揭发，我还不会遭殃，因为院长还重用我，需要我给他写材料。

可惜我这个人运气不好。

我的顶头上司杜之真同我关系很好，他是理论教研室主任，原省公安校教务长，我们一起从省公安校调来。学校副教务长艾XX是西南公安校来的，与杜之真属不同“派系”，有人认为艾和杜在争夺党委委员。艾一心想把杜打下去，但一直没有机会。反右时，艾翻出杜之真在1956年说的一句话大做文章，往死里整。杜之真招架不住，中箭落马，成了右派。杜之真那句话的起因是这样的，1956年，他看到中央确定的副总理全是共产党员，就说：“这件事共产党做得不太好，给民主党派安一、二个位置，做做样子也可以嘛，

全都是中共党员，在国际上说起来也不好听。”

杜之真当右派后，也下放长寿湖，他女儿因此疯了。

艾要打杜，就要打我，说我们一起反党，是反党联盟。另外，学校有一个副院长奸污了一个川大毕业的女学生（也许是通奸），事情露馅后，副院长强迫我同这个女生好，我坚决不干，这事大大得罪了副院长，他就是后来非要整我的人。

就这样，基层的苏 X，中层的艾 XX，上层的副院长因为各自的原因牵成了一条线，都要整我，我还跑得脱？

我先到南桐农村，后转到长寿湖。我下去后惶惶不安，生怕说错一句话，精神上很紧张，这是第一压力。第二是“学习”压力，写检查、写交待、写得昏天黑地。第三是经济压力，工资没了，只有十几元生活费。第四是劳动压力，那简直是奴隶般的劳动，不少人就是被这种劳动压垮。我 36 岁才结婚，妻子叫熊先尧，原是 41 中（现巴蜀中学）教师，也在长寿湖。我女儿和儿子都生、长在长寿湖。

我给女儿取名练红，练，是洁白的丝，洁白的丝染什么颜色最美呢，我觉得是红色，所以，我叫她练红。为这个名字，管教人员批斗我，说：“你一个牛鬼蛇神，你娃儿还想红？”

几年后儿子出生，我给他取名“练牛”。管教人员又批斗我，说：“你当了牛鬼蛇神，你还要你儿子当牛鬼蛇神？！”

儿女生长在长寿湖，天天同水打交道，要生存，必须会游泳。我儿女二、三岁就下水，我忙，没时间慢慢教，干脆把他们往水中一丢，他（她）要求生，必然拚命扑打，我站在旁边看，实在不行了，提他（她）一提，这法子简单快捷，只是娃儿多呛几口水。有个叫萧思辉的右派（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右派），他一心想教女儿萧妮游泳，但他自己不会。他找来一本书，站在岸上，一边看书一边指导女儿：“埋头！出左手！夹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女儿教会。

我住在飞龙岛，女儿上学没有船，每天下湖游水，书包放在洗脸盆里，放学时等 6 点多钟的粪船回来，等不及她又游回来。她为上学来来往往游了一年多，直到修了一道堤坝。我女儿游泳很棒，是重庆市的 2 至 6 名，但她不会转身，所以没得第一名。

在长寿湖我有十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赶马车三次遇险：一次抬钢板差点被洪水卷走；一次被埋在马房中被挖出来；其余五次都是在水中。最绝望的是那次和儿子遇险。那是 1972 年，我带儿子划船去守夜，守夜就是守渔网。半夜时分，突然变天，一阵阵狂风掀起大浪，暴雨劈头打来。我的船小，根本顶不住，翻了！儿子和我双双落水。我冒出水面，四周一片漆黑，看不见岸，更看不见儿子，儿子只有四岁半！我急疯了，张开喉咙大叫：“牛儿！”“牛儿！！”风大，浪又高，头顶上是隆隆的雷声，我觉得到了地狱。我想完了，要是儿子淹死，我也不回去了。我在黑暗中抓住一块桡片，心想是不是该结束生活。这时一道闪电，我看见湖岸不远，顺风朝岸游去，一会就上了岸。嘿，你说巧不巧，我儿子就站在岸边！他从小在水中滚，三岁就会游泳，船打翻后他不慌，没沉下去，幸亏风浪正对着湖岸吹打，把他打到了岸边。他看见我，跑过来一把抱住我，没哭！！我把他抱起来，激动得全身发抖！

我儿子从小就非常坚强，再痛、再委屈都不哭。7 岁那年他在长寿湖一个乡村小学的课桌上做疝气手术，条件很差，两个多小时，他一动不动，一声没哭！不知这是不是

同我不顾死活地把他往水里丢有关。

我十次大难不死，就是要活下来看看这场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资本主义革命后建立了一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了什么？！毛泽东把封建那一套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上，又一心一意学斯大林，《古拉格群岛》中的情景与我们很相似。

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但不彻底否定反右，1957年他就是一个打手。正因为不彻底平反，工资不补不说，一部分人还想秋后算帐，还想整我们。1957年我们学校总共几十个教师，就整了十个右派，其中一个送峨边劳改。没死的“改正”后生活工作都不顺畅，原因就是彻底否定1957年。

我认为毛泽东的政策是滋养假话和腐败的养料，眼下的腐败，根子就在毛泽东时代。贪污腐败历来就有，只不过被掩盖了。我们这个制度培养投机取巧分子。当年吹捧毛泽东，公开讲：我们服从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我们信仰毛泽东思想要信仰到迷信的地步。这是培养奴隶和奴才，什么社会主义？！是非善恶被颠倒，不准有个人思想，也不注重个人品质，这就为种种坏人大行其道大开方便之门。

采访时间 2001年6月11日 地点：西南政法大学

采访后记

练冰梧副教授（1979年“改正”后教共产主义运动史，评为副教授）仍是一副铮铮铁打硬汉的形象，加上他嗓门洪亮，中气十足，虽75高龄，不见丝毫老态衰容。

但是硬朗的嗓音掩不住他眼眸深处的担忧和恐惧——说不知哪天共产党还要整他！

刚开始谈，他就神秘地压低嗓门说，他凭直感，有一股恶势力在等待时机，还要整他。他和成中霖（西南政法大学右派）的档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他怀疑这是有人别有用心藏了起来，打算秋后算帐……

我问有没有当年的老照片，他说，有一张他们全家在长寿湖土房前的合影，土墙上还写着打倒他们的标语。他答应找到后提供给我。后来，我数次打电话讨要，都没有结果。

据长寿湖的其他右派说，练冰梧在长寿湖的经历十分丰富。但是，他说得不多。

练冰梧教过共产主义运动史，还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他的担忧，很自然。

长寿湖下放学生徐瑗（女）的一次亲眼目睹：

那是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一天，我突然听到有人扯开嗓子大叫：“不得了呀，右派分子要翻天了！”我们跑出来看，只见几个一向很“左”的人把练冰梧捆绑着押过来。他们对他拳打脚踢。其中一个姓徐的人，下手最狠，他把练冰梧的头压在地上，下死劲打，打得练冰梧满面是血。这个姓徐的，自己出身也不好，他想通过狠狠整右派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

一个十四岁小女孩的 “历史问题”

熊先尧

1958年巴蜀中学地理教师



我14岁那年，日本鬼子打到贵州独山，表哥的堂兄给我一张油印表，说是保护学校，防止汉奸的通讯员表。我花一分钟就填好了，就这么一分钟，赔了几十年，不，是一生。

我是贵州人，两岁多父亲就去世，母亲无法生存，带我回到她老家重庆大足县。一年后，母亲因悲伤去世，我成了孤儿，寄养在姨父家，姨父是个乡长。我整个童年没有欢乐，寄人檐下，但还能进学校读书。初二那年，我14岁，日本鬼子打到贵州独山，姨妈说，你们学生应当爱国，如果有汉奸破坏学校，就要起来反对。我经历过日本飞机的轰炸，我很害怕，也很恨日本人。

就在这时，我表哥的堂兄给了我一张油印的单单，是个通讯员表。他说，填这个表是为了抗日，发现了汉奸要汇报，要主动保护学校，他还要我约其他同学填，我约了一个要好的朋友。

我一分钟就填完了，完了也就永远了结，没有任何活动。

1945年我初中毕业，在姨父家做家务。1947年我独自一人悄悄跑到重庆，考入重庆女子师范学校。

解放后我在南岸龙门浩小学教书，在争取入团时我主动向组织交待了14岁填表的事。你问不提那事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我那时把党组织看作亲人，一切都要对组织讲。我是个孤儿，从小很渴望爱和依靠，解放后我有了工作，有了单位，有了组织，就像有了家的依托，一切都愿意交给这个“家”，而且我也没把填那个表当回事。还有，我觉得做一个人应当诚实。

团组织对这事审查了很久，一年多吧。我虽然有些不理解，但觉得应该接受考验。那时我看了不少英雄人物的影片：《卓娅与苏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刘胡兰》、《赵一曼》等等，影片中的女英雄对我影响很大。我认为一个人应当经得起考验，虽然审查我，但我工作仍然非常努力，我要争取党的信任，我觉得能得到组织的信任无比荣幸。

1952年我终于入了团，1953年我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地理专科，1955年审干，我又主动把这事给组织交待，这一交待，断了我留校的路。

西师副院长王逐平给我作了结论，结论是：经过组织审查，本人交待与事实基本符合，不予处分。

王院长对我说：“本来打算把你留在西师，但你历史上总有点问题。不过没关系，只不过是一块玉上面一点残渣。”

虽然没能留校，但他的评价给我很大鼓励。

1956年我分到巴蜀中学教书，两年后，1958年12月，学校领导对我说：“你的表现是不错的，教书、社会工作都干得好，但是，我们觉得你对你的历史问题没认识，组织决定你下去锻炼一下。”

我这个人非常追求组织的信任，没这种信任，觉得活着都没意义。

离校时我很伤心，所有的书都不要了，我不想再回到这个教育界，太难处！前面说你表现好，后面说你对历史没认识，要赶出去改造。我想，走就走，考验就考验，日久见人心，我一定要向组织证明，我是个好人的，忠于党，忠于祖国。

1958年给我的处分是降级，但保留公职。从南桐转到长寿湖后，重庆市教育局把我们教育系统的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全部开除公职。我没家，无处可走，于是留在农场，每月拿18元生活费。

在长寿湖，我喂过猪，放过羊，下过田，养过鱼，不管干什么，我都非常卖力，猪病了，我拿自己仅有的18元去买药，一心想把工作做好。当然，也怕猪死了把我再打成现行反革命。

1963年，农场一个女右派杨惠云（团市委右派，文革时投湖自杀）当介绍人，把我介绍给重庆政法学院的右派练冰梧，我向管教干部江渭滨请示，他说，你可以结婚了嘛，于是，我同练冰梧走到一起，这年我33岁。

虽然结了婚，仍然分开住。我属于历反（历史反革命），集中在团山堡，老练是右派，住在飞龙，后来我们有了一儿一女，儿子托给农民带，女儿交给狮子滩的一个工人，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

最令人心酸的是我后来的“改正”。

1979年练冰梧“改正”回到重庆，但是，一直拖到1982年都不给我落实政策。我从长寿湖到重庆，往往返地跑，老练为我写了一尺多厚的申诉材料，市教育局和巴蜀中学（那时叫41中）的领导就是不理。1958年整我的人，校长周X（当年是副校长）等还在台上，他们甚至说，查了我的档案，1958年没有给我戴帽子，不属于落实政策范围，不予解决。

我这23年的劳改是怎么来的？

我们给中央给市委写信，不要命地奔波，那又是一种凄凉和悲愤，真的一言难尽！14岁，还没到法定年龄，无非填了张表，就是判刑，24年也够了。最后，市委书记王谦知道了这事，他找到市教育局的领导说：“一个14岁的初中娃娃，多大的历史反革命？”据说，教育局的人思想还是不通，总觉得我们这些人有问题，但市委书记干涉，只得办。

我这才从长寿回到重庆。



飞龙岛右派养猪场旧址（谭松摄）

回来只教了两年书就退休，工资也没提。

采访时间：2001年8月18日 地点：西南政法大学

采访后记

采访练冰梧时，他妻子熊先尧静静坐在一旁，练冰梧慷慨激昂，她一言不发，脸上挂着祥和的表情。我不知她也是长寿湖难友。

两个多月后，我又来到西南政法大学。

听完她的讲叙，我在重庆8月40度的酷热里打了一个寒噤：我女儿碰巧也是14岁，也读初二，也有人不时在叫她填表、签名，一会是反“邪教”法轮功，一会是反对美国霸权。

假如某天风云突变，也把她打成个什么“分子”，劳教她二十、三十年？！

整理熊先尧的录音时，正好遇上美国“9.11”事件。中国民众一片欢呼，女儿的同学说：“死了那么多人，太惨了！”她的班主任（一位学英语的年轻人）很气愤地驳斥她：“什么太惨？！美国太坏，活该！”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困惑而愤懑地追问：我们血液中的这种狼性是哪儿来的？！

我们（中国人）血液中的这种狼性是哪儿来的？！

从几十年前那个教育局和那个校长的冷酷，到几十年后那个班主任的冷血，这个民族没有丝毫的长进。



1957年反右漫画

长寿湖也有美好回忆

李多明

1957年重庆总工会煤矿工会干部。

1934年生



我的一些想法、观点与你采访的其他右派不一样，不晓得你哪个看，但我是从心里这样认为的……

1942年，我8岁，从四川江安县来到重庆，进入了江北新村小学读书。11岁那年，我哥哥问我：“你认为哪个人最伟大。”我说：“蒋委员长。”“还有呢？”“孙中山。”他又问：“你认为哪个在打日本人？”我说：“蒋委员长。”哥哥听了我的回答，觉得问题严重，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对我说：“这个学校你不能再读了，马上转学。”

哥哥把我转到了蜀都中学，这所学校是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找人创办的，我进去受到了另一种教育。

在江北新村小学，我们受老师影响，觉得斯大林恶，有同学把他画像的鼻子都挖了。在蜀都中学，受共产党影响，我们觉得世界上最好最亲的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救国救民、大公无私；国民党黑暗、专制、腐败。我开始走上街头参加抗暴运动。那一年（1946年）我才12岁，读初一，小小年纪就在街头演讲，有什么会学校要去人演讲，都是派我去。那两年，我积极得很，红火得很，虽然成绩下降，但在学校出了名，人人都说，这个娃儿勇敢。学校宠我，养成了我一生的两个致命弱点：一是锋芒毕露；二是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点在五十年代和长寿湖都让我吃了苦头。

解放后我在市总工会煤矿工会工作。我年龄不大，脾气很倔，敢说敢闹，经常得罪人。我是共青团员，一心一意想加入共产党，我非常热爱它，真的，它在我心中神圣得很、崇高得很。但是，就因为我在单位上人缘关系不好，入党没批准。



1957年的李多明

我这么爱共产党，1957年为啥还要给它提意见？我看过一本书，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面有个工程师，非常谦虚，别人给他提意见，他高兴得很，说每个人都有缺点，我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需要别人来提。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虽然倔犟，得罪人，但别人给我提意见，我真心地接受。共产党虽然好，但不可能没有缺点。我所在的煤矿工会，有棱有角的干部总是受打压，吹牛拍马的人得到提升。还有，报纸上讲成绩大版大版，缺点轻轻一点就滑过去，这就不对。具体说来，我当右派有三条罪：一、我说胡耀邦虽然有问題，但不该一棍子打死。（其实我也不了解胡耀邦，是听他当年的一个警卫员、

钻勘队的党委书记说胡耀邦如何如何好）二、我执笔给刘少奇写了封信，我写第一稿，程代泽（也当右派，下放长寿湖）写第二稿，主要是反映工会现在没有作用，给工人办不了任何事。三、我说南桐煤矿的工会主席为啥不竞选，要指定。竞选虽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我们也可以借用它的形式，搞指定不民主。

批判我时我很不服气，说我是国民党的代言人，更惹得我跳起来，依我的犟脾气，我要吵翻天。但是，我看到前面那些右派的下场，心里害怕，忍回去了。一次接一次的批斗，批得我糊里糊涂起来，我觉得自己有错了，我的言行可能在客观上损害了党。

下长寿湖后，我仍然热爱党，忠于党，我认为自己不是右派，别人才是右派，我只同党团员右派往来，不同其他右派往来。我认为党团员右派同我一样，是不小心在客观上损害了党。我在内心依然把自己当成共青团员，依然一心一意想入党，最想入党——那是我人生的最高理想。我坚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了解我，会接纳我。

在长寿湖的开始阶段，我要向领导反映汇报，我觉得我要自觉的维护共产党。我知道我的行为伤害了一些人，但我绝不是有意伤害，我的“左”是认识问题。

后来，我对其他右派有了了解，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检讨了我以前的观念，大家相处得不错。



李多明在长寿湖

当右派前我已经结了婚，当右派后同丈夫分了手。我在长寿湖很想要个家，很需要家庭的温暖，但是又害怕，我在政治上家庭上都栽了大跟斗，害怕再遭受婚姻的挫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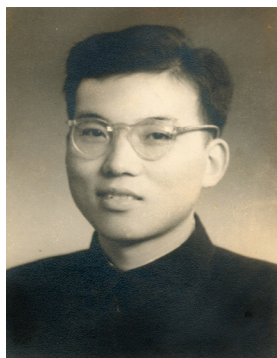
市委组织部有个右派叫陈欣，人长得很帅，也离了婚。他以前是党员，我们交谈，彼此对党的感情都没有淡化。

正式确定关系前，我问他几个问题：一、是不是因为在长寿湖寂寞要寻找安慰。二、我们两个有没有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三、是不是现在看不到前途才找我，今后情况好了又变心。我告诉他，这不是儿戏，我经不起折腾。

陈欣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现在看来，他一点没说假，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心好、善良、正直。他“改正”后担任十八冶的组织部长，一身正气，没有人敢给他送礼。对我、对这个家他也一直忠心尽责。“改正”那年我们40多岁，我看上去像个50、60岁的老太婆，他看上去还像个年轻人，走出去别人说我是他的丈母娘。

他60岁时，我送给他一首诗：“盛岁倥偬到夕阳，还惊牧羊二十春，同族沧桑风骨峭，经霜更知傲寒心。”明年他70岁，我又写了一首诗准备送他。

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我一心一意申请入党，1982年，我终于入了党，实现了从小的愿望。中国这个摊子只有共产党才能收拾。现在我们的国际地位有明显的提高嘛，经济发展也不错。当然也有负面影响——腐败。但是腐败不是共产党带来的，中国几千年封建黑暗有腐败，资本主义也有贪污腐败。共产党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正直的人。你采访过朱培德，他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九十年代他搞纪检工作，铁面无私，不计自身



50年代的陈欣

利益，硬是搬倒了不少坏官。比如，他曾顶住上级官员的压力，把电视台一个恶官搬下来，电视台职工自发地为他放鞭炮。我们从心底里敬佩这样的共产党人。现在很多人不好说自己是党员，我不，我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共产党员。我同老头子、我的儿子（其中一个是个副总经理）做事光明磊落，从没有收过别人的任何贿赂，我们问心无愧。

长寿湖也不是一团漆黑，也有美好的回忆。记得有几个明月之夜，我们划船到湖中，在月光下交谈，非常美好。还记得在三台岛只有一间房子，大家男女同室，中间隔一条毯子，彼此之间非常尊重、非常文明，一点没出问题。还有，长寿湖的农民也不错，文革时有一次斗我，游街。斗完后我到一农民家，他毫不歧视我，还给我煮了个荷包蛋。你写长寿湖，不要把长寿湖个个都写成不满意。

我本来不愿意再提那段经历，老头子更是不愿说，你都来了，我这个人又爱说话，就说这些。



李多明与陈欣在长寿湖

采访时间：2002年4月1日 地点：重庆市石坪桥

采访后记

陈欣、李多明是又一对长寿湖夫妻右派。他们的家离我的住地原本不远，但这儿房楼密集、岔路众多，路边一桌桌打麻将的人又各指东西，我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才找到。

这一带是十八冶的家属区，那条因污染（河水墨黑，臭不可闻）而闻名全市的桃花溪在家属区内蜿蜒而过。

李多明的家不久前装修过，显得整洁、舒适。窗外有绿树和几只麻雀，如果忽略偶尔飘来的桃花溪的气味，小环境让人心静神安。

陈欣不在家，李多明说：“他也不愿意说，我说说就行了。”

李多明精神饱满，动作麻利，尤其口辞清晰，语言流畅——显示出12岁在街头演讲时打下的良好基本功。

还有那时打下的另一种“基本功”——对共产党刻骨铭心的热爱。这也影响她终生。她说她的一些观点同长寿湖其他人不一样，但是，要允许人家有自己的看法。

观点怎样不该我去评说，我佩服的是她坦坦荡荡地宣称：“我是共产党员”，并且为自己（包括陈欣和儿子）是正直的共产党人自豪。

在眼下物欲横流良心败坏近于桃花溪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也好，非共产党人也好，只要坚守了做人的基本品德，都让人敬佩。

从李多明家出来，沿墨黑色的桃花溪走去。春风扑面，恶臭刺鼻，岸边麻将桌一字排开，参战的人全神贯注，看来没有受气味的影晌——或者呆久了已经习惯。

李多明说：腐败不是共产党带来的，中国几千年黑暗，都有贪污腐败。

就算李多明的话是正确的，但桃花溪的墨黑腐臭，一定是这几十年形成的。

在过去“黑暗的几千年中”，桃花溪一定是清波荡荡，桃红点点。

我原本不会当右派

陈欣

1957年重庆市委组织部秘书，1933年生



我在市委组织部工作表现很好，与领导关系也好，领导很器重我，我本来不会当右派

1957年底，右派分子大都抓出来了，反右运动也基本结束，上面领导说，右派打下去了，但我们自己的缺点还是要改，大家内部提提意见，帮助领导改进工作。

我同领导关系好，纯粹出于爱护领导，提了几条工作上的意见，无非是发展党员要注意质量，肃反时错整了不少人，希望今后考虑得细致一点，全面一点等等。这些都未伤筋动骨，“要命”的是给市委副书记李唐彬（他曾任组织部长，当书记后又分管组织工作）提了一条工作作风的意见。

李部长有个习惯，不管大会小会，都要秘书写稿子，他拿着念。有时上午开个讨论会，二、三十个人，下午他总结发言，中午便要叫秘书写稿子，先送处长审，再交给他念。他至始至终参加了讨论会，完全可以即席讲几句，用不着我们写，而且他也不是没有文化，他还给我改过几个错字。

我当右派，定的罪名是“攻击领导。”

组织部的所有右派处理还算轻，没有一个极右，没有一个送劳教，都是撒职降级降薪。我的薪降得最多，原因是我有些不服气，觉得自己的的确是出于爱护领导，我同领导的关系本来就不错嘛。

1958年我下长寿湖，1961年离婚，1962年与李多明结婚，1978年从长寿湖回来，在下面20年。

采访时间：2002年5月7日 地点：重庆石坪桥

采访后记

上次采访李多明，见到陈欣的照片，的确长得帅。我将他俩的照片借去扫描，还照片时，又来到他家。这次陈欣在，果然五官端正，天庭饱满，看得出当年的“帅。”我很想听听他在长寿湖长达20年的经历，可是，他不愿多说，在客客气气地介绍了几句当年的情况后，他就说：“对不起，我要去买菜了。”



李多明、陈欣平反后合影（1979年）

我那时很年轻

罗成蓉

1957年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干部



我15岁在四川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位于重庆夫子池）读书时加入了六一社（即共青团），那是1948年。解放后我进入重庆市妇联工作，1954年结婚，丈夫刘焰在省电力工会搞文艺。1955年肃反运动时，刘焰突然被抓走关了起来，罪名是：读过胡风的书，可能是胡风分子。

刘焰被抓之后，不准家属探望，又不准写信，我急了，找到我单位领导华逸，她是市委书记任白戈的夫人，希望她能帮我。

华逸态度很粗暴，她说：“你还敢去看他？你晓不晓得你现在是什么身分？”

“什么身分？我是他妻子。”

“妻子？你同老虎睡在一起，你还风平浪静？你晓不晓得刘焰的情况？”

“不晓得。”

“真的不晓得？！你这是拒绝回答。”

“我担保刘焰没有任何问题。”

“你敢担保，那好，你敢不敢写下来？”

我马上写了一张字条。华直接过字条说：“你既然写了字条，下午就把铺盖背来。”

我才22岁，根本没有想到这就是要关押我了。当天下午我一到单位，就被关了起来。

我女儿刚五个月，正吃奶，我的奶水特别多，我被关押后，我妈把女儿接走，没奶吃，只好吃米粉。我的奶胀得痛，每天每夜思念女儿，又担心丈夫，一急之下，我吐血了。



青年时期的罗成蓉

吐血也不放，派人看守我，叫我写揭发刘焰的材料，我写不出，我连他读过胡风哪几本书都不清楚。后来又叫我写自己的情况，读过什么书，作者是谁，内容是什么，有什么感想。这下我才写出点东西。

这一关，整整关了半年！

半年后，突然宣布放我。

华宜在会上对大家说：刘焰那边已经解放了，不是胡风分子，我们这边罗成蓉也获得解放。现在好了嘛，她经过这次审查，证明没问题，相当于给她脑壳上盖了个金印，到哪儿都走得通。有很多问题呀，不经过斗争，不经过审查，是

弄不清楚的。这半年的斗争审查是个好事情嘛，是一个难得的考验……”

听那口气，好像还该感谢她，感谢党组织。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从此慎言谨行。

1957年鸣放期间，我咬紧牙关一字不吐，只埋头作记录。团组织找到我，要我去动员两名从未发言的团员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组织上对我说，不要有顾虑，这次党是作了保证的，专门定了一个“三不政策”，对提意见的人，一不抓辫子，二不戴帽子，三不打棍子。刘焰也鼓励我，说这一次共产党明确作了决议：“言者无罪。”我胆子小，还是不敢说，只动员那两个团员发言。唉，硬是遇得到，不管我怎么启发，那两个人不来气，死不开口。我憋急了，只好以身作则，带头“鸣放”了一条意见。

我的意见是：“希望党组织在审查干部时多作调查了解，经过调查，明确是反革命了，再抓人，让被抓的人心服口服，不要在没有任何材料（证据）的情况下，先把人抓来关起。比如刘焰和我，什么材料（证据）都没有，就被关半年，很伤人的心。”

我总共讲了5分钟。那两个团员铁了心，仍然不吭一声。

1957年8月，市妇联宣布，本单位的右派已经揪出来了，反右运动在市妇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后不再抓右派。

揪出来的右派没有我，我认为反右已经结束了，打起背包下基层工作。

两个月后，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马上回单位。

我匆匆赶回妇联。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妇联按人头比例还差一个右派（已经抓了三个）。我们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党委经过研究，决定补划你为右派，因为只有你发言攻击过肃反运动，也就是说攻击过党。领导说完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时只有20多岁，政治上一点不成熟，右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我表态说：既然领导决定了，我就服从。



那时，我喜欢唱歌

那天下班后回家，我若无其事地对刘焰说：我当右派了。我天性喜欢唱歌，当晚我还高高兴兴唱了几曲。

第二天，我一上班，发现到处是批判我的大字报，还有条大标语：欢呼市妇联反右斗争的彻底胜利，又挖出一个深藏的右派分子罗成溶。但是，在批判我的会上，大家实在找不到我的任何具体罪行，由于无话可说，只好一遍一遍地呼喊口号，最具体的揭发批判是：我经常迟到。其实这完全是乱说。

紧接着撤职、降薪，让我打扫厕所。1958年“五一”劳动节，市委来通知，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去什么地方不告诉本人。当时我正在吐血，但不由分说，一个半夜里，我们被押送上路，直到到了狮子滩，我才知道改造地是长寿湖。

几个月前，刘焰作为下放干部已经到了长寿湖，他是戴着大红花走的。

既然是到了长寿湖，我就要求同丈夫在一起。总工会一个打字员冲着我劈头盖脸一阵臭骂：你晓不晓得你的身份？你是来改造的，不是来谈情说爱！

我不敢再多说。所以，虽然与刘焰同在一个农场，但一年到头难得团聚一次，尤其是刘焰也划成右派之后，我们见一次面就挨一次斗，非要我们交待私下说了些什么。我

们说，都是些家务事，他们不信，整得我们后来干脆不见面。

我的家拆得四分五裂，丈夫难得见面，丢给我母亲的两个孩子更难见面。我本来很活泼，爱唱爱跳，见到熟人很远就笑嘻嘻地打招呼，到后来我不唱歌了，连话都不多说。长寿湖最可怕的是说话一不小心就挨斗，譬如我们打夯要呼号子：

“打左边哟，哟嘿，打右边哟，哟嘿，打中央哟，哟嘿。”当天晚上就要我们交代，谁带头喊“打



刘焰，罗成蓉结婚后留影（1953年）

中央”？我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监管人员责问我：“你心中的党是什么党？你要用鞭子抽谁？！”长寿湖那个改右学习班的主任最喜欢斗人，他曾为了一点小事整整斗我长达半年的时间，而且对我们女右派，他最喜欢往生活作风上扯。

由于一年到头批斗不断，我感到极其压抑，精神几乎崩溃。我开始想死，但又丢不下两个孩子，在最绝望最痛苦时我经常这样安慰自己：我一定要死，不要紧，我一定要死，等到两个孩子长大一参加工作我就死。

1957年我当右派时不懂什么叫政治，下长寿湖也是懵懵懂懂，20年后从长寿湖回来时，我已经明白了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欺骗，就是整人，政治太可怕。

“改正”之后，我吸取教训，绝不多说话，做事百倍小心。开会、学习、发言，我满口都是报纸上的革命语言，尽说歌功颂德的赞扬话，没有一句是我自己的语言。又有人来指责我：“罗成溶，你光说好听的，你不提点意见，党怎么改正错误？”

我在肚子里暗暗发笑：我已经不再是20多岁的年轻姑娘了。

采访时间：2001年6月20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采访后记

罗成溶身体极差（1955年关押期间落下了咯血症，1960年在长寿湖患上了哮喘病），床边备着氧气瓶，丈夫刘焰体贴她，让她先谈。罗成溶今年68岁，算我采访右派中年轻的，她声音清脆，思维清晰，只是不时接不上气。



刘焰罗成蓉在长寿湖时留影

她说，她曾经喜欢唱歌，喜欢笑。

我采访罗成溶是2001年6月20日，距共产党80大寿差十天。打开电视，屏幕上一个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捧着一本党的书籍，对着镜头斯斯文文地说：“读了党的80年历史，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的确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罗成溶1955年被关押时22岁，同这名大学生年龄差不多。

都怪读了胡风的几本书

刘焰

1957年重庆市总工会干部



1955年我在西南铁路文工团搞创作，写剧本。由于专业的原因，读了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这些书中，有几本是胡风的作品。反胡风运动一来，单位派人把我抓起，和其他一些人关在一幢房子的顶楼上。我的日记、书籍全部被查收，身上的所有东西，包括皮带，统统收缴，上厕所也有人跟着，完全是对待犯人的方式。单位派人24小时轮流看守我们，其中有李宁熙、郑汉生等人，喜剧的是，后来看守我们的人也被打成右派，大家在劳改地长寿湖“团聚”了。



刘焰五十年代编排的剧照

连囚犯都不如。半年之后放我出来，抓、放都是领导一句话。我出来后才知道，妻子罗成溶也被关了半年，她在关押期间落下了咯血后遗症，女儿缺母奶面黄肌瘦。那些整人的人，一个个坦然得很，若无其事，我心中愤愤不平，写了一首长诗，结尾的两句是：“太阳还是那么温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1957年鸣放，我肚子里已装了半肚皮不满和怨气。我很看不惯一些官员的霸气和特权。我弟弟是个越剧团的演员，他告诉我，一些当官的来看剧，叫人把沙发抬到台下，脱了鞋子躺在沙发上看，极不尊重演员。还有，妻子单位的领导，处处摆出书记夫人的官太太相，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一个政党进城没几年，迅速耍起特权，国家自然要出问题。

1957年我没当右派，我是作为下放干部，戴着大红花去长寿湖。当时我就认为是惩罚我，因为我出身不好。几个月后，罗成溶戴着右派帽子来了，家里

他们要我坦白交待同胡风反党集团的联系。我说我只读过几本胡风的书，还是从书店买来的。他们认定我不老实，这一关，半年！

我被抓进去时女儿才生下来四个多月，我不知道家里的任何情况，家里人也不准来探视，



刘焰（正中）下放前戴着“大红花”

两个娃儿扔给两个无依无靠的老人。我只有 57 元的工资，全家经济陷入困境。没办法，我决定离开长寿湖，另去找一份工作。我跑到长寿县川剧院，介绍了自己能写会编（剧）的经历，剧院同意要我，叫我回农场开个证明。

我回农场一说，领导大怒，骂我胆敢私自找工作。他们借反右运动的余威，一棍子把我打成右派，发 18 元生活费，监督劳动，还差点把我送到峨边劳改。那个年代，党组织一句话就可以判刑。我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夫妻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平等了。

我再也无力养活家人。1960 年，罗成溶把我的一双儿女，连同抚养他们的外婆一起接到长寿湖。她父亲独自留在重庆，他没能活过那场大饥荒。



拉小提琴的刘焰

长寿湖有一招很毒，就是以你改造不好为名不准你春节探亲。有一年春节，管教干部不准我回家，我独自一人呆在长寿湖，很孤独也很不平，想起悲凉，眼泪流下来。为了让自己振作起来，我自己作词作曲，然后自己唱给自己听，度过我一个人的春节。

（刘焰唱）：风啊，轻轻地吹过，

桃花开，遍山艳红，

湖水碧绿，杨柳迎风舞。

春天是美丽的诗，

春天是美丽的歌，

挺起胸吧抬起头，

春天属于你也属于我。

我儿女在长寿湖读小学和初中，受了很多屈辱。老师强迫我孩子在家庭出身一栏上填右派，要让孩子认识到他们的父母是坏人，是敌人。这个老师是我一个好朋友妻子，她参加过我们的婚礼，对我和我妻子都很了解。她这么做，是要表现积极，显示立场坚定。

在长寿湖我最难受的是当着孩子的面挨斗。

文革初期的一个夏天，儿子和女儿放了暑假，高高兴兴进同心岛来玩，第一天晚上他们同一些农民孩子一起唱歌，表演节目，非常快乐。不料第二天就开批斗会，就在头晚孩子们玩耍的地坝上，我和另外四个据说也是抗拒改造的右派跪成一排，妻子和其他右派站在后面低头认罪。两个孩子看见这一幕，脸色变得惨白，那一霎间，他们变得像大人。我跪在地上，心头痛得很哪，你想想，当着娃儿的面！我们当父亲母亲的，再大的屈辱和苦难自己承受嘛，不要让娃儿看。这辈子我最痛苦的就是那一幕。



刘焰与儿子（1968年）

当天，两个孩子背起铺盖卷就走，我想挽留，女儿看了我一眼，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她那种没有表情的表情，给我刺激极大，我一下子冷得

全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去。

（注：刘焰与罗成溶的一对儿女，在长寿湖读完初中后，都下了农村，后来儿子在长寿安家，留在了长寿县。）

采访时间：2001年6月20日 地点：重庆渝中区

采访后记

刘焰、罗成溶是长寿湖夫妻右派之一，也是全家下放长寿的家庭之一。刘焰“刑期”十九年，罗成溶二十年。据长寿湖的其它右派说，刘、罗二人的“故事”很多，但他们俩对我谈得很少。

听了他们夫妻俩的讲叙，忍不住倒推回去：刘焰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因为妻子当右派断了收入，想另找一份工作；妻子为什么当右派？因为对1955年被关押表示不满；1955年为什么被关押？因为丈夫被怀疑是胡风分子；丈夫为什么被怀疑？因为读过几本胡风的书。

刘焰痛定思痛地总结说：推算起来，根源就在读了那几本胡风的书，后来的一切不幸盖发源于此。

此话难说。

一架庞大的绞肉机一旦开动，总要不停地往里投无辜的羔羊。不是刘焰便是张焰，不是因为读了几本书，便是因为说了几句话。这是专制极权的本性，这是一段注定要由无数血肉来填充的历史。

刘焰碰巧被“选中”了，不是因为“读了那几本书。”



刘焰，罗成蓉夫妻被打成右派前全家合影



刘焰，罗成蓉在飞龙岛他们当年住过的旧房前

二、瞧这一家

长寿湖“分子”李长文、冉德瑜的一家。
1949年进入“新社会”后，这一家中先先后后有8人“非正常死亡”：

- 1、李凤集——枪杀（镇反）
- 2、熊异能——打死（土改）
- 3、熊异能之母——打死（土改）
- 4、杨泽勋——枪杀（土改）
- 5、冉德瑜的三女——饿死（土改）
- 6、卢文俊——饿死（饥荒年）
- 7、李德珍——气死（文革）
- 8、熊莞君——自杀（文革）

1、李长文 2、冉德瑜 3、熊 愉



长寿湖飞龙岛当年右派驻地

一听“毛主席万岁”就反感

李长文

1957年重庆24中学教师



我这一生，错就错在当年没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而考入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

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想当官，不想搞政治，1945年从兼善中学毕业后，压根没想过要去考政大。我当时对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都瞧不起，心目中只有上海交大。我高中毕业时，交大还没招生，政大正在招生。父亲说：政大不好考，只录取考生的4-5%。你去考一下，取得一次经验。我觉得有道理，便去应试。一考，考上了。父亲说：“去，去读！”他希望我当官。当时，交大毕业是自谋出路，政大毕业是政府分配，一般都是当县长的角色。我对当官没兴趣，但父亲坚持要我去。我让了步，心想，我暂时进政大，第二年再去考交大。

我就读于政大地镇系，该系是为了贯彻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而设置的，研究的内容和毕业后的主要任务是购买地主的土地发给农民。后来共产党是采取没收政策。

考入政大的人，不管工人、农民，都要加入国民党，我们新生入校，坐在教室里，一人发一张表，填写完就算入了党，连誓都不用宣。一个年级算一个区分部，我被选为我这个年级的区分部委员，负责宣教。解放后，共产党整我，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符合共产党镇压的标准。



现已作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
中央政治大学旧址（谭松摄）

很不巧，也很不幸的是，交大在抗战胜利后迅速迁回上海，不再在重庆招生，我考交大的愿望落空。

1946年，政大迁到南京，校长是蒋介石。蒋介石派他儿子蒋经国来当教育长，政大的师生反对，贴大字报，蒋介石为此辞职。校长改为顾X秀，政大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

由于我不想搞政治，在三年级时转到金融系。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打得紧，南京到处是兵，乱糟糟的，我看这不是一个学习的环境，便同女朋友熊莞君一块坐船回重庆，寄读于重庆大学法律系。1949年学完四年本科，完成了毕业论文。在南京的政大因战乱从南京迁往杭州，从杭州到广州，又从广州第二次迁到重庆小泉。当然，这次不是躲日本。

我在重庆把毕业论文交给了政大，论文一交，同政大、同国民党就算永远了结。新

社会来了。

我的前妻叫熊莞君，她是我兼善中学的高中同班同学，北碚回龙坝人。1946年她考入社会教育学院。该学院1946年也在南京，我们往来密切，谈恋爱。她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她不愿意我读政大，认为那是培养国民党官僚的地方。后来她转入重庆大学教育系，解放后院系调整，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于1951年毕业，第二年，我同她结婚。

她的两个舅舅解放前各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解放后政府接收了学校，将两校合并为一所公办中学，我就在该校教数学，几年后调入位于北碚蔡家场的24中，不久熊莞君也调入该校。

解放后进行反动党员登记，我主动去登了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但一直读书，当学生，没有做任何坏事。共产党也没多说，让我走人。1955年肃反，教师在沙坪坝重庆三中集中，我把自己的历史详详细细作了交待，给我的结论是：李长文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但解放后一直表现很好，免于处分。

1957年我们夫妻俩都是中教五级教师，相当于大学讲师，每人月工资70多元，日子过得不错。

鸣放期间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反右之后搞“向党交心运动”，动员我们向党讲心里话。动员的人态度非常恳切，我被感动了，一时没有忍住，掏出了几句心里话。我说：我一听喊“毛主席万岁”就反感，封建皇帝才喊万岁。我还说，我父亲是地主，解放后被镇压我都没意见，但喊“万岁”我有看法。

我就交了这种“心。”

1958年6月29日，学校苏校长找我，向我宣布：带上简单行李，去农村劳动一段时间。

劳动就劳动，也没什么了不起。学校没有给我戴任何帽子，也没开我批斗会。第二天我离开家，到凯旋路中学集中。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我下到长寿湖。

1960年，我正饿得奄奄一息（我是长寿湖第一个得水肿病的人），妻子提出同我离婚，我不同意，她告上法庭，法院马上判离。嘿，刚离不久，学校说她脾气不好，把她开除，放回老家。她拖着两个女儿到乡下去。天！饥荒年母女三人哪个活得出来。没办法她把两个女儿送来长寿湖。我把女儿接上岛，她一个人回北碚乡下。

没过多久，她又来了，她在农村还是活不下去。管教人员同意她在猪场喂猪，说好只管饭不拿钱。这个时候她提出复婚，我也同意，我们去办手续，没办成，说要区以上的政府才能批。后来，我也不积极，我觉得她不能吃苦，在那生死存亡的艰难岁月，不能吃苦只有死路一条。我18元工资，一家四口，能不饿死算命大。熊莞君和我都饿成了水肿，勉强拖过了饥荒年。

我们没有复婚，她便不算家属，不算家属，便不能干喂猪的活，所以，1962年她又独自回到北碚乡下。

1964年，学校把她召回去当工人，每月20元钱。她一下子来了精神，立马跑来长寿湖，要把两个女儿接走，我不同意，想留一个下来，她坚决不干。扯了一段时间，最后我拗不过她，只得同意。

看着两个女儿走了，我心里被掏得空荡荡的。

人生的命运真的很难说，就在我们为女儿争执这段时间，学校变了卦，坚决不同意上女儿的户口，熊莞君急得发疯，在校领导面前抱着女儿大哭。但是没法，这次她争不赢了，只好又把两个女儿送到长寿湖。

从此，我两个女儿永远留在了长寿湖。所以后来女儿有些埋怨，当初我要不争，她们就是城市户口了。

两个女儿在长寿湖跟我受了不少苦，每天上学要走十几里路，涨水时还要下湖游一段，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多年后她们告诉我，有时她们根本没去上学，跑到坡上漫山遍野找吃的。还有，政治上抬不起头，精神压力大。我女儿熊怡（她跟母亲姓）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小册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表明是属于自己的书——名字写大了一点，她受训，我也被抓来斗一场。大女儿十六岁下乡，在农村8年，吃够了出身不好的苦头，她为了自己的孩子不再受这种苦，特地找一位农村的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结了婚。

后来两人不合，离了婚，再结婚，再离，现在孤身一人。

同我一起劳动的有一个女右派，叫冉德瑜，她为人忠厚老实，又特别能吃苦。她看我独自带两个小孩拖不动，就主动来帮忙，帮我洗衣服，照看孩子。一来二往有了感情。我问两个女儿，“冉嬢嬢来当妈妈可不可以？”孩子说：“可以。”于是我同冉德玉在1962年12月结婚。冉的命运比我悲惨，你可以去采访她。

1979年“改正”，我去市教育局查问，一查，没有给我戴帽子。我冒火说：“这二十年一切都按‘分子’整我，1962年还宣布给我摘帽。原来没戴帽，白整了？！”

教育局那位女同志阴阳怪气地说：“有帽子好哇，有帽子说明整错了，你还能改正，没戴帽你不属于改正对象，没有你的好事。”

“改正”后我没有再回学校，留在了长寿湖。文革期间，我幸亏是呆在长寿湖，如果我在24中，肯定被整死了。我前妻熊莞君只因为是出身地主，就……

唉，这段伤心事我实在不想提。文革时，她是“死老虎”，任人斗，任人打。两派有事没事都整她。她的“罪过”有三条：一，出身地主；二，老公是“分子”；三，曾经被开除过。红卫兵闲来无聊，拿她取乐，他们说，她姓熊，就得趴在地上装狗熊。红卫兵拿来绳子，拴在她脖子上，强迫她在地上爬。一天中午，他们逼迫熊莞君趴在地上同一群狗抢骨头，她被咬得鲜血直流。她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人呀！当天她就上吊自杀了。

（李长文此时哽咽）

我和女儿不知道她死了，以前她每月给我们寄5元钱，后来好几个月没有信，也没有钱，我写信去问，学校回信只说了一句：“熊莞君已死。”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她怎么去世的，她死前有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

十多年后，北碚区为她平反，开了追悼会，两个女儿去参加，政府补助了500元钱，算是了结。我把钱平分给两个女儿，那是她们妈妈用生命换来的。



李长文与女儿熊怡在长寿湖
（2003年6月，谭松摄）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13日 地点：长寿湖造船厂

采访后记

采访李长文，是在长寿湖边一个低矮的平房里。湖面上，烟波浩渺，稀疏的雨点打在湖畔的芭叶上，声声点点，秋韵秋寒。

李长文老人背对长寿湖凄美秋色，有些急不可待地向我倾诉他逝去的生命时光。

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然而，讲到他前妻熊莞君之死时，他声音突然发涩，我看见他眼中一缕悲恨的凶光一闪而过，原本惊心动魄的场面，他寥寥几句，便作交待。我想追问，那声音和表情让我哑然失语。

重庆市著名物理学教授、右派陈祚璜（长寿湖“分子”刘淑明之夫）生前写过一篇《受困记》，该文45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文革）对人的虐待和残忍，更是别出心裁，举个例子：北碚蔡家场市24中有一个语文教师叫熊莞君，工作一贯认真负责，性情直率，肯讲真话。一天中午，学生食堂打牙祭（吃肉），学生把熊莞君叫来，又唤来一群狗，把剩下的骨头掷到狗群中，然后逼令熊莞君与狗抢啃骨头，不去就打。熊莞君被狗咬得鲜血直流。她无法忍受，自缢死了。熊是我1944年在北碚兼善中学高七班教过的学生，后她在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从事教育。她青年时的憨厚形象还不时在我的回忆中出现，不料到她竟死得这么惨，我心中十分难过。”

当天夜里，我同妹妹谭竹呆在湖边一间小屋里，窗外哗哗地下着大雨，妹妹沉默不语，她刚刚写完长篇小说《云顶寨》，写了一大串才女淑女的死亡，一个个写得凄婉动人。我也沉默不语，老是想，当一个人的尊严被“狗”咬得稀烂，不得不毁灭自己生命时，心里想些什么？

夜深沉，孤灯寂静，窗外风雨，湖边水拍。倏地想起《红楼梦》里一首哀怨孤女的诗句：

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风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

林黛玉很凄惨吗？无数中国人为她泪湿衣衫……



熊莞君（右）与妹妹熊达君合影（1951）此照片系从唐山地震废墟中挖出。

（注：这张十分珍贵的孤本照片，我在匆忙中只扫了很低的精度，还没来得及寄还，就被重庆市国安局抄家时抄走了。）

丈夫——枪杀，女儿——饿死

冉德瑜

1957年四川速成师范学校学生

1922年生



听说你在采访，我外孙女叫我千万不要说，这辈子整苦了，受了几十年的罪，还连累了她，不要又惹祸。我练法轮功，他们坚决不准我练，要惹祸，我不练了。五十年代的事，我亲身经历不是编造，说几句又哪个嘛，又把我弄成个啥子派？又把那两个帽子（地主分子、右派分子）还给我？

我是涪陵礁岩乡人，出生才4个月爸爸就去世了。我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在涪陵女中。毕业后结婚，父母从小给我们订的婚，丈夫叫杨泽勋，比我小1岁，在涪陵省立中学读书。

结婚后10天，我离开家，到了丈夫家——涪陵清溪场。我在清溪场的南沱中心小学教书。

到1950年土改时，我有了四个娃儿，老大7岁，最小的半岁，正在吃奶。那个暑假，农会的人要我和丈夫集中学习，丈夫当时也在教书。他们把他弄到区上去，没要我去，因为我拖4个娃儿。丈夫走的时候对我说，我没得啥子问题，我没田没地，肯定不会评成地主。

农会组织开会，先把我评成自由人，第二天叫我站到中农那一堆，第三天又说，你站到那边去。“那边”就是地主成份和地主出身的人。我说，我又升级了，三天升三级。我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意识到当地主的可怕。我想，我一无田、二无地，娘屋虽然有几亩地，但我早就离家了，妈妈在我结婚后几个月也死了，我一个干人，算那门子地主？！

农会说：“你教书就是不劳动，是剥削阶级。”

他们来抄家，半夜突然来的，先把我们母子五个从床上赶起来，赶到外面站起，他们在里面翻箱倒柜，稍微好一点的都要。有一床被盖，棉絮不好，面子还可以，他们就把面子拆下来拿走。我几个娃儿衣服都没穿，冷得哭。我不要命地冲进去，把娃儿穿的那身衣服抢出来。农会那些人挑了满满几担东西走了。最缺德的是他们还把屋锁了不准我们进，我们母子几个只好钻到灶房旁边搭的一个偏棚里。

（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礼赞了农会的这种“痞子精神”。）

那床农会没看上眼的破棉絮，是我们那个冬天惟一的被盖，我给四个娃儿盖，我晚上不脱衣服，蜷在谷草堆上。棉絮很快就更破了，到处是洞，我连绳线都没有，用谷草把洞扯拢来。

其实，冷还可以挺过去，肚皮饿才叫恼火。丈夫弄走没得消息，不准我教书，也不

准我外出——农会的武装人员说，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土改，进出都要通行证。我是地主，不准我出去，一家人没得经济来源，我的三女儿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

那天晚上，她“妈呀妈的”哭叫了一夜。“妈呀，我要吃饭哟，我要吃饭哟。你去煮饭给我吃嘛。”我说，哪点来米嘛，灶也封了的。她的哥哥姐姐饿了，红苕藤、糠粳粳都吃，最小的一个还有奶吊倒，只有这个老三，倒大不小，非要吃饭。一晚上都在哭叫，最后她说：“妈，你到奶奶那里去给我舀瓢水喝嘛。”我说，“恁个晚了，别人门都栓了。”女儿没有再叫了。天亮前，她死在那个偏棚里，死时还不到3岁。

（这是我第二次听冉德瑜谈到她三女儿的死。第一次是2001年11月25日在狮子滩一家饭店里。那次，当着许多人——李宁熙夫妇、我妹妹谭竹、朋友王康等——冉德瑜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这一次，她只是默默地抹了抹眼泪。）

我去给人干活，找的丈夫家一个亲戚，我喊她五妈，她家评的是中农。我在她家推磨，天天推到深夜12点。她给我半升包谷，我要米，她不给，每天都是包谷。

农会分给我一块地，叫我种，我不要，我腰无分文，买种子的钱都没得。农会说，嘿，你这个人怪，别人翻身，分田分土高兴得很，你还不要。所以我说我是个“翻身地主。”

（注：“翻身”指获得解放，当了主人的意思）

我们母子几个身上只有那天夜里从农会手头抢出来的这身衣服，没换的，穿了半年，又脏又烂又臭。说起来不怕你笑，我们全家一身都是虱子，密密麻麻。咬得没办法，我烧一锅水，关起门，脱光，把衣服放到锅里煮，水面浮起一层虱子，我大儿子抓了满满一把。我不是乱说，不是加盐加醋，我只有说漏了的。

有个人看我艰难，悄悄说：“你出去借点钱来把地种了嘛。”我说：“不给我办通行证，我不敢走。”他说：“你不走大路，晚上走小路。”我照他话做，悄悄跑到清溪场找我三姑。她给了我两升米，3块钱。我拿这3块钱买了芥子，胡乱种在土里，咦，长得好得很。我收回来，娃儿不吃，说黑糊糊的是猫屎。我吃给他们看，他们才勉强跟着吃了。

我每天出去帮工，让儿子照看小的。儿子要出去打柴，妹妹弟弟没人管。有一天我回来，发现二女儿不见了——被人偷了！我又气又急又哭，农会不开通行证，我走不出去，到哪儿去找嘛？！你问娃儿爸爸？他已经不在了！（19）50年那个暑假他被弄到区上去，我就再也没见到他。后来我听我那个妹说，她亲眼看见了的——农会把他抓来斗，说他是反革命。叫一个人上去斗他，那个人说，杨泽勋嘛，乡坝头看到长大的娃儿，从小读书，平时对人又好，斯斯文文，客客气气的。农会不要那个人说了，换一个人上来，新来的人还是这样说，一连三个人都说杨泽勋是个好人。农会只好不斗了，干脆判他死刑。那天杀了好些人。杨泽勋跪在地上，五花大绑，武装（人员）对着他后脑扣扳机，连扣三枪都不响。杨泽勋扭回头来看，他们说，他还以为自己只是陪杀场。那个武装慌了，连连说：“杨泽勋，不是我要你的命哟，不是我要你的命哟。”

农会换了个人上来，还是把他打死了。

（说到这儿，冉德瑜老人突然提高声音，异常激愤。）
他死时才28岁，没有做过一丁点坏事哟！他从小



“他们还是把他打死了！”

读书，后来当个小学教师，说他是反革命就是因为他中学毕业后在涪陵地镇科当了几个月小科员，抄抄写写，学校出来的一个学生娃儿，找点事干就把人当反革命杀了？！

我最艰难的日子是那一年春节。哪一年？记不清了。是二女被偷走后的那个春节，大概是1952年，大年三十那天，他们派人来通知我，春节10天不准出去干活。我立马慌了神，家里一贫如洗，啥子吃的都没得。晚上我抱了一抱柴、砍成条，大儿子帮我捡，我对他说，明天早上你起来去给别个送柴（即送财的意思），别人肯定会给你点吃的。儿子答应了。

第二天儿子背起柴，脚刚要跨出门，不干了。他说：“妈，我不去，别个会说我是叫花子（要饭的）。”我说：“不是去要饭，你去找五妈、三姑他们，他们是亲戚。”儿子又往门口走，一到门坎，他脚就抬不起，硬是迈不出去。扯了四、五次，他哭起来，要我去。我说，你娃儿去要好些，我是个大人。他还是不去，我气不过，一把抱过柴来说：“好，好，我去！我去！我出去就不回来了。”儿子一听，吓得大哭，他扑过来把我吊倒，“妈！妈！你一定要回来！”

（冉德瑜老泪纵横，边哭边说。）

我对儿子说：“你看到家里没吃的，要想饿死呀？那个老头子叫我嫁给他，有饭吃，你要不要妈嫁？”

儿子说不要，但他还是迈不出去，最后还是我去的。五妈他们给了糖、汤元和糍粑，把柴也还给我了。

那10天是我一生中最恐慌的日子，我一辈子的苦难加起来都不抵那10天，两个女儿已经没了，剩下两个儿子不能再饿死。快点过呀，快点过呀，过了年好出去做活。到第10天的晚上，我扯起喉咙对着外面喊：“你们想把我们母子饿死，不得行！我们活过来了，没有死！”

孙女叫我不要说，我给你说了，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没说一句冤枉话，没有冤枉共产党，我只有少说了的，说漏了的。

打死我丈夫的那帮农会的武装（人员）中，有一个叫彭癫子的人，这个人以前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干聊子一个（没钱），讨不到媳妇，进了农会，他神气了，背杆枪到处走。他看上了我，托人来说。我气得发昏，吼起来：“把我男人整了还想来要我？！”有一次开会，别人又说这事。彭癫子嘻皮笑脸地说：“噢，我有这个福气呀！”我霍地一下站起来，当场冲着他说：“你看好了，你是贫下中农，我是地主，你站在啥子立场？！”

他后来把田分来靠到我的田，背杆枪走来走去想欺负我。人到这份上心也横了，我不怕他，跳起来和他斗，我说你敢一枪把我崩了？！他没有占到便宜。

我种不出来粮食，交不了公粮，上面来的工作组找我问原因，我把情况原原本本给他们说了。我要求出去找工作，求他们帮忙开通行证。工作组的人同意了。彭癫子还想卡我，想强迫我嫁给他，但工作组的人点了头的，他拦不住我了。

我打算到重庆一中去找冉淑芳，她是我姑姑，又是我女中的同学，她读了大学，在一中教体育。我没得钱，一个亲戚给我买了张船票。我把小儿子托付给我表嫂，她也是个地主，大儿子交给祖外婆。大儿子非要跟我走，他说他去帮人带娃儿。我说，多一个人要路费，妈的路费都是别个给的。我硬把他留下来，他哭得伤心得很。

我坐船到了重庆，不晓得沙坪坝在哪点，有好远，边问路边往沙坪坝走，走到化龙桥的时候天黑了。我觉得前面迷迷糊糊，走一段，看到前面是山，没人，我又折回来。走投无路的感觉啊。后来我写了一首词，读给你听：“涪山青，渝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乡情。娘泪盈，儿泪盈，骨肉分离娘断魂，泪海心难平。”

我身无分文，在化龙桥找了一家理发店，问他们要不要打工的。那个老板打量了我一阵，把我收下了。我在那家理发店干了半个月，老板看上我了，他死了老婆，想娶我。我不愿意，想到在乡下的娃儿。离开的时候，老板给了我一个月的工钱，还说，要是没办法，可以再回去。

我在一中找到姑姑冉淑芳，我住在她那点，去报考了速成师范学校。等通知的时候，我想娃儿想得要命，忍不住要回去看。姑姑说，你走了，通知来了哪个办？先把娃儿放一下。我说，不得行，放不下。

再说说我大儿子。我走后他失魂落魄，经常跑出去漫无目的找我。有一次他走了很远，到了一个亲戚家，要他们帮着找妈妈。那家亲戚没有理他，只给了他两个烧红苕就叫他走，他那里还走得回去？他一个人在外面一个草堆堆里过了一夜，他一个娃儿，不怕？他肯定要哭嘛。

大儿子开始发昏病，路也走不动了，一个多月时间，身子垮下来。

我回到乡下，大儿子一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妈，你回来了？”我说：“我来接你，带你出去。”他立马活起来，病也好了。我本来找了个人背他，讲好背到河边两块工钱，结果路上他不要人背，活蹦乱跳走得上好。早晓得我不花那两块钱，但别人跟倒走了一趟。

在船上我给儿子买了一碗饭，儿子说：“妈，你呢？你也买一碗。”我说我心头不好，不想吃。我哪里是不想吃嘛，我饿得发慌，没得钱哪！5块钱还是女中的同学杨昌仁（音）给的，已经用了两块了。

（冉德瑜泪水又滴下来）

我带儿子到了一中，儿子破破烂烂，长一头癞子。姑姑说，这是学校，别人看得你这个癞子哪？她拿6块，叫他到外面去住。

儿子到段上去锤石子，每月5块钱，段上补助一块，总算有了口饭吃。

这个时候，我听人带信来说，我寄放在表嫂家的小儿子滚到茅厕（厕所）里去了，幸亏茅厕是新修的，粪不多，他在里面叫，才把他捞上来。

我一听，又往涪陵赶，我已经丢了两个女儿，儿子不能再出差错。我回到乡下，把小儿子背到重庆。姑姑吵我：“你工作都没得，慌慌张张把娃儿一个个弄上来，找些包袱。”我说：“你那些娃儿生下来又是亲爹妈，又是请奶妈，我们都是当妈的。”

这个时候，速成师范的通知来了。姑姑说：“你看嘛，你哪个办？”

我没得办法，只好又把小儿子送回去。在涪陵的时候，遇到一个亲戚，她说，你不要回去，送回去娃儿可怜，河边有个船工没得娃儿，一直想收养一个，把儿子给他算了。

我犹豫了半天，同意了。那个船工姓张，两口子很喜欢娃儿，立马给娃儿做了两套新衣服，还亲亲热热地抱他。他们要我写个手续，还要我去把儿子的户口办来。

同儿子分手时候，他哭着对我说：“妈妈，你要来接我哟。”

送了小儿子，我回到重庆，进速成师范读书，师范是供济制，吃饭不要钱，还发点生活用品。原先说读一年就工作，后来说太快了，再读一年。我找校长要求工作，我说我有娃儿，经济困难。校长不同意，我只好又读，这一读，就读到（19）57年鸣放。

鸣放我一句话都没说，到尾声了，积极分子非要我发言，他们说：“你不帮助党整风呀？你不发言，政治上想得2分？”我说我没得啥子说的，他们引导我：“你从农村来，经历过土改，你是哪个出来的，你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说。”

我于是说了我土改时听说的一件事：有个富农后来评成地主，他害怕，上吊自杀了。有人去找他开会，推开门，看到死人，骇惨了。他们还要我说，我就说到我三女儿，一提到她我就哭了，我边哭边说，她土改期间饿死了。

他们批斗我，说解放后新社会哪有饿死人的？你污蔑造谣！我哭着说：“是真的嘛，我的亲生女儿，不信你们去了解嘛，又不远。”

给我定了个罪——“攻击党的土改运动”，又给我戴了一项帽子——“右派分子”。

在去南桐农村劳动改造的路上，我边走边哭，身上一分钱都没得，别个还可以买些生活用品，我走这么远，又担心娃儿。带队的人问我为啥子这么伤心，我说没得经济，生活哪个办，还有娃儿。他说，没得关系，有组织，要我依靠组织。

我在南桐农村，老老实实在地劳动。一中有个姓高的老师也来了，他说大儿子在他家里带娃儿，现在不需要了，是不是把儿子送到南桐来。我赶忙求他：“高老师，你帮人帮到底。你看我这种情况，这个大山坡坡，娃儿来做啥？”

高老师找人把我大儿子介绍到8中校办厂去做活。后来他一直在那点干，直到前几年退休。

1961年我们全体转到长寿湖，在长寿湖遇到李长文，我们结了婚，这些你都晓得。

我说说找我二女儿的事，就是被偷走的那个，她被偷时才4岁多，我去找时已经过了快20年。长寿湖渔场给我打了个证明，我出去没走多远证明和钱都被小偷摸了。第二次又去。我女儿就是我们那一带的人偷的，这我晓得，有人给我说，那家人姓夏，他们偷了后还在清溪场住了一个星期，看我找不找。

我从那个沟沟问进去，挨家挨户的问起走，我只晓得那家人姓夏，住哪点不晓得。最后有个人说，夏家当年是弄了个小女娃回来，现在那女娃都结婚了，就在对门斜坡坡对对。呃，那不是，田头干活那个就是你女婿！

我赶忙走上去，对他说，我是他女人的亲妈。女婿听了，叫人去喊我女儿。不一会，来了一群女人。有人喊：“夏渝碧，你亲妈来了。”我认不出她，她也认不出我，我二女叫杨云霞。我喊“云霞，云霞。”

女人堆有一个大肚子孕妇走上来，我看她长得像我大儿子。她叫我一声“妈。”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隔壁一个女的跟着哭，她也是被偷来的，她边哭边说：“我还不晓得我亲妈姓啥子。”

有的人说：“你找到女儿就把她弄走嘛。”我当然想，我要弄走有理由，是他们硬给我偷走的。但是她已经不是一个人，正怀二胎，当月就要生。她几兄妹东一个西一个，死的死，送的送，苦得很。她再苦嘛丈夫娃儿在一堆，何必再把她家扯散。农民就农民，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好，何必非弄个城市户口。别人说我开通，我说我尝够了分离的苦，

再说她没读过书，出去怎么办？

其实，我二女小时候特别聪明，两岁多就能认300多个字。她被偷到夏家，那个男人另外娶了老婆，女人也嫁出去了，二女跟夏家的奶奶生活，从小就干活，去给别个带娃儿，挨了好多打，她命苦得很。不过，后来她的两个娃儿都从农村弄出来了。

（叫冉德瑜不要接受我采访的就是其中一个女儿。）

二女儿送我到长江边，我们在船上又抱头痛哭一场。

对了，还有我小儿子，七十年代他带着女朋友来长寿湖找我。别人给他讲长寿湖是个劳改农场，他以为有铁丝网，有哨兵。我见到他，一眼就认出来——他同他死去的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在长寿湖，我也差点被整死。卢蕴伯就死在我眼前，我只差一点就步她的后尘。回想这一辈子，我不晓得哪个活到今天的。几十年都在骂自己“我是地主、右派，我要好好改造”、“我有罪”、“我有罪。”

我说给你听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没乱编一句，你看，我的罪在哪点？

回想这一辈子，我写了首打油诗，算是总结：

两口小教无寸土，错划成份成地主。

夫含冤死子女散，我落荒村思骨肉。

地雨右风廿七年，廿七于我一家苦。

忍认他乡作故乡，青丝红颜老江湖。

注：①“两口小教”指冉、杨两个小学教师

②“地雨右风”指地主、右派

采访时间：2002年6月13日 地点：长寿湖农场子弟中学

采访后记

采访冉德瑜老人时，天下着瓢泼大雨，湖面上水雾迷漫，冷风阵阵。参加长寿湖聚会的当年的右派们在大雨中依依不舍地离去了。他们中有些人一定是永远地离去了。头一天在飞龙岛上，一位年逾八旬的右派，望着那片土地，嗫嗫嚅嚅地说：“我回来看你哟，回来看你哟，最后一次回来看你哟。”

我留下来，走进了冉德瑜在湖边的家。

去年10月，采访李长文时，初次见到冉德瑜。在餐桌上，当着许多人，老人提起她饿死的女儿，泣不成声。

那天，也下着瓢泼大雨，湖面上水雾迷漫，冷风阵阵。

老人声音急促、高昂，不需要我提示、询问，多年积压，一发不肯收。悲到深处，又是泣不成声。

返回重庆后，我开始写关于冉的文字。这些平淡的、毫无文学美感的文字，让我不

她被“狗”咬死

熊愉

李长文之女，1957年8月生



李长文与熊莞君（1953年）

我刚刚半岁的时候，爸爸就被他们弄走了，我和姐姐熊怡跟妈妈，姐姐大我两岁。

1960年初，学校（重庆市24中）说妈妈的丈夫是反革命，本人出身不好，又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旧知识分子，有这三条，就不要妈妈教书了，把她放到北碚蔡家场乡下劳动。

妈妈家以前是巴县一个家势很大很富的地主，妈妈是个大小姐，从小在外面读书，没有劳动过，她干不起活，我们母女三口饿得要死。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和姐姐剥红苕藤那个梗梗吃，甜丝丝的。

妈妈喂不活我们，把我们送到长寿湖，这时候爸爸妈妈已经离婚，我和姐姐是判给妈妈的。

在同心岛，爸爸天天出去劳动，很晚很晚才回来，我和姐姐（我快3岁，姐姐不到5岁）没人管，天天守在食堂。那个时候吃饭票，师傅打点饭给我们吃。吃不饱，饿。晚上，我们姐妹俩坐在食堂门口，一边坐一个，伤伤心心地哭，哭得不歇气，那个月亮白晃晃的。

有一个晚上，我要撒尿，爸爸累得很，说你各人出去撒。我从后门出去，外面有个石坎坎，石坎坎下面是个粪坑，我走出去，没站稳，从石坎坎滚下去，掉进粪坑里，好在粪不深，我吓得发不出声。爸爸见我老不回来，出门找，在粪坑里找到我。他一把提我起来，往湖边跑。他把我浸在水里，提起来，又浸下去，像提一个鸡娃娃。那天晚上也是月亮很大，我印象深得很。

有一个女右派，看见我们很苦，衣服也没得人洗，主动来帮我们，关照我们两姐妹，她后来成了我们的后妈，叫冉德瑜，你见过了。

我妈妈一个人在北碚乡下，还是活不下去，她也跑到长寿湖来，想同爸爸复婚，他们没能复婚，妈妈认为这是冉德瑜的原因。

妈妈又回到乡下。1964年，政策宽松一点，学校觉得把妈妈处理重了，又把她召回学校，不教书，当工人，保管劳动工具，每月24块钱。她马上跑到长寿湖要我们两姊妹。

爸爸求她留一个下来，妈妈不干，爸爸找其他右派来劝，都不行。我记得晚上他们在湖边争，争来争去，争了整整一夜，我想睡，瞌睡得很，到天亮的时候，爸爸放弃了，妈妈把我们带回城。

那天晚上，月亮也很大，亮晃晃的，我印象深得很。

其实我和姐姐很舍不得爸爸，虽然日子苦，但爸爸对我们很好。我小时头上生癞疮，没有药，爸爸到处去找土草药，一点一点的给我敷。我和姐姐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爸爸死了。有一次爸爸吃糠饼把喉咙弄破了，吐了血红的东西出来，我和姐姐以为爸爸要死了，吓得抱住他放声大哭。

回到城里，妈妈发现我有肝炎，赶紧给我买糖，买猪脑水，尽量让我吃好的，但是她只有24块钱，我们三个人不够。我得了病，她拚命给我买好吃的，经济上更紧张。她去找学校，要求补助——她以前有70多块钱工资。校不给，她三天两头跑去要，学校气不过，说是你自己要把两个娃儿弄回来。这个时候我和姐姐户口还没上，学校干脆不办户口了，把我们两个退回长寿湖。

上不了户口，没办法在城里呆，妈妈没办法了。这一次我们在妈妈身边呆了4个月，我对妈妈最深的印象就是这4个月。以前我小，没什么印象，以后，以后我再也没见到她。

妈妈是大小姐出身，不像贫苦妇女那样能过紧日子。其实，24块钱我们咬紧牙也能过下去，一闹，把我们又闹回长寿湖。如果我们在妈妈身边，我想她后来可能不会走绝路。



熊怡（右）熊愉两姐妹（1987）

我和姐姐回到长寿湖团山堡。上学，要到同心岛那边的一个乡村小学，水枯可以走过去，涨点水就得下湖游，游两次。冬天田里结了冰，也得下水。那时衣服穿得少，脱下来，脱得光溜溜的，把衣服书包顶在头上，一只手护头，一只手游。家里斗笠都没得，下雨天只有挨淋，衣服打湿了就到同学家的灶门前烤，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妈妈每个月给我们寄5块钱，几年后突然不寄了，半年都没寄，爸爸以为妈妈结婚了，写信给学校，学校过了很久才回信，我现在都记得，只有五个字：熊莞君已死。爸爸又写信去问怎么死的，学校再也没回信。

十多年后，1979年，我们突然接到学校的通知，叫去参加妈妈的追悼会。走的时候，爸爸对我们两个说：人已经死了，不要找学校提什么要求，无非是钱，只要政治上平反了，经济上就不计较了，不要拿死人去压活人。

我和姐姐回到学校，那天同时追悼的有4个人，上面挂了4张遗像，我一眼就认出了妈妈……

（熊愉双眼发红，泪水涌上来。）

我站不稳，放声哭，两个老师架着我……

追悼会开后，让我去领妈妈的遗物。遗物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那张遗像。学校说，找不到妈妈的照片，费了大力气才从北碚区教育局的一张履历表上弄来。第二件是一个很大的牛皮信封，里面有几十份材料。其中包括妈妈写的检讨、交待、别人检举她的材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段记录：

“熊莞君，你不老实！”

“我哪点不老实？”
“你思想反动，你还在怀念你那个反革命丈夫！”
“我哪里在怀念？”
“你不怀念？！那你为啥子不结婚？你在等他！”
“他已经结婚了。”

我问学校妈妈的坟在哪点，他们说不晓得，不晓得是哪个把她拖出去的，埋埋埋都不清楚。我后来又打听，没有结果，至今我都没找到妈妈的尸骨。

那两个老师怕我想不通，一直陪着我，他们叫我们姐妹俩住一晚，我不干，坚决要走。我们没有给学校提任何要求。走的时候，那两个老师拉着我的手哭起来，哭得很伤心……

（熊愉泪流满面，哽咽不语。）

我对妈妈虽然没有多的印象，但我知她是个好人，只是她不会处世，脾气犟，不认错。

我爸爸也是个很好的人，他和妈妈谈了8年的恋爱才结婚，他们是高中同班同学，从高中、大学到结婚，有感情基础。怀上我姐姐时，爸爸妈妈约定，男孩就姓李，女孩就姓熊，结果两个都是女孩。他们分手后，爸爸对她也有感情，他坚决不同意把我们改为姓李，我想爸爸就是为了纪念妈妈，怀念那份感情。

我姐姐熊怡不能完全理解，她认为爸爸如果不同冉德瑜好，而同妈妈复婚，妈妈就会活下来。姐姐16岁就下农村当知青，整整8年不出来，她下决心找一个出身好的“红五类”，于是同一个大队干部、转业军人、共产党员结了婚。十多年后离婚了，再婚，又离，现在孤身一人，在渔场办了内退，每月300元钱，没住房，同我住在一起。

采访时间：2002年6月11日 地点：长寿湖化工招待所

采访后记

在长寿湖右派重返长寿湖的聚会中，见到李长文的小女儿熊愉，她声音粗犷，高大健壮，举手投足有一种风风火火的泼辣干练。

晚上，我在湖边幽静的化工招待所里采访了她。

我们慢慢谈开，她谈到她的童年，她的母亲。白天那种风火干练消失了，灯光下，我分明感到一种娴雅和秀气。她的声音、目光和表情透射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柔和、细腻和秀美。我想，这一定是她“大小姐”的母亲和政大毕业的父亲血液里传给她的。

她显然不是那种娇娇弱弱容易流泪的女人，但谈到看见她母亲的遗像时，她垂下头，泪水夺眶而出。

夜，十分柔和宁静，长寿湖湖水哗哗拍打窗下的礁石。我一动不动，静静地等她。



建于文革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塑像仍然立在24中校园，他脚下就是40多年前熊莞君遇难的地方（谭松摄）

三、老革命

有一群资历深长的“老革命”，他们也被“阳谋”的血盆大口吞噬。

- | | |
|-------|-------|
| 1、詹光 | 2、李恩章 |
| 3、王开泰 | 4、龙实 |
| 5、朱恩源 | 6、梅吾 |
| 7、周西平 | |



长寿湖农场职工俱乐部印制

一个死不认罪의顽固右派

詹光

1957年重庆日报党支部书记，编委



我年轻时，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编辑、作家，几十年一直渴望实现这个愿望，今年我已经80岁，一切都不可能了。

1938年，我17岁，投奔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组织我们到延安。到延安后第二年我就加入了共产党。我先干了几个月的伤兵救护，然后考入鲁迅艺术学院，读文艺系，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编辑、作家。读书时，遇上延安整风运动，许多人被打成特务、反革命，还整死了人。由于我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不由分说把我打成反革命，整风的重点就是要整像我这种投奔延安的人。文艺系的支部书记是何其芳，他要我交待，我不服，同他干起来，他便把我交给同学批斗。同学态度十分粗暴，我不交待便不准我睡觉，我年青气盛，跳起来要打架。何其芳见闹得凶就把我放到山上劳动。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来周恩来说，哪有那么多反革命，毛泽东也给大家道了歉，说：“你们受了委屈。”我获得平反。

1941年从鲁艺毕业后，我加入359旅（就是王震那个旅）随军南下。部队只有8个连，12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干部。我们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跟在日军后面发展根据地。周恩来指示我们：日本人打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在它后面建立共产党的根据地。

最初很顺利，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停步不前，我们就惨了，不得不打了一些硬仗。由于大部分是建立根据地的干部，战斗员少，因此牺牲很大，我这个连的连长、教导员都牺牲了。我从教员很快升到营教导员，主要原因就是减员太大。后来李先念的部队收留了我们，我进入司令部干部旅，跟李先念部转战。

打得最凶的是1946年停战之前，同国民党打，抢地盘。为了拖住国民党30万人，上面准备把我们牺牲掉。我们冒死突围，6万人分6个部分突围。我所在的干部旅拖了战斗旅的后腿，于是在陕西将我们化整为零，每人发点钱，三、五人化装逃走。我扮成老百姓跑到西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说，去延安已经很困难，叫我回四川，因为我是重庆人。我到重庆办事处后，找到何其芳，他当时是新华社重庆分社的负责人。我想到新华社，他不同意，让我回到江北老家。1947年2月，国民党勒令新华社回延安，我便同党失去了联系。为生活，我到陪都晚报当了一名见习编辑，干了两年。

1949年3月，解放军一路南下，我急不可待要找组织，动身前往当时已经解放的湖北当阳。一路上我不敢住店，不敢走大路，冒生命危险走到湖北荆门找到了部队。一见

面，他们首先怀疑我是特务，幸亏我遇到 359 旅的一个副参谋长（这时他已经是副司令），他证实了我的身份。当时我可以去北京，周扬是宣传部副部长，鲁艺的同学大都是各部门负责人，但我党籍还没恢复，又在国民党陪都晚报干过，因此就没去北京。

重庆解放后，我担任沙坪坝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来准备提升我为副区长。我不想从政，一心一意想当编辑、作家。我在鲁艺的同班同学李南力（长寿湖右派，1970 年去世）任作协秘书长，我到他手下当了一名创作员。后来我又调到重庆日报任编委、支部书记，并负责文艺、体育等版面的编审工作。

重庆日报的副总编贾唯英（女，长寿湖右派，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我调去时她犯了错误——没有把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从这点可以看出，当时在报社工作风险有多大。我为了圆编辑、作家梦，副区长不当，一头钻进这个是非之地。

贾唯英犯了那个错误后，上面为了加强领导，从宣传部派了一个叫余 XX 的人来当副总编，专门负责把政治关。此人不懂行，不学无术。最大的能耐就是政治上整人。反右时他积极得很，报社仅仅整下长寿湖的右派就有 17 人（死在下面 5、6 人），其它极右、中右、右倾等又有几十人。

余 XX 首先将贾唯英打成右派，接着便想收拾我，我业务上瞧不起余，政治上又认为自己资历老，南征北战、枪林弹雨冲杀出来，根本不把余放在眼里。

余 XX 最初并没有划我右派，他叫我下放到长寿湖当个下放干部，我一听“下放”便明白已经把我当成中右，离右派只有一步之遥，我厉声问他：“报社里谁是左派？”

我不服，拒绝下放。

余 XX 说：“好，詹光，你抵抗下放！”他干脆把我划成右派。

划了右派，没有材料，余 XX 便指使石大周从我签发的稿件和主管的栏目中去找。

很快就有了。文艺版有一个杂文专栏《绣花针》，他们责问我，这个“针”是针对谁的？最后定为《绣花针》是攻击共产党的毒箭。

这是我第二次亲身体会到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到长寿湖后，我一直不认罪，是有名的顽固右派。但是我认认真真劳动，我不怕吃苦。当问起“为什么在这儿劳动？”别人说是“改造思想，赎罪。”我回答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子孙后代造福。”

我不认罪是我认为自己为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从未反党反革命。我坚信自己的冤一定能洗尽，一定会平反，因此我不在乎。

在长寿湖把我打成反改造的首恶分子，成员有不服气的谭显殷、曹贞干等人。既然是以我为首，任何情况下都拿我开刀（据长寿湖其他右派说，每次开批斗会，詹光便穿上一件厚棉袄准备挨打）。有一次，“革命群众”勒令我们右派站好队。有人点水（告密）我是最顽固的右派。一个“革命群众”走到我后面，狠狠一刀捅进我屁股，鲜血顺着腿流了一地，旁边一个右派谢汝清吓得咚地一声栽倒在地，我直挺挺的立着，坚持不倒。

由于我死不认罪，整整在长寿湖呆了 20 年，1978 年才回报社。58 岁的人了，还干点啥？

今年我满 80 岁了，回想这一生，感叹万千，真的感叹万千。这场灾难是历史性的，

个人无法计较了。共产党从成立起，就一直在折腾，党内就一直在残酷斗争。我成了牺牲品，爱人孩子成了陪葬。爱人从区法院下放到巴县百节镇，一去也是20年。我3个孩子受影响，没有一个能上大学。由于他们文化低，无法教育好他们的子女，这个不幸牵连几代人。

还有我年轻时的愿望——作家梦，我又说这个事，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不可能了。

采访时间：2001年4月24日 地点：重庆日报社

采访后记

詹光是我采访的几个延安老革命之一，也是长寿湖拒不认罪的反骨分子之一。

很多长寿湖右派都对我说，詹光有两个特点，一是拒不认罪，二是劳动积极。

他的朋友，重庆日报的另一个右派金践之（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就比他清醒。他曾说：“我劝过詹光，用不着为不值得坚守的东西去坚守，但他不听。”

张志新、李九莲比较清醒，又比较顽固。结局是一个遭刀子割断气管，一个被竹签从下颚穿透舌头——防止她们临刑前“顽固。”

如此，我理解金践之（尤其害怕他们对付“顽固”的手段）。

如此，我更敬佩詹光，一刀杀下去，血流满地而坚挺不倒。

詹光此时身体已经衰弱了，听力也差，更兼又患了肺气肿，不时咳得惊天动地而面红筋胀，两个多小时采访下来，他显得很疲惫。我问起死在长寿湖的右派的情况，他满面阴沉一言不发，我再问他对他追求和坚守的这场革命的认识，他回给我一阵猛烈的咳嗽。

他站起来送客，魁梧的军人身軀，衰老的病人容颜。走到门边，我伸手向他告别，他一声不吭，目光严峻。突然，他举手齐额，向我行了一个军礼。

我一怔，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老人想表达什么呢？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此刻，走到生命夕阳残照的老人，是不是想向他朋友的后代说：走吧，孩子！清醒，而又“顽固”。

补记：2004年1月22日（大年初一），詹光在重庆去世，终年83岁。这位铁骨铮铮、走过了战场上枪林弹雨，走过了长寿湖20年九死一生的汉子，终于倒下了。



2003年9月21日，詹光最后一次参加长寿湖幸存右派的聚会，我赞叹他依然魁梧挺拔的军人身軀和气度，悄悄给他照了张像。四个月後，他永远离去了。我把这张照片“发表”在这儿，献上我一个后来者、一个晚辈无尽的哀思和崇敬。（2004年1月26日）

敢坚守良知？判20年劳改！

李恩章

1957年五一技校校长助理，1925年生



一、河北故乡抗日

我1925年出生在河北交河县官庄子村一个十分贫穷的农民家庭。

1937年，家乡遭了水灾，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了，日本人占领铁路沿线大小城市，广大农村则是一片空白。土匪、民变武装趁机而起，各种番号的军队，到村子就要吃。我见到的有陆路军、八路军、十大队（地方武装）等等。村子里的办公人天天敛钱，逼得老百姓无法生存。

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只得外出谋生，我讨过饭、当过学徒、医院的勤杂工。我吃过各种树叶，记得最好吃的是榆树花。



五十年代初的李恩章

1944年，我19岁。那天我在村长家（他表面上是敌伪的村长，暗地里支持抗日）遇到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说起救国救民的话题，投机得很。他对我说，八路军为穷人打仗，解放穷苦老百姓，要大家都有饭吃、有衣穿，最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地下武装。我被他的宣传打动，当场表示同意。村长说，莫忙，先问问你家里，这很可能是要掉脑袋的事。

我回去问父母和祖母，他们正饿得半死不活，叹口气说，家里反正没吃的，说不定哪天饿死，不如跟共产党走，可能有危险，也可能有前途。

就这样，我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游击队。

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就是拼死突围。那一仗打下来，与我同时参军的两个同乡吓得丢下枪溜回家不干了。游击队很弱小，打一枪换个地方，经常被迫得鸡飞狗跳，好几次我都差点丢命。一次我们被堵在屋子里，日本鬼子往屋里投手榴弹，我趴在地上，墙炸垮了，我借滚滚烟尘逃脱。还有一次突然与日军遭遇，我见没退路，掏出手榴弹躲在一垛墙后准备与日军同归于尽……

1944年11月，我同7个战友又被包围在一间屋子里，这次突围失败，我们8个人全部被活捉。

被抓那一霎间，我心想，完了，死定了。

我们被关了9个月，其中有11天我们10多个人被关在只有1.2米高的屋子里，每个人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屎尿也拉在地上。难受啊，我不想活了，只想快点死。

日本人审讯很简单，几句话就完了，把我们折磨得惨的是敌伪特务——中国人！他们把我打得昏死过去。但是我不敢说，说了就是叛徒，出去也要被自己人打死。

在监狱中我曾经想过自杀，没走这条路是坚信日本必败和认为自己能逃跑。后来在长寿湖我又想过自杀，又没走这条路是坚信自己无罪和担心影响家人。

我曾经组织过一次逃跑，被人出卖，敌人放出狼狗把我手脚几乎咬成残废。后来我又得了伤寒，11天没吃东西，靠喝一点米汤活下来。那个所谓的医院比停尸房还可怕，苍蝇、蛆、粪、死人，臭气冲天地挤在一起。我睡在地上，与死人为伴，神智慢慢恍惚起来，想到某人就觉得某人走到我身边同我说话。

日本投降时我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我们被抓进去8个人，6个死在里面，只剩我和指导员朱宝祥活出来。

回到家乡时，家乡已经是解放区，我养好伤病后参加了土改、镇反，随后又到了部队，在华北补训兵团当了一个教导员，解放那年随第二野战军来到重庆。

1955年，部队让我转业到重庆建设厂，同年11月又把我调到五一技校。不让我呆在部队是组织上对我不放心，觉得我曾经被俘虏过。建设厂是一个大型兵工厂，也觉得不放心，干脆把我转到学校。

按共产党的教诲，战场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才是光荣的，如狼牙山五壮士，而被俘则是可耻的，给军队带来不好的影响。虽然被俘后我们都坚决与敌人斗争，不泄露秘密，在刑场上也视死如归，但共产党总认为我们有了污点。等到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政权抓到自己手里时，对我们这种人员就进行清洗——凡是被捕、被俘过的军人一律下地方，军队一个不留。

二、五一技校反右

我到五一技校后当了校长助理。

1957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学校党支部书记崔振杰召开群众大会，动员鸣放，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克服三大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除三大主义以外其他问题也可以鸣放，如三反、五反、镇反、肃反……

动员会后划分小组，讨论崔的动员，同时开展鸣放，各小组选好记录员。

很快，“帮助党整风”变成了“向党猖狂进攻”，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学校成立了以崔振杰为首的五人反右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

领导小组首先把对学校教学工作提了尖锐意见的周仁文划为右派，他指责学校领导干部不懂科学，不能领导科学等等。划他时我没提反对意见，但接下来我发现崔振杰一心想整一个人，这个人是教务科长王开泰。

一年前，崔振杰想要私分一笔钱，这笔钱是教学上省下来的，王开泰不同意分，认为应当上缴，两人为此闹得不欢而散。

反右时，崔振杰细细的整了一份王开泰的材料，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要把他划为右派。他把材料给我看，我看那上面都是些不实之词，完全是胡编乱造，明显看出崔振杰想利用反右运动陷害王开泰，报私仇。

我一条一条地否定了他们精心给王开泰编造的罪行。崔振杰无法反驳，气得脸一红一白。

他一连三天三夜作我的工作，我始终观点不变，最后他摊牌说：“王开泰攻击我，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我在五一校代表党，难道有人反对毛主席不是反对党吗？你服不服从组织决定？！”

说到这一条上我无法了，我说我服从，但我保留个人意见。

他们把王开泰弄来斗，斗了好多天，王开泰拒不承认。

崔振杰想让我参与整王，在批斗王开泰的会上，他指定由我主持会场，我意识到这是崔振杰的阴谋，让群众和王开泰认为是在污蔑他，王开泰不满，就会反过来诬蔑我，这是崔振杰一箭双雕的阴谋。

我怎么办？如我坚持实事求是，崔振杰会给我安上包庇右派的罪行，也把我划为右派，如违心地按他的指令去整王开泰，良心上过不去，王开泰也会认为我很坏。

我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在这种有权便有真理的统治下，不从也得从。最后我决定，我去主持，但一言不发，用无声的反抗来对付。

在饭堂里我主持第一次批斗王开泰的大会。我坐在主席台上宣布开会，其他的话一句也没有，给大家一个莫名其妙的感觉。

大会开始了，崔振杰早就布置好的积极分子一个个上台发言，说王开泰恶毒攻击党，攻击领导，他参加革命是钻到共产党内部来专门从事破坏……

我在主席台上坐着，只是听，一言不发。

会上一个叫李明福的开始攻击我，说我是东郭先生，免死狐悲，与右派狼狈为奸，等等。

不管他们怎样骂，我仍然一声不吭。王开泰也作无声的反抗，默默地站在那儿，未按崔振杰的意愿来检讨自己。

这一次会没有取得崔振杰想要的成果。

接下来他们改变了斗争方式，崔振杰把他那一帮打手组织起来，分成几个小组搞车轮战，日以继夜地斗，不准王开泰睡觉，墙上、床上、身上到处贴上标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把镇压反革命那一套的架势全拿出来了。我见到这种场面很难过，我与王开泰都住平房，中间只有一室相隔。

斗了好几天，王开泰腿也站肿了，晚上他哭着来找我，说：“老李呀，我完了，你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腿还被打断了一根。我只不过为分助学金与崔振杰发生了矛盾，



1957年，中共媒体发动暴风般的声讨

就遭到他如此打击报复！”他边说边哭，哭得十分伤心。我心里也非常难过，认为崔振杰心太黑了。但我不能公开站在王开泰一边，只好用模棱两可的话劝慰他：“要相信党，要看到将来。运动中没有真理，群众说的不要计较。你现在倒下去，以后还会站起来，三反中那些错划了的所谓贪污分子，不是以后都甄别平反了吗？我相信党会实事求是的……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像站在十字路口，我不能与右派站在一块，只得暂时划清界限，到定案实事求是的时候，我一把崔振杰不敢见人的东西揭露出来……”

王开泰听了我这番话，不再哭了。他说马如兰（他妻子）还在哭，我叫我爱人去劝劝她。他走了，我躺在床上在想，这场斗争，到底是为了什么？想不出它的目的和作用。

斗争王开泰的小会从早晨天不亮就开始，一直斗到夜里二、三点钟，王开泰实在熬不过去了，精神崩溃了，他按照崔振杰的意思，叫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把崔振杰栽给他的罪行全部承认下来，并在群众大会上当众公布自己的罪行。

但是，他一喘过气来就否认，接着又斗，遭不住了又承认。承认、否认；否认、承认。最终王开泰受不了折磨，在肉刑逼迫下彻底投降了。

我在一旁看得很清楚，污蔑加大棒起到了艺人训老鼠的作用，达到了崔泄私愤图报复的目的。

崔振杰组织人整整将王开泰斗了长达半年的时间，我最记得那一大群“积极分子”，斗争会上一个个张牙舞爪，既凶恶又丑陋。这些人后来都被崔振杰提拔重用升了官。

我心里非常同情王开泰，但我也知道同情的后果。宣布王为右派的那个罪行材料是我念的——领导安排我念。我心里当然非常痛苦。王开泰听了，认为我要两面派——因为他来找我时，我明确地对他表示了同情。

王开泰投降了，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我了，我不得不想如何来保一保自己。我原来保王开泰，为他辩解，现在王开泰自己都承认了，弄假成真了，如我再坚持，就是明目张胆为右派辩护。我预感到大难临头，于是也想站出来批判王开泰——按他自己承认的材料再重复一遍。这样，王开泰会明白，不是我给他捏造罪名，今后真相大白时，也说得清楚。于是，在斗王开泰的大会上，我发言批判了他，起了助崔振杰弄假成真为虎作伥的作用，更助长了崔的气势。

崔振杰得寸进尺，说我也是右派，他利用王开泰的软弱，实行一打一拉，叫王开泰作为整我的马前卒。

他找王开泰谈话，对他说：你可以将功折罪嘛，你揭发李恩章，可以减轻你的罪恶，可以从轻处理。

王开泰信了这个欺骗。

他把我同情他的那些话，写成材料，交给崔振杰。崔振杰看了材料大怒，气冲冲地前来问罪。这个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被迫说假话的痛苦，我干脆冲着他说道：“那些话是我说的，告诉你，你们整王开泰的那些材料从头到尾都是假的！”

崔振杰立马又用整王开泰的手法来整我。于是，在一连串斗争会后给我定了罪——包庇右派，因此也是右派。

我不服，不断跑到市里喊冤，完全没有用。王开泰当了右派也觉得很冤，我们两个又走到一起，商量之后决定到北京申诉，我们想中央总会给我们一个公正，一个清白。

晚上，我们两人悄悄赶到菜园坝火车站，乘火车到了北京。第二天我们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去申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西单一幢大楼，到那里前门不准进，从后门一个只能进出一人的小门进去。几间平房里坐满衣服褴褛的各地告状的人，也有干部模样的。我们虽然被划成右派，衣服还是干部穿着。我进门以后叫我坐在条凳上等待。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把我叫到接待室，我把申诉材料拿给她，她看了看标题，一言不发就走了。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个警察，他对我说：走吧。我说到哪去？他说到西城分局，我说到西城分局干什么？他说：你不要多问。

在西城区分局，我被关进看守所，与小偷、流氓们关在一起。王开泰关在另外的囚室。关了8天后，学校来人了（他们接到了公安局的通知），我们被押回重庆。

崔振杰得意洋洋地对我说：你所有给上级的信，这么高一摞，全都转到我手里来了！

这时我才明白，整人不仅是崔振杰的问题。我们原来认为中央是好的，崔振杰坏，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我还难以相信，中央会与崔振杰一样？！

我到北京告状，还付出了一个惨重代价——祸及与我同校工作的妻子王凤鸣。

我原本担心到北京告状，崔振杰会对我爱人孩子下手。果不其然，他们得知我去了北京后，就对我爱人下手了。

王凤鸣：他们把我送到南岸弹子石的一个劳教所，要求公安机关判我劳教。当时我两个孩子大的一岁半，小的才半岁，还在吃奶，他们硬是把婴儿夺下，把我拖走。在弹子石劳教所，一个大尉军衔的军人看了材料，觉得奇怪，他说：“你这上面一条具体罪行都没有。”那位军人听说我有两个小孩，小的才几个月时，他冒火了，猛拍了一掌桌子：“送回去，荒唐！”

我由此躲过了牢狱之灾。

虽然没进监狱，但总可以给我戴个帽子，于是崔振杰把我也划成右派。实在找不到罪名，硬给我栽了一个“包庇右派分子李恩章”罪。1979年给我“改正”时，审查人员也觉得奇怪——我没有任何可以“改正”的“罪行”，就连“包庇右派分子李恩章”都没有任何具体内容。



李恩章、王凤鸣夫妻右派

（我问李、王夫妇，“改正”后崔振杰书记是否向他们道过歉。他们回答，崔当面没表示过丝毫歉意，但是托人带来过一张字条，只写了几个字，表示问候，也有道歉的意思。）

李恩章：从北京回到学校，我就被监视起来，门口天天有人站岗，夜间也有，上厕所都被人跟着。半个月后，学校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对我加重处分：每月只发生活费18元，送长寿湖渔场监督劳动。

王开泰则被开除公职，抓进劳改营。（详见后面“右派王开泰的经历”）

三、长寿湖劳改

我在长寿湖，属于死不认罪的几个顽固右派之一。为什么不认罪？道理太简单：根

本没罪！其他右派同我是一样的感觉，但是为了生存，为了活得轻松点，不得不说假话。我为啥当右派？就是因为不同意说假话，那么，我为什么要说假话承认自己有罪？

不认罪，要吃很多苦头，劳动量可怕得很。比如，国家规定每人每天挖、运、填土2.5个立方，对我们则要求完成10个立方。我就是在这种劳动中当众昏倒。（1944年是被日寇打昏。）

还有，不准探亲，文革中整整7年不准我探亲，还连续斗我120天。我想走绝路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二十年的经历讲起来就长了，说一次我挨打和埋死尸的经历吧。

文革初的一天，我在同兴劳动，突然红卫兵从山上拿着红缨枪向我们扑来。我们被拉到坝子上站好队，报数，然后跪下。我被搜出一首新疆歌曲《美丽的姑娘》，红卫兵说这是黄色歌曲，一脚冲我踢来，然后拉出来用草绳捆上，戴上纸糊的尖帽子，帽子上边挑着一个纸牌子，写着“顽固右派李恩章。”

红卫兵给我一个洗脸盆，一根短木棒，强迫我一路走一路敲打。两个红卫兵押一个右派，排着长队向先锋生产队出发。红卫兵不断高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把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到了先锋生产队，红卫兵叫那里摘了帽的右派来批斗我们，以此说明他们是改造好了的，政策对他们与对我们就不一样，这叫划清阶级界限。在那个年代人人争当“左派”，免得灵魂受辱皮肉受苦。

要我低头弯腰，我不干，我当兵练的腰板是直挺的！一个红卫兵上来按我脑袋，按不弯，又按，还是按不弯。他火了，用木枪照我头上噼噼啪啪一阵乱打，我只好蹲下去，但坚持保持腰的直挺。我的顽固又让我遭一顿毒打。

在长寿湖，经常要对右派进行评查，评改造的情况。那一年，场部委派工作组参加评查，还有报社的记者参加。评查到劳动局的右派陈遥之时，他十分恐慌。

陈的爱人是个纺织厂的工人，长年有病，家里有两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陈在评查前逃到重庆与爱人住在一起，劳动局又把他送回长寿湖学习班。

评查开始了，先追他的历史，他曾在南京国民党军需署任过职，这是历史上的斑点。接着评他抗拒改造——跑回家同妻子呆在一起。

学习班里的批斗是十分严厉的，他精神压力巨大，过去出身不好，这是“罪恶”的根源，眼前家庭经济又十分困难，已经难以支撑，长寿湖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让他身体承受不了，再加上天天批斗，他看不到前途，绝望了。



李恩章画的长寿湖右派“大战三秋”



李恩章画的长寿湖“右派劳动与生活”

我与他在一个小组，他睡下铺，我睡上铺。那天晚上小组开会他不在，派我去找，我猜想可能他自杀了，因为我见他端着洗脸盆从我身边走过，脸色很难看。我下到湖边，见一盒兰雁牌香烟在水边飘着，我捞起来一看，心想，他已经死了。我回去把情况报告了朱丰衍组长。

第二天我们把他的尸体捞上来，几天后，我和另两个右派把他埋了。

关于陈遥之还有一段后事。二十多年后，1993年，市劳动局的人事处长突然找到我，问陈遥之死后埋在哪里。我感到奇怪，长寿湖死了那么多右派，有谁在乎过？原来，陈当年在南京时结过婚并生了两个女儿，南京解放前她们逃到台湾去了，现在他女儿从台湾回来找爸爸。劳动局为了搞统战，所以忙着问陈遥之的坟。

劳动局派了一辆小轿车将我和陈的女儿陈仁平拉到长寿湖。上了岛之后，发现坟没有了，那片竹林也没有了，劳动局陪同的人叫我随便指个地方，我想这不是又搞欺骗吗？

拖延了一天多劳动局才同意挖地寻找。我们在那个大约有二十平方米的地方挖条沟拉网式地探寻。才挖了一条沟，就挖到了胫骨，又挖，挖到了头骨。陈仁平见到这些尸骨，泪水汪汪地流了下来，她边哭边收拣骨头。

我当时也流着眼泪，因为我也经历了那个逼人于死地的时代，也差点走上绝路。

我埋的另一个人是投湖自杀的李思强。

李思强原是重庆市委宣传部干部，因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下放到渔场劳动。在右派带尖尖帽游乡时，他指挥红卫兵整右派。没多久红卫兵说他是保皇派，把他抓出来批斗，他承受不了，批斗会后半夜里跳了湖。

那是1967年3月初，我划船时见楠竹坡一个蓝色的包包，随水波一起一伏，我好奇地划过去看，见是一个死人，四肢伸直，像蛤蟆一样趴着，鱼在他身上跳来跳去。



李恩章画的“埋葬李思强”

尸体拖上来后，领导叫我夜里守尸。我是顽固右派，没什么价钱可讲，但我心里想，你们认为是苦差事，我认为是美差。李思强这个泡胀了的尸体，不会汇报我守着他时自个睡觉。我一连守了十几天，一天夜里，忽然一场大雨，湖里的水涨了几公尺，李思强的尸体被飘走了，学习班又派我捞，我划条小船，拿着棕绳找到他的尸体，把绳子挂在脚脖子上拖到一个斜坡处。死人比活人重，我怎么也拖不上斜坡，只得回去把右派李宁熙叫来。我俩把他背上了斜坡，等他家属来看了之后再埋。

埋死人这样的事我是躲不脱的，我喊几个右派挖了

窝，郑大同当指挥，用一块白布扯开裹尸，尸体烂得不行了，眼睛爆出来肿得比牛眼还大。



埋葬陈遥之的地方，马鞍山“灭资岗”——“消灭资产阶级山岗”

大家用铁锹将他翻到木版上，四个人抬到坑里埋了。

他那个坟头后来长了一人多高的茅草，非常茂盛。有一次叫我割茅草盖房子，我想起了李思强，我到他的坟头上只用了半小时就割了一百多斤，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这是李思强的尸体帮了忙。

四、人生暮年感悟

长寿湖那二十年，共产党用劳改、批斗、暴打、强迫认罪等等来折磨肉体扭曲灵魂，把人驯服得像马戏团的猴子一样顺从。不但自己听话，还要去整别人，这叫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些右派把这一套看透了，一切顺着来，你假我也假，以假话对假话，这一招果然生效，不仅摘了右派帽子，还当了管右派的干部。

有人说：反右斗争是杀鸡吓猴，是毛泽东学唐僧治孙悟空的办法，戴上紧箍帽，不准你乱说乱动；也有人说：毛泽东学赵高指鹿为马，说鹿的人都被杀了，说马的人都升官了（意思是要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辨别是非曲直，叫你干啥就干啥，否则就会大祸临头）。不管怎么说，反右以后事实证明：再也没有人敢给领导人提意见了，四下一片赞扬声，全国到处浮夸风，水稻亩产十多万斤、十二万斤，这样的弥天大谎，没有一个人敢反驳。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这些都与反右斗争的成果分不开。

1957年我有个非常深刻的体会：被斗被整的人几乎全是好人，这些人要嘛有良心，要嘛为人正直，要嘛敢说真话，要嘛有民主意识，至少不趋炎附势，吹牛拍马。而那些整人的人，大多心术不正。回想（19）57年以来的这几十年，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偷奸耍滑，阴险邪恶之徒，大都在这个体制下日子过得滋润，或者升官发财。我们说这个人很“左”，即是说他一是虚假，二是整人。

回想这一辈子我对共产党所作所为的亲眼目睹，发现共产党在各个不同阶段都非常成功地运用了阶级斗争（即挑动一批人来斗、打、杀另一批人）这个法宝，正如毛泽东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来分给农民，告诉他们，你们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你们要保住分到手的土地，必需彻底打倒剥削阶级和他们的代表蒋介石。

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呀，土地是命根子，拚死也要保。那个参军、支前才叫踊跃！打起仗来一个个奋不顾身。当时我们攻一个城，组织一梯队、二梯队、三梯队，也就是敢死队，一梯队抬着云梯往上冲，死光了二梯队上，又死光了三梯队上，反正要把城子拿下来，死多少人不在乎。记得我们战前都要说，这一仗准备死多少人。那些农民士兵，个个不怕死，战前表决心，把身上的钱，不论多少，统统掏出来交给组织，说一旦战死就作为党费。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同那些无数要保卫土地、不怕牺牲的农民士兵有极大的关系。至于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还给不给农民土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共产党1949年掌权后，继续搞阶级斗争，而且变本加厉、花样翻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走到极至。到那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几十年你斗我杀，老百姓除了付出眼泪、鲜血、生命，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只是专制利益集团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工具。

我觉得，当局的统治术主要有三点：一是谎言欺骗，二是暴力镇压，三是许愿拉拢——这是我从19岁参加共产党，走到现在暮年的感悟。

采访时间：2001年5月9日、2003年10月10日 地点：重庆市五一技校

采访后记

从2001年到2003年，我先后四次前往五一技校拜访李恩章。李老先生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同另一位军人出生的长寿湖右派詹光一样，虽80高龄，仍威威虎虎，直挺的腰身透射出一股稳沉和力量。

长寿湖有一批老人（如陈英、向光棣、白永康、李春华、朱培德等）让我非常敬仰。无论是在往日黑云压城、血雨腥风、指鹿为马、诬良为娼的“斗争岁月”，还是在眼下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腐败空前、谎言依旧的“后极权社会”，他们都一如既往地坚守了良知、坚守了道德、坚守了做人的根本。

我常常渴望去拜望这些老人，同他们交谈。这似乎已不是为了长寿湖的采写，而是为了一种心灵的需要、一种“回归”的渴求。

他们，不仅仅讲给我一段历史、一段往事；他们，还给予我一种抚慰、一种启迪、一种感召、一种力量。

望着他们日愈衰弱的容颜，我想：面对眼下的礼崩乐坏、面对我们这个“日愈痞子化的社会”（何清涟语），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2003年10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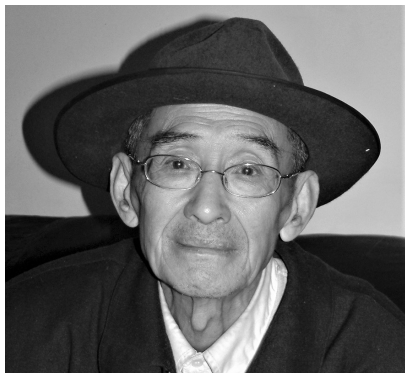
李恩章劳改地同心岛上的一棵大树（谭松摄）

1957年重庆市共计打了多少右派和其他“分子”，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当时除了长寿湖，还有缙云山、广阳坝、南川、通江等地接纳过前去劳改的右派。不过这些地方尚属收押“轻刑犯”的“温柔”之地，“重刑犯”——极右们——则被押往川西偏远蛮荒的山中。据说，那儿才是右派的人间地狱。在那儿，右派大量死亡。五一技校的王开泰是从川西劳改营中死里逃生的一个幸运儿，从他的讲述中，可以窥见到几个比长寿湖更血腥的镜头。

一个大难不死的幸存右派

王开泰

1957年重庆五一技校教务科长



给你说心里话，最近我心里直打鼓，担心哪！我听外台（电台）报道，那些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党搞专制独裁的，抓！秘密地抓。杨子立等四君子，判得重，8--10年！现在仍然是以言定罪啊。我听李恩章说，你去年也被抓过，我不晓得哪个说，我这辈子九死一生，家破人亡，遭整得惨，现在过点安稳日子不容易呀。但是，心里又憋得慌，压抑不住地要说，真的很矛盾。

一、革命干部与“反动右派”

我是山东诸城县人，1945年我在诸城中学读书。8月份共产党的军队打来了，他们告诉我，这支军队是劳苦人民的军队，是为解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我看他们衣着朴实，官兵也平等，于是就参了军。参军后，我参加了整个解放战争，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如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等等。我的腿就是在开封战役中受伤致残的。（王开泰因此被定为二等残废军人）伤愈后，我又随军南下，于1949年11月来到重庆。



王开泰 1945年在山东入伍时留影，17岁

1957年我在重庆五一技校任教务科长，当时的校领导是崔振杰。

当年5月的一天，我们在党支委会上讨论传达和贯彻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这是一份内部资料，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要大家对党无比热爱的心情，帮助党整风，推心置腹，畅所欲言，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对党内存在的“主

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一次整风。并指出“房子要经常打扫，否则会积满灰尘。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上灰尘的，也应该经常打扫……”，他还说母亲脸上有脏东西，要帮母亲擦掉。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我在党内外大会上宣读的，所以印象很深，它内容生动，幽默诚恳，很是感人。

我从小参加革命，把毛泽东共产党当作大救星、大恩人，难道我能看到我们党沾染上灰尘而无动于衷吗？难道我能对伟大领袖的讲话有半点怀疑吗？这时候，从中央到地方各种舆论宣传机器，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大鸣大放”的高潮，群众的确被“运动”起来了，每个人的思想都活跃起来了，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党和领袖的伟大。

那时，哪里想得到这叫做“引蛇出洞”？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市劳动局赵局长亲自前来学校“蹲点”，抓典型，他有意布置了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推出一个名叫周仁文的教师，在大会上作了典型的“鸣放。”

周仁文毕业于云南大学，是教化学的青年教师，人很直率，既然领导诚诚恳恳一再鼓励、动员，他就认认真真地当回事——把学校存在的问题归纳成“十大问题”，有理有据地在大会上“鸣放”了一通。参加会的人大受启发，会场上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很多人纷纷要求发言。最后，赵局长对大会作了总结，他首先肯定了大会开得很好，对周仁文老师大加表扬，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咳！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受表扬的周仁文和那些真正向他学习的人，后来统统被打成右派分子。当他们醒悟过来已经追悔莫及——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在劳改营命丧黄泉，那个“典型”周仁文，后来也死在劳改营里。

现在人们当然不会再受这种骗，所以说政治运动把人教“聪明”了，教得人人说假话，教出一些见风使舵整人害人的投机分子来。

六月，《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展开“反右”斗争，还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这篇经过大加修改的文章与整风运动刚开始时内部传达的那个讲话内容大不相同，语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火药味浓厚，要抓右派了！

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着重谈的是“香花”和“毒草”的区别和界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事后有人说，那个内部传达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是用来引“蛇”出洞的，不那么讲，“蛇”不会主动出洞，“毒草”不会主动“长”出来。也有人说这是个骗局，是个阴谋。毛泽东反驳说：我们搞的是“阳谋。”

告诉你，我至今搞不懂“阳谋”这个名词的含义。

我遭在给校党支部书记崔振杰提了意见，主要是说他独断专行，对上面报喜不报忧；对下面以己为中心拉帮结派。我那时不知道得罪了领导的厉害，更不晓得前面有个“阳谋”陷阱。

不久，我就被打成了右派。

批斗我的会有些冷清，除了崔的几个打手在嚎叫，后面几个积极分子跟着空吼，绝大部分人沉默不语。崔振杰认为原因是我有一张“画皮”，即：17岁参加八路军，战争年代负伤的残废军人，共产党员等。崔振杰认为，必须剥掉我的“画皮”，才能把群众“发

动”起来。

怎么剥？

篡改我的历史档案！

于是，我的家庭成分由“中农”变成了“大地主”；我的父亲由中学教师变成了“大汉奸”；我自愿参加八路军成了被八路军俘虏过来……

于是，我被塑造成一个对党有刻骨仇恨的，钻进革命内部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定时炸弹”。

崔振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最后，我顶不住了，在9月23日的全校大会上，我被迫当众“低头认罪。”当时我想，等运动一过去，我就要申冤告状，哪有如此整人的？！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从此开始了家破人亡的22年悲惨人生。



步入新社会的王开泰

二、农场劳改与妻离子散

1957年，我有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我妻子马如兰，是重庆电力技工学校的教师，有一个可爱的三岁的女儿和平，还有一位跟着我四年多的老保姆刘简玉。我当右派后，我们这个幸福的小家庭，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有人把我的孩子叫成“小右派”，有人叫我爱人是“右派分子”老婆，还有人挑拨我们的老保姆，唆使她和我们划清界限。

这时候的我，每天在外面下苦力，夹着尾巴做人，回到家里时见到妻子哭，孩子闹，心里痛苦极了。此时，只有保姆成了我们全家人唯一的精神安慰。她除了操持家务带孩子外，还不断的安慰我们，叫我们千万不要“钻牛角尖”，要放宽心，要吃饭，身体是本钱。外面有什么风声，她知道后立即向我们通风报信，叫我们小心注意。我们一家人一天到晚都处在恐怖中，随时可能有人进门盘查，甚至抓出来批斗。保姆虽然没有文化，但为人忠厚善良，在那种恐怖的气氛中，她不懂什么“阶级斗争”，只讲人性，只讲良心，她竟敢公开在外面说“王科长是好人哪！就是性子有点刚直，但他心是好的，怎么会成为右派呢？。”后来她被人教训了一顿才不敢公开说了。

1958年3月21日下午，学校通知我第二天一早就去南川乐村农场“监督劳动。”此时我妻子已经下放到南川海孔农场劳动去了。

我立即和保姆商量，决定在我走了后，由她把我的女儿带到她家里抚养，我家的全部东西都交给她带去。此时我每月只有十二元生活费，勉强能维持自己的生命。保姆流着眼泪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绝不会丢掉孩子，要我放心。

我的小家就这样破裂了，从此再没有聚合。



王开泰 1956年同女儿和平留影

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凌晨四点钟就起来收拾东西。这时我女儿和平睡得正甜，我轻轻地亲吻她的小脸……然后我匆匆告别了保姆，背上行李，走下楼。

我回头向小屋望去，那间小屋已不再是我温暖的家了。（我的住房马上被学校收回。女儿后来随她母亲改嫁，改名换姓了。）

乐村农场在南川与武隆县的交界处，离重庆约200多公里，当年进军重庆时，我曾途经这儿，没想到几年后我被发配到这儿来“监督劳动改造。”

农场坐落在一个山区里，这里群山连绵，人踪稀少，人民的生活非常贫苦，天天喝包谷（玉米）汤度日。气候也是阴雨连绵，很少见到晴天，是名副其实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荒凉之地。正是在这个蛮荒之地，我第一次听到了“亩产万斤”、“已进入共产主义”等振奋人心的词汇。

在南川劳动时，妻子来找过我一次，那是1958年12月23日。那天正吃中饭，接到她的一张便条，约我去水江镇相会，当时她已调到贵阳水利电力学校任教。她突然来，我有点意外。

饭后，我马上请假，下午3点赶到了水江镇。她一见我，怔了一下，突然扑到我怀里，失声痛哭！她哭着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这么脏，憔悴、苍老……

她告诉我：她想把女儿送到汉中她外婆家去抚养，她还说：“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也一直忘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政治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实在难以忍受！”她边说边哭。我告诉她，我决心破釜沉舟，到北京向党中央申诉（此前我在重庆申诉过，没用），我坚信党中央是英明的，我这个冤案一旦党中央调查取证的话，肯定会平反。那时候我俩都年轻，思想很单纯，把党章看得很神圣，把党中央毛主席当作真理的化身，以为只要找到党中央，冤案便会平反，家人便会团聚。

她急不可待地要我赶快去，问我有没有钱，说着就把手表取下来给我，叫我卖了当路费。我说不需要，我是残废军人，坐火车有半票的优待。最后，她提出，为了减轻她的压力，在我平反前我们搞个“假离婚”，我同意了。那时候我俩都年轻，思想很单纯，想得很天真，不懂政治，但把它看得很神圣，把党中央毛主席当作真理的化身。

第二天，吃了早饭后，我们一起去水江镇派出所，派出所回答说，离婚必须要有双方单位的证明。因此“假离婚”未成。不过，妻子的情绪比昨天好多了。从派出所回来后，我俩沿着镇东郊外的一条石板路，反反复复走了很多个来回。她满肚子说不完的话，而我却心情沉重，只想着如何尽快让我的冤案平反，从而尽快让家庭团聚。

中饭后，我要返回农场，她苦苦留我到明天走，准备向农场打电话为我请假。我对她说：“那就再呆一会吧，但我今天必须得回去。”她不好再坚持。就这样我们又在一



1959年在南川乐村农场合影。后排左一为李恩章，左三为王开泰

起呆到太阳偏西。

分别时，她送我到很远的一个路口才停下来。她一直望着我，我也回头望她，最后，直到我们都看不到对方的身影时，我才急急忙忙往回赶。

我没料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事后，我每当想起这次与她离别时的情景，感到很内疚，很遗憾当时我没有答应她苦苦留我再住一天的要求。我很对不起她。

后来，在巨大的压力下，她被迫带着孩子改了嫁。

1981年，她因病去世了。

（我同王开泰长谈六次，他唯一的一次流泪就是在谈到他同前妻的这次会面时。他老泪纵横地说：“我妻子要容貌有容貌，要品味有品味，我失去她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痛啊……”）

这次与妻子相见后，进一步坚定了我上北京申诉的决心。只有我的冤案得到平反，才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才能保住我的老婆和孩子。

三、进京申诉与跌入牢狱

1959年2月12日，我随农场的改造分子们一块回到重庆。这时，我已经是无家可归。我看到我原来居住的楼房上的灯光时，禁不住想起我的妻儿……我长叹一声，眼泪流出来。我只得住到黄沙溪我的老保姆家去。

我决心上京告状，同李恩章一块去。李恩章是因为我当右派的，李当时是反右核心小组的成员，他不同意划我为右派。崔为了拉拢他，私下向李许愿，只要李支持他，那么在整掉我之后把他提为学校专职支部书记（即进入校级领导）。值得敬佩的是，李恩章在崔的利诱拉拢面前，坚守了良心和正义，他当面拒绝了崔振杰，并质问他：“王开泰给你提意见是工作范围的意见，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崔蛮横地回答：“谁反对我，就是反党。”李恩章说：“我也是个共产党员，按你的逻辑，你反对我，是不是也是反党？”崔气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他见利诱不成，干脆用除掉我的那种卑鄙手段，一棍子把李恩章也打成了右派。同时，他一不做二不休，在2月28日的全校教职工批斗大会上，把李恩章的妻子王凤鸣也打成右派（据后来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绍成说，王凤鸣的右派一案连个上报手续都没有，她不明不白地被整了22年。）

自1957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反右”斗争后，整个国家便处于一种近似于癫狂状态。谁要和单位独揽大权的一把手有矛盾，一把手便很容易置对方于死地。1957年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单位再也没有人敢得罪独揽大权的一把手了，只能说奉承话，不能说逆耳的真言，只能当驯服工具，不能有独立思考，更不能与领导唱反调。谁反对有绝对权力的一把手，谁就是反党。

李恩章夫妇被打成右派后全家遭遇很惨，两个孩子也跟着遭了殃。文革时期，王凤鸣和两个孩子被撵出家门，强迫住在猪圈里。李本人在长寿湖几乎被整死，但他一直不认罪，有人叫他写个假检讨，日子好过点，他不干。他的骨气在长寿湖很有名气，为人所敬佩。

但是，我也一直心怀内疚，因为李恩章和他家庭的悲剧是由我引起的。

我和李恩章于1959年2月27日到北京，第二天我们就找到位于西单大街的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我和李恩章心情万分激动，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来到母亲身边，急不可待地向母亲哭诉冤情，而母亲则一定会洗清我们的不白之冤。

上访的人很多，里面坐满了全国各地来告状的人，轮到我和李恩章时已是下午四点钟。

我被喊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一位中年女同志接待了我。

她先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单位等，接着，她问我申诉什么？我尽量克制我的激动，把早已准备好的腹稿，从头到尾，全盘向她讲出来，并迫切恳请中纪委责成有关方面，甄别此案。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的冤情并未引起她的惊奇，我在申诉过程中，她虽然也作笔录，但表情十分冷漠，也不向我提问题，我仿佛是在向一个机器人倾诉。再后来，她好像有点不大耐烦。我讲完后，她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叫我先等一会儿。说着，她与那个正在同李恩章谈话的中年男子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离开了接待室。

我等她回来，我想她总对我有个交待吧。

这时，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民警，高声喊：“哪两个是王开泰和李恩章？走，跟我来！”

我们两人莫名其妙，随即跟着他出去，一出大门，就看见门外的院子里停放着一部小汽车。

民警调笑着说：“在外面住房、吃饭都贵得很，领你们到方便的地方去。”

李恩章朦胧地问了一声：“这是怎么回事？”民警没有回答，一车把我们拉到了公安局！我猛然醒悟过来：那个女同志出去后给公安局挂了电话！



王开泰 1956年在五一技校

我突然被关进监狱，思想上极端痛苦。这到底是为什么？按照党章规定上诉我的冤案有罪？党中央会容忍崔振杰用假材料来诬陷一个好人？这个困惑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得到解决——我看到刘少奇、贺龙等开国元勋被打成“反党”，诬陷他们的那种手段，同崔整我的手法非常相似。

我和李恩章分别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我这个牢房大约10多个平方，挤了10多个人，“床”是用门板打的通铺，上面什么都没有，夜里10多个人和衣挤在上面睡，门后面一个大尿桶，散发出一阵阵令人恶心的臭味。

我被提审过两次，每次我都喊冤叫屈，审讯员听了我的陈述，沉默不语。（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根本不敢再喊冤，那是后话。）

其实，那时我对党的感情极深，尽管受此大冤，但认定党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即使把我从牢房里拉出去枪毙，我也要高呼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我和李恩章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关了八天，三月八号黄昏时分，看守人员把我和李

恩章押到办公室，一看，全明白了——学校派了王正康、刘承正前来押解我们两个“犯人”回重庆！

我和李恩章赴京告状，轰动了全校，成为了重庆地区“右派”不服罪的一个典型事例。

我们被押回学校后，崔振杰和他的那些打手们兴奋极了，得意洋洋地说：“王开泰和李恩章的案子是党中央同意的。”

崔振杰公开亮出中央纪委拍给单位的“此案不予受理”的电报，对李恩章说：“你历次上诉的材料都原封不动地转到我手里来了。”

另外，当我和李恩章秘密去北京告状后，崔立即把李恩章的爱人王凤鸣拉出来批斗，然后派人把她押送到收容所。当时王凤鸣还是个哺乳婴儿的母亲，收容所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坚决不同意“收容”王凤鸣，王凤鸣才逃过牢狱之灾。

1959年4月13日，学校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学生大会。我又被加上“右派分子潜逃北京，无理取闹”的罪名，崔振杰在大会上宣布开除我的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会后，我立即被押送到重庆市解放东路219号，重庆市公安局看守所，又称为劳教转运站。

在看守所，看见许多等待送去劳教的人，有干部、教师、工人、学生。这些人大都有一定的文化，是被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清洗下来的“有问题”的人。我们在看守所集中学习当时政府刚颁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和看守所的规章制度。当时，《劳动教养条例》上没有劳动教养的具体时间，这就非常明确地向劳教分子宣告，如果不认罪，抗拒改造，想翻案，那就是“罪上加罪”，劳动教养将是无限期的。

在学习会上，有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有的流着眼泪说“我有罪”，“我对不起党”等话。我也不知真假，反正经过这一番表演后，有些人的确实受到了管教人员的另眼看待。看守所对那些拒不认罪的人，捆绑罚跪，直到他们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为止。我进看守所的第3天就参加了斗打一个名叫周良臣的人，那个场面非常野蛮恐怖！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10天，于4月24号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往位于四川乐山的中川钢铁厂。

四、人间地狱与死里逃生

中川钢铁厂在乐山城西南40公里，散落在周围几十华里的山区里，地处峨眉山支脉山麓中的大渡河畔，是乐山专署下属的公安局办的一个劳改和劳教合一的劳改营，里面有约10000多名劳教和劳改人员。

我们先到厂部，看见到处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恶从善，唯一出路”等触目惊心的巨幅标语。还看到一些来来往往的犯人，这些犯人正被持枪民警押着担运矿石，气氛十分恐怖。

这场景对我是个极大的威慑，我的神经高度紧张，认为这辈子完了。

我被分到火烧埂采矿四队，火烧埂是万山丛中的一个山冈，远近山峦层层叠叠，人烟稀少，非常荒凉，好像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在山上背风的地方，修建了几排临时茅草棚。棚里的中间有一条人行通道，两边搭了两排长长的大通铺，上面铺了些稻草，

我们就人挤人地睡在这四面通风且漏雨的草棚里。室内两盏油灯阴森森的，彻夜不熄，一个大尿桶放在门背后，臭气熏天。

劳教人员之间一律称“同学”，见队长讲话时要立正，要绝对服从。每天早晚两次全体集合，由队长点名训话，个人活动范围限定在警戒线内，严禁超越，否则以逃跑论处，哨兵可以开枪。

正是在这个劳改营里，我彻底明白了，不管你有多大的冤情，绝对不能喊冤叫屈，因为党的宣传机器一再宣扬“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你如果叫冤，就意味“共产党冤枉了好人”，就意味着你对党不满，就是“诬蔑共产党”，这又是“反党”，要被加重处罚。

在这样一个强暴的社会环境里，不仅不敢喊冤叫屈，也得不到亲友的同情，人人都要同我划清界线。这比封建社会还厉害，那时，老百姓还可以“击鼓喊冤”，还有亲友和舆论的支持。

我们队长刘丙仁是位三八式的老革命，他看了我的档案，有些同情我，让我当了班长，但是他告诫我，千万不能喊冤，不能上诉。他说：“越上訴你就会被整得越凶。只有接受改造，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我也终于明白，我必须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罪犯来接受改造。逃跑？咳，那些被抓回来的犯人，被打得那个惨叫，心惊胆颤啊。就算你侥幸逃出去，改名换姓，也没有用。“无产阶级专政”利害得很，谁敢收留你？另外，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根本无法生存。唯一选择是老老实实认罪伏法，争取早日解除劳教。当时，“回到人民队伍中去”是最让人动心的口号。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两条是每个“罪犯”必须做的：一是拚命劳动，二是揭发汇报其他犯人的言行。后一条在劳改营叫“以犯人治犯人”，李恩章他们在长寿湖叫“以右治右”。所以，那些年我们不仅不敢喊冤叫屈，而且绝不敢随便说话。

我们这批人，刚来时还有股猛劲，一个个又想通过拚命干活来摆脱绝境，因此，劳动亡命得很。大跃进不断推高潮，我们晚上也被叫起来挑矿石，更要命的是很快就吃不饱，我们身体迅速垮下来。

那些日子，惨不忍睹的事多呀，随便说几个吧。

有一天，一个劳教分子，因为精神太痛苦、太压抑，买了一瓶烈性虎骨酒，一口气喝了下去。不一会，酒性大发，他坐在地上放声痛哭，把刚吃进肚里的饭菜呕了一地。有个叫董永泉的右派，见到那些呕出的饭菜，立即趴在地上，用双手捧起来就往嘴里送。这是我生下来第一次亲眼见到的人变成狗的行为，可见那时的犯人饿到何种程度。

说到这儿，我自己也有一次类似的举动。一天早上，轮着我去厨房打稀饭，各班组打饭的人快到齐时，突然一声巨响，装饭的大木桶爆裂了，稀饭流了一地。大伙一拥而上，蹲下去捧起地上的稀饭就往嘴里送，我犹豫了片刻，也加入了“抢饭”……

今天想起来，难以相信自己会做出这种事，但在那个年代，只要被投放到劳改队，就没有任何人格可言，不管你过去是英雄好汉，还是才子佳人，统统没用。据重庆中梁山煤矿的右派王猛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从美国回来的大学者董时光（西南师范学院右派）为了抢桶里剩下的稀饭，把金丝眼镜和帽子都挤落在稀饭桶里。

虽然饿，但还不准“乱说”。有个劳教分子饿得慌，哼出一句：“社会主义好，社

会主义肚子吃不饱”，结果被人汇报，全队马上召开斗争大会。会上，这个人跪在地上，挨了一阵猛打，着重打他嘴，因为是他的嘴巴唱的歌，直打得他嘴鲜血长流。

我还遇到一件事，后来我当作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

有一个劳教分子，他爱人对他忠贞不愈，她把全家每月每人凭票供应的两个饼子（每个二两重）收集起来，从重庆寄给丈夫。在那个阶级斗争斗红了眼，六亲不认，夫妻之间也要“划清界限”的年代，这位妻子很难得啊！她丈夫收到这包饼子，饿虎扑食，一阵狼吞虎咽，一口气全部吃进肚子里，结果，痛得在铺上打滚，不到一个小时就胀死了。

死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但那时候，谁也不敢说“饿死”二字，因为社会主义没有饿死人这种事，只能说是“病死”。

我们班原有四十多人，不到半年的时间，连续“病死”了九个人，现在我还记得名字的有5个：马正仪、王桥松、方田、刘克彬、伍加林。

马正仪大学毕业，当右派前是长寿八角中学语文教师，他“病”重躺在铺上已经有些神智不清。临死那天，正遇上一次千载难逢的吃肉。他一听说“吃肉”两个字，忽然清醒过来，用手指着嘴，口张得很大，有人问他是不是想吃肉？他吃力地点头。开饭时，一位同学把他分得的那点肉端来，一块块喂他，他吞了几块之后才断了气。

队里有一个医疗队，在一个叫“瞌睡坝”的地方，“病”重的犯人都送到那儿去，但十有八九有去无回，因此人人都叫它“死亡队”。后来，重“病”犯人太多，医疗队承受不了，只好将“病人”留在队里。而许多“病”人，宁愿死在队里也不愿去“死亡队”。

我们班的副班长王松桥（重庆黄沙溪人），那时快50岁了，我们两个为了夜里睡觉暖和些，于是合铺睡。不久，他病倒了，两腿浮肿，上气不接下气，他怕被送到“死亡队”，一再说，他的病不重，不用去集中，可以留下来看守工棚。

1959年秋的一天早上，我把饭送到他铺前，连叫几声他都没答应，我把被子一拉——他已经直挺挺地死去多时了！我大吃一惊，吓得浑身瘫软，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和死人睡在一个被窝里！我至今不忘他那双眼睛，十分可怜，又十分恐怖。

方田也死得惨。他在被送到医疗队之前，多次恳求我说：“王班长，我不行了，恐怕回不了重庆了，以后你回去一定要到我家看看我的娘和我老婆张琳。”我满口答应，他还不放心，叫我记在笔记本上：重庆沙坪坝区化龙桥黄桷堡小学语文教师张琳。我写完，他这才放心，一再向我道谢。他被送到“死亡队”前拉着我的手泪流满面。临死前他要求见我，我于是请假去“瞌睡坝”看他。一走进草棚子，就看到里面横七竖八、东倒西歪躺着许多面容可怕的垂死病人，棚子里屎尿臭气令人恶心。我见到方田时，他已经成了一个还活着的骷髅。他听见我的声音，突然清醒过来，泪流满面地拉着我的手，很吃力地说：“王班长……你……你……回到重庆后……一定要见……我爱人……张琳……说我……对不起……她。”

说完他就断气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也非常恐惧，担心有一天我也会同他一样。

后来，我看到了埋葬他的那片荒山，阴风惨惨，到处是一堆堆的新坟，触目惊心！我的难友周革新是重庆长航局的右派，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对我说，当时死人太多，无处可埋了，有的地方一层层的埋了好几层尸体，后来实在埋不下去，只好把死者用他自己的铺盖卷起来，拖到一个山垭口处向山下推。久而久之，山下死尸成堆，野狗争食，

臭不可闻，下面几户农民只好搬家，而且不准他们说出去。又据难友李志田（原重庆民政局右派）后来对我讲，他从有关方面得知，当时中川劳改营共有劳改劳教犯一万人，其中饿死了30%至40%，也就是说大约死了3000至4000人之多。

我们那些没死的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面黄肌瘦，或黄肿烂胖，头发胡子长得很长很长，两眼痴呆无神。有的人两腿浮肿，走路气喘吁吁，衣领上爬着虱子，身上穿的衣服五花八门，破烂不堪，老远就有一股臭味，看上去的的确确像一群“叫花子”（乞丐），甚至连“叫花子”都不如。我亲眼看到有个劳教分子，在厂部干部伙食团的垃圾堆中捡骨头，用来煮菜叶子吃。

别看这些人的形象不如“叫化子”，但很多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而且是很个性的人，其中有中学教师、大学生、干部、归国华侨等。我后来得知，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流沙河先生，著名的漫画家汪子美先生等，就在中川劳改营“劳教”过。

我很不理解我亲眼目睹的这些悲惨情景，但那时报纸上和广播里宣传的却是：“人民沉浸在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幸福生活之中。”

我在火烧埂的日日夜夜，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残酷、最恐怖的日子，与当年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战场险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性质完全不同。

五、走投无路与被迫流亡

1960年9月5日晚上，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解除劳教。我激动得泪流满面，我终于从这个人间地狱里活着出来了！这是我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所谓的“认罪伏法，改造好了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我离开劳改营时，枯瘦如柴，蓬头垢面，走路有气无力。

在回重庆的路途中，看到到处都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比如在乐山城，走几条街，难得看到行人，到处关门闭户，好像一座死城。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我只有拿着旅馆开的证明到指定的一家名叫“大陆饭店”里去找东西吃。结果那儿只供应萝卜咸菜和酱油开水，还必须准时去，否则过时关门。新津、成都和乐山一样，也是冷冷清清，商店关门闭户，我是直到成都南门汽车站，才吃到只供给旅客的二两饭。

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家，只好去找我老保姆，自从我遭受迫害后，她一直关心我，在劳教期间，她还不时写信来鼓励我好好学习改造，同时把自己节省出来的全国粮票寄给我，她已经是我在重庆唯一的亲人了。

我沿着铁路走到她位于黄沙溪的家，她们全家人见我突然以这副骷髅像出现，大吃一惊，老保姆当场就哭了，我忍不住也哭起来。

回到重庆后第二天，老保姆的女儿刘素清就领着我去王家坡派出所上户口。派出所不准，理由是：上面规定要严格限制城市户口，原则上只准出不准进，另外，我又不是刘家的人。我顿时慌了手脚，户口等于第二生命，没有它，就没有工作权和居住权，也没有粮食供应，就意味着我呆在这个城市非法，根本无法在这儿生存。

第二天，我和刘素清又去派出所说情，还是不行，他们叫我找原单位。我是被单位开除了的人，回去有什么用？但是我走投无路，只得试一试。我回到学校一问，碰了一

鼻子灰，只得又灰溜溜离开。

当天夜里，我正躺在床上愁得睡不着，突然街道治安委员领着一帮人来查户口，有人认出了我，说我是右派。我说我已经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他们说：“那你就是‘人民队伍’中的‘右派’”。老保姆一家为我说了许多好话，但他们坚持说，没有户口就必须走人。我说时间已经晚了，明天一定搬走，这伙人这才罢休。这事让我意识到，我仍然是个“右派分子”，一个人民的“敌人”，所谓“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不过是分化“敌人”的一种手段。我感到自己又一次被愚弄了。

第二天，我冒着蒙蒙细雨，离开了老保姆的家。善良的老保姆对我很好，但她是个城市贫民，靠她的女婿朱汉卿当炊事员来养活一家人，最关键是没有户口，谁也不敢留人。

当天我搬到太平旅馆住下后，又去了太平派出所（已改名叫“公社”）。我向他们出示了中川的证明文件，对他们说，我的户口原来是在这儿注销的，我现在已解除劳教，应该再回到这里来上户口。

派出所在第二天正式答复我，像我这种人，不能在重庆上户口，必须遣返原籍，而且马上办理手续。

我该怎么办啊？我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下午六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馆，房主突然逼着我马上搬走，说我事先没有办理当晚继续住店的手续，床位已卖给了新来的住客了。这时天色已晚，我苦苦请求，

他不由分说地将我的东西往门外搬。记得小时候看小说《隋唐演义》，秦琼被店小二赶出店门，没想到那种狼狈落到我头上了。我只好背着行李去了火车站的“太和”旅馆，这里也早已客满，我说了一大堆好话他们才像打发狗一样地说：“好，睡在地上！”

那天，还有个插曲，当我走到大坪虎头岩时，猛然想起死去的难友方田，想起他临死前泪流满面的托付。这里离方田家已不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是临终之托，尽管我落到这般地步，心情很不好，但不能对不起朋友。于是，我找到化龙桥黄桷堡小学，见到了方田的爱人张琳老师和方田的老母亲。我如实地把方田临死时的遗言转告了她们。

她们婆媳二人抱头痛哭，哭得那个凄惨啊……

她们非要留我吃饭，那是饥荒年，我怎么忍心吃她们那点粮。她们拉着我不准走，给我煮了一小罐饭，接着方田的母亲（她是一双小脚）颤颤颠颠爬到黑黢黢的床下，摸摸索索掏出一个皮蛋，背着方田的两个孩子，剥开，一下子压入我饭里。方田家一贫如洗，那皮蛋是他家里最珍贵的东西呀。

从方田家出来，我不知往何处走，想来想去，只剩下回山东老家一条路了。可是，我有什么脸面回去见父老乡亲？回去后又怎么生存？

此时此刻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一个人一旦离开了组织（单位），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甚至去当“和尚”、当“叫化子”也无容身之地。

1960年10月10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1962年在长寿西山农场时

这天，我突然发现我口袋里的钱被偷走了！这笔钱是我在中川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钱和回重庆后东奔西走收回的公债券现金，共一百元，放在衣服的内包里，准备应急用的。肯定是昨夜同室的一个旅客（小偷），趁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时偷走了我的钱。

那可是我的救命钱啊！

我顿时觉得走投无路。以前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在“旧社会”，我在外面闯荡十五年，总有几个朋友可以投奔，至少找碗饭吃或借点钱没问题，实在不行还可以投奔“同乡会”，或者找某个民间社团去“告个帮”。“告个帮”是我们北方话，指人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求人。

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党统治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民间社会团体存在，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全国、全社会每一个角落都有党统治的组织，密密麻麻，布满党的神经、血管。完全没有个人生存的空间。这个政权一旦作恶，全国每一个角落都要震动，没有哪个地方逃得脱灾难。

更可怕的是，在这个社会里，一旦你被定为“阶级敌人”，你就成了“人民公敌”，或者说成了“瘟神”，任何人，包括亲戚朋友，都要躲着你，都必须同你“划清界线”，否则就要受处罚。比如我们学校有个叫周××的女同志，在我被打成右派后借给我20元钱，结果就受了处分。我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比较一下，共产党统治比国民党厉害得多、严酷得多。国民党时代茶馆里贴着“莫谈国事”，但私下总可以谈，家里总可以谈。共产党毛泽东时代，夫妻之间都不敢说，都要“划清界线”。解放前，我们老家的人活不下去了，可以闯关东，可以逃难，解放后，“户口”、“粮食关系”，划地为牢，让人寸步难行，灾难一来，只有活活饿死！

我坐在一条马路上的角落里，六神无主，浑身瘫软，怎么办？仅有的一条回山东老家的路也断了，真真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为什么老天爷这样残酷无情的折磨我呀！我想到从小跟着共产党，为共产党拼命流血；我想到自己仅仅是提了点意见，竟被整得家破人亡，落到这般地步；我想到这个不讲亲情、友情、人情，只讲“阶级斗争”只讲“镇压专政”的社会……我焦急、悲伤、痛苦、愤慨之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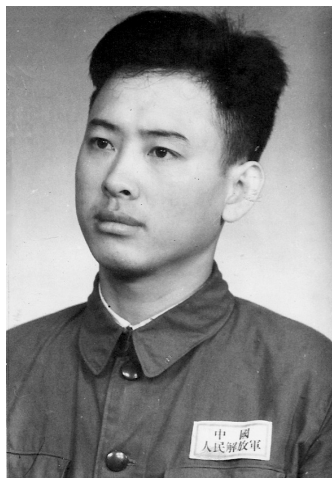
我完全绝望了，我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时候，正是中午12点钟，我横下一条心，临死前要吃顿饱饭，我另一个口袋里还有30多元钱。（当时饭馆只有中午那会儿才开门营业）

我排了两次轮子（因为饭馆都限量卖饭），在两个地方买了六两大饼，一个馒头，四两米饭，全部吞下肚子里去。随后，我沿着汉渝路向江边走去，准备在那儿跳江自杀。

到了江边，我选好了一个地方坐下。此时秋风习习，落叶飘零，江水滚滚。我掏出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一边不断地望着天空，长吁短叹。

此刻我思想极度混乱，过去的一切闪电般在我头脑里混乱不堪地闪过：从我两岁死了母亲，祖母把我抚养长大……从参军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从我过去美好的小



当年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

家庭、妻子儿女……从残酷的现实到生与死的比较……

大半盒香烟快吸完时，一个新的念头在我头脑里慢慢出现，并渐渐地停下来：要想死为什么不早死呢？死，也应该在刚被打成右派时呀，那么多苦难、那么多非人的折磨都受过来了，现在去死，太不值得！于是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还年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这个根本信念上来，我又想到“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古训……

我猛地站起来，不死了，走着瞧吧！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老保姆家，收拾我的东西。老保姆知道我不得不回山东后，哭了起来，我也含着泪说，事到如今，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请她不要为我担心。

这次同她分别，竟成了永别！

10月11日，我去买火车票，幸亏我是残废军人，用了16.7元的半票价买了一张到山东省高密县的通票。

第二天早上8点20分，我登车离开了重庆。

（王开泰回到山东老家后，仍然呆不下去，无奈中只得又返回中川劳改营。此后，曲曲折折，九死一生，终于熬到1979年的平反。限于篇幅，后面的经历只得忍痛割爱。）



善良的老保姆刘简兰

采访时间：2003年12月 地点：重庆市五一技校

采访后记

王开泰不是长寿湖右派，与他相识，是通过与他同校的右派李恩章。

2001年6月，他在李家看到我的杂文集《看着我的眼睛》后，表示希望同我聊聊，于是我们通了电话。不料，紧接着我就开始电视记录片《重庆大轰炸》的采访，把这事拖了下来。

2002年2月，我到李恩章家去悼念右派白永康时，初次见到了他。老人拖着残腿，一拐一拐地在屋里边走边“演说”，充满激情，敢怒敢骂，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思想。我表示想采访他，他满口答应：“你来！我的经历三天三夜讲不完，你至少听我一整天。”可是，又不巧，第二个月我就着手创办《中华手工》杂志，创业之初，千头万绪，分不出身。几个月之后，我被重庆市国安局收审，释放后又被监控。待“取保候审”一年期满（至今未对我宣布解除），我马上赶到五一技校，可惜，王开泰已搬到成都去居住了。

我一心想补上那一段长寿湖之外的右派的“故事”。

终于，在2003年年底，我见到了回渝来办手续的王开泰老人。

老人眉头紧锁神情凝重，一开口就透露出深深的担忧和恐惧，言辞有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两年前那个敢怒敢骂的老人哪儿去了？

我只好抖擞精神，说了一大堆大义凛然的话，同时告诉他，我现在没事了，肯定不会给他惹麻烦。

老人毕竟有觉悟、有认识，一经“煽动”，很快便被“颠覆”，那几十年的悲愤又压抑不住，血泪凝就的铭心感受又滔滔涌出来。到分手时，他主动说，他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本秘而不宣的书，叫《“右派”恶梦》，有15万字，他愿意借我一读。

在12月里，我四次登他家门，推心置腹长谈，并征得他同意，选用了《“右派”恶梦》中的部分情节，以上这篇采访录几乎全部来自老人书中的内容。

《“右派”恶梦》非常真实、非常完整、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右派分子22年的血泪岁月以及那一个年代的荒唐、残酷、残暴，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我细细读了几遍，好几次掩卷长叹，甚至泪水盈眶。

在欢庆毛泽东110岁诞辰的那一个夜晚，在山城灰冷阴沉的天空下，我走出五一技校，怀中，揣着老人托付给我的文稿；心底，有一个声音在滚动——

——“让黑色的墓碑刺破你血红的天空！”

补记：受王开泰老人之托，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为他的书稿作了修改和编排，并征得老人同意将书名改为《穿过死亡的幽谷》。工作完成后，他又请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

一座文字的纪念碑

——为右派王开泰《穿过死亡的幽谷》作序

1957年6月8日——注定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六月飞雪，乱箭如雨，一场规模空前手段卑劣的坑儒虐杀正式拉开战幕。数十万耿直之士、饱学之君中箭落马，堕入“阳谋”陷阱。

王开泰是数十万不幸者之一。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铁窗、流放、苦役、斗打……

但是，他有幸穿过了死亡的幽谷，并在生命的暮年，将自己二十二年九死一生的斑斑血泪，将自己亲历的那个时代的美丑善恶，汇聚塑建成一座文字的纪念碑——《穿过死亡的幽谷》。

2003年，我初次读到他的记述，几年后，为他修改文稿时又细细品读了每一章节。虽然这些年我采访过上百名右派老人，饱览了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的奇冤大苦，但是，王开泰的文字仍然让我悚然心惊、沉思浩叹。

五一技校里“引蛇出洞”的千古奇冤；



1979年6月王开泰平反后与分别20多年的女儿和平在重庆相聚

水江镇郊外血红夕照下的夫妻永别；
中川劳改营里地狱般的恐怖情节；
乐山街头摄像般的历史展示；
二十二年大悲大苦中人性的曲扭、挣扎；

……

读完，我掩卷长叹：
这是一份详细记录那一段血红历史的珍贵史料；
这是一份真实描述那个时代奇异特征的生动文本。

《穿过死亡的幽谷》不是情节曲折的小说，不是文笔隽永的散文，不是立意高远的政论，它也许文字尚欠精炼优雅，思辨尚缺深邃透彻，但是，它是真相和真实——那个史无前例时代的真相和真实。

当谎言欺骗、假冒伪劣成了一个社会无处不在的特征时，我们太需要真相和真实。

《穿过死亡的幽谷》的内容，主要来自作者当年的日记——在那个片言子语便可招来杀身之祸的年代，王开泰一一记下了每天发生的事，并把日记保存下来，这在数十万右派囚徒中，实属罕见！

眼下，有人认为，反映五七右派的文字已经不少，如无一个更高层次的深入，则既无商业价值，也引不起读者兴奋。还有，在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我们早已“审恶疲劳”。况且，这原本还是一个拒绝触及悲剧，偏爱拥抱乐感的民族。

可是，我认为，在数十年层层堆积的“光荣”、“胜利”、“辉煌”、“伟大”之中，在新一代又被人成功地与历史真相隔离之时，如《穿过死亡的幽谷》的写作，实在不是“太多”。况且，同威烈肆虐几十年，纵横驰骋千万里的浩浩灾祸累累冤情相比，眼下，揭示苦难，反映真相的文字多了吗？

几年前，俄罗斯曾花费几十个小时，一一诵读五万多个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不幸者的名字。

没有人觉得它太多太长。

林昭在狱中用血书写道：“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地感到巨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会一想起1957年，便感到巨痛？有多少人知道到“1957年”带给国家、民族、个人的巨大灾难？眼下，老的一代逐一“谢幕”，带走了一曲曲悲欢离合；而新一代则满目金黄，看不见一段段千古奇冤。（笔者所教的大学本科生绝大多数不了解五七历史与五七真相。）

庆幸的是，我们有王开泰这样的右派老人，他忍着挖掘旧伤的痛楚，怀着警醒来者的使命，将自己二十二年的血泪经历一点一点吐出来，竖起一座文字的纪念碑，既昭示后人，也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些消殒在“阳谋”祭坛上的无辜冤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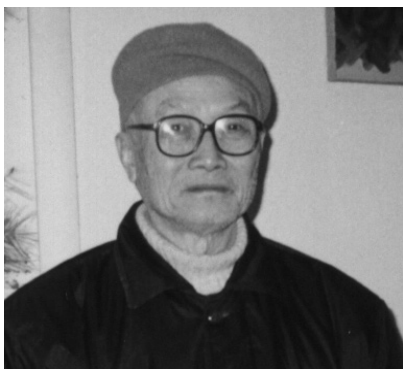
愿在通往“纪念碑”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

2010年6月8日

投奔延安、热爱美术的代价

龙实

1957年重庆文联党组书记，1918年生



一、投奔延安

南京失守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课堂里一片哗然，教师满面悲愤，肃立不动，同学们群情激昂，有的失声痛哭。不少同学当即决定，放下书本，到抗日前线去！

找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我在学校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读书会”，常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那些书让我觉得，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中国的曙光在延安。于是，我决定：走，到延安去！

1938年元旦那天，我与读书会的好朋友莫燕忠，约了同学黄巩固、刘仕俊、关夫生、李显仁、伍朝波，一行七人，凭一颗赤诚的心，握一本全国地图，向北找延安。

北方天气寒冷，先把我们这批广州学生冻了个死去活来，遗憾的是，千辛万苦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不要我们去延安，把我们安排到西安以北泾阳县的一个青年训练班。

训练班位于一个荒僻的地方，班主任是胡乔木。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汇聚于此，南腔北调，交流困难，课也不成体系，一会是江西红军讲“游击战术”，一会是分不清哪地的乡音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中两位同学李显仁、伍朝波难以适应，扭头就走了。我们读了一个多月就算毕业，只有黄巩固被批准去了延安。刘仕俊、关夫生无奈只得回广州。我与莫燕忠不愿回去，训练班介绍我们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2月底，我与莫燕忠考进了阎锡山任校长的民大曲沃分校。进校一周还没上一节课，北面的天然屏障中条山失守，学校紧急搬迁，我们像难民一样逃难。路上，学校四分五裂，我与莫在黄河岸边加入了一支杨虎城将军的旧部，开始打游击。两个月后，大队长牺牲，内部矛盾重重。我与莫再次下决心到延安。

我俩从郃阳县出发，几百里路，人烟稀少，满目荒凉，我们一路步行，向延安疾走，那个急切和热情，迄今记忆犹深。

几天后，一个农民说前面不远有一个八路军的兵站，我们俩高兴得跳了起来！

出乎意料，兵站态度非常苛刻，把我们俩当特务审查，彻底搜身，几次命令我们向后转。最后，幸亏看了我们的日记，才勉强相信我们是学生。兵站放了我们，但断定我们到不了延安。

又走了几天，终于看到了耸立的城墙！延安，到了！我们俩欣喜若狂地朝城门跑去。

突然，一声喝令：“站住！”一杆枪横在我们面前，士兵看了我们邵阳中学的介绍信，一脸不屑，坚决不让我们靠近城门，也不听我们解释。天快黑了，我们急得要死，士兵这才手指城外的清凉山，要我们去陕北公学那边想办法。

我俩急匆匆渡过延河，找到清凉山脚下的陕北公学，以为在这儿会受到欢迎。教务处一位工作人员打起官腔，说什么仰慕延安，可以理解，但如果人人都往延安跑，别的地方靠谁坚持抗战。他还说广州的抗日救亡工作也并非不重要，如此等等。

他分明是打发我们走（后来才知道此人叫张春桥），我与莫燕忠立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天已经黑了，往哪儿走？难道两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真的是汉奸、特务？我们又急又慌又气，差点哭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出来了一个“救星”，当然不是那个“大救星”，而是公校校长，大名鼎鼎的“创造社”文艺战士成仿吾。他满面慈祥，一副学者的面孔，他一边听我们的讲述，一边仔细打量我们。最后，他把头一点，说：“好吧，留下来学习。”

这样，我1月1日从广州出发，一波三折，终于在5月3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二、逼疯作家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美术，终身的最大愿望是当个画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时我选了美术。当时缺美术老师，全国来的一些学生美术水平不低，我是从同学那儿学了一些美术知识。半年之后，我们鲁艺的12个学生和抗大的数十名学员，被派到吕梁山区八路军115师实习。美术系的三人，那狄、陈角楠和我。师政治部主任是罗荣桓，他一见面就告诉我们，鲁艺规定我们实习半年再回去学习是不可能的，因为部队需要文艺宣传人才。

我很失望，但绝对服从。从此，我随着部队出生入死，转战11年，走遍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多次死里逃生，我曾写过一本《烽火岁月》记录这段经历。

上海解放，我随军进入上海，负责文艺方面的接管工作。那时很忙，行政事务太多，我这个人天性不愿当官，不愿意搞行政，只想画画。战争年代我就下了决心，一旦胜利，我愿意当教师不当校长，愿当秘书不当领导。在上海我提出不当那个主任，上面批评我，说党现在不需要搞艺术的人，需要管艺术的人。

1949年底组织西南服务团，需要一名团级干部带队，我自告奋勇去西南——我想摆脱行政，走远点，搞艺术。

到了重庆根本不是那回事，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说：怪了，共产党打下天下不去管理？行吗？！这样我被派去当沙坪坝区的宣传部长。区委书记张文澄调走后我又接任区委书记。那几年，我很苦恼，主要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当领导要去给人家讲，只得热炒热卖，累得人都瘦了。

1955年，张文澄（时任市委宣传部长）问我愿不愿调到市文联当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我一听很高兴，区委书记管几十万人，工业、农业、学校，很复杂，文联才几十号人，单纯，简单，可以有空时间搞美术，我高高兴兴地去了。

这一去是我人生中的第二个大转折。

我去时，文联的肃反已进入了尾声。我一去就感到气氛十分紧张、压抑，人与人像狼，你要杀我，我要吃你，是一种战场的气氛。人虽不多，但有种种“问题”的人不少，我不知道该同谁打招呼才算正确。负责肃反工作的是文联副主席曾克，她在新四军当过记者。此人虽是女性，但斗起人来火力很猛。我去时还有十来个人在隔离审查。她大搞逼供信，一个叫殷方刚的作家在隔离审查时上吊死了，她向我汇报这事时，很随便地说“死个了”，那语气和表情给我印象很深，仿佛死了一头猪。

然而，给我刺激最大的是三天后的一个斗争会。你要记住这个人的名字——黄贤俊。我后来一生的遭遇都与他有关。

黄贤俊是作协（当时文联与作协是一家）的一个颇有名气的专业作家，解放前就有相当的地位和名气。肃反时，认为他有特务嫌疑，关起来审查，吃饭都从窗户递进去。我去时他已经被关了快一年，斗了无数次。经过调查，已经证明他不是特务，但曾克等人决定再压一压，最后攻一次。

那次斗争会让我目瞪口呆！我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战场上的厮杀司空见惯，我没想到斗一个人会这么凶狠、这么紧张。一个个咬牙切齿，拍桌子，大声吼叫，非要黄贤俊承认是特务，火力之猛，气势之凶让我想起硝烟弥漫的战场。我才去三天，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坐在一边不吭声。

长时间的关押和批斗，黄贤俊的精神已经大受影响，他企图辩解，但刚一开口又被一阵猛烈的炮火压下去。他脸色越来越苍白，双眼渐渐变得通红。他突然大叫一声，双手捧住头，说有人在他的脑子里装了一部机器，机器在向他下命令，是个女人的声音……他越说越玄。

他疯了！

斗争会嘎然收场。人们把他押回去，他从关押处（三楼）突然冲出来，连滚带爬滚到一楼，跪在地上，双手捧头，说“机器”命令他给大家下跪……

曾克等人见状，失去了再斗再关他的兴致，党组会上一致同意放他。派人去告诉他：你的问题搞清楚了，不是特务，现在恢复你的自由。

黄贤俊目光呆滞，毫无表情，“啊，啊，啊”地叫了几声。

三、打成右派

1956年是完成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的大喜年，资本家敲锣打鼓欢呼消灭自己。全国上下莺歌燕舞，喜气洋洋。黄贤俊被释放后，身体有所恢复，神智也慢慢好转，但很难写作，写出的诗朦胧得没人懂。他一心一意编前文联主席邵子南的遗作。邵虽是领导，但平易近人，黄贤俊很敬慕他。但是，黄贤俊不时发病，一发病就双手捧头，说“机器”在给他下命令。

见他那样子，不少人生出同情，想给他点补偿，我也有这个意思。在选省政协委员时，便根据他解放前的名气和地位，选了他。

其实，这是害了他。

他去成都开政协会，偏偏在会上发了病，胡言乱语一通。省上发怒，说重庆文联发

了疯，选了一个疯子当政协委员。我赶紧派人去把他接回来，但是，这一幕被省委书记李井泉看见了，种下祸根。

1957年鸣放，反三大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我很赞同。文联的焦点集中在曾克和她丈夫张柯岗身上。她们夫妇，妻在前台，夫在幕后，整个心思都放在整人和权力上，肃反就逼得两个作家自杀，一大群人被关审，事后没一点歉意，犯了众怒。所以，整风时，前台的曾克成了众矢之的。她找到我，十分惶恐，想我给她撑腰。我告诉她要检讨自己的工作作风，知识分子、作家们不是敌人。她很失望，也很气恨。鸣放那几个月是她最难受的日子。

六月，形势急转，整风变成反右，提意见的人一个个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敌人。曾克精神陡然大振，那个陡然翻身的气势，盛得很。

这儿我不得不说一下毛泽东。毛泽东被匈牙利事件吓坏了，以为知识分子要煽动人民起来造反。其实，当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知识分子非常爱国，在国民党时期就一心渴望祖国统一，祖国强大。解放后，知识分子阶层整体上是一心一意跟党走，提点意见也绝对是善意的。你毛泽东、共产党掌握那么强大的军队和专政工具，怕什么？冲着一些根本不是敌人，也绝无叛心的知识分子开战，用杀气腾腾的战场术语“打退XXXX的猖狂进攻”，既可笑，又可怕。

当年抓右派那个声势你没见过，吓人！我经历过战火的人心都发悚。一会儿抓一个，或者铐走一个，家庭破裂，鸡飞狗跳。我是一把手，反右的领导，不敢不反。我在位期间，共打了五个右派，刘盛亚、温田丰、刘钊、张晓，还有一个名字忘了。刘盛亚曾留学德国，与黄贤俊同是比较知名的作家，他比较狂，自比巴金，看不起党政领导。我当时只觉得他勉强可以划右派，其他几个人划右派我很别扭，比如刘钊，他只是同意丁玲“一本书主义”（即作家至少应出一本书），就划右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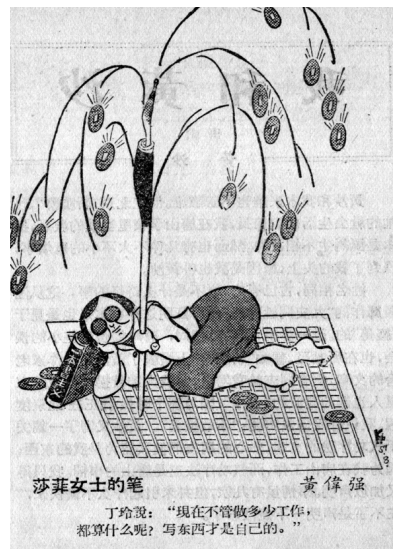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保他？我不敢，我也有私心，我不打几个右派，自己就没法交待。刘钊是曾克坚决要打的人，他对曾的生活作风提过意见。还有，“一本书主义”搞得很凶，我在北京听周扬讲过话，那是个大罪名。（你听起来好笑？）

1957年反右结束时，我受了表扬，市委宣传部的王若说我有原则，立场坚定。其实我问心有愧，内心一直动摇。

1958年，市里认为打右不够，要补课，还要抓右派。省委书记李井泉来视察反右情况，直接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市宣传部长张文澄，一个就是黄贤俊。

张文澄在省党代会上没投李井泉的票，李井泉见少了几票，大力追查，查出了张文澄，非要置张于死地。

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邓垦（邓小平的胞弟，他原本同张是好朋友），在任白戈指



反右时讽刺“一本书主义”的漫画《新观察》57年18期

示下，整了一份张文澄反党罪行的材料，我一看那个材料傻了眼，世上还有如此颠倒黑白的东西！譬如，张（19）57年奉命召集的鸣放会变成了有意聚集知识分子给市委施压，意在反党。我在这份材料上打了一些问号和惊叹号。这份材料后来被曾克拿去汇报给任白戈，那些问号和惊叹号成了我的罪行之一。

关键在黄贤俊身上。李井泉对黄极其不满，认为他是装疯，借疯话攻击党，要打他右派。宣传部的王若马上找我，说黄是右派，是装疯反党。我对此非常反感，黄是真疯假疯文联的人都清楚，你把人家关大半年，逼疯了，已经欠人家，又根据几句疯话打人家右派，太过份。况且整个（19）57年黄都一声不吭，像个木头，没鸣放一句。

支持我观点的人不少，党组书记、作家李南力还找来一本医学书，一条条分析黄的症状，认定是真疯。在讨论会上，我据理力争，王若也觉得这样整不妥，但李井泉点了名，他没法，亮出了底牌。这一下，很多人转了向，跟着说是装疯。我不干，顶着不办。

不办？很简单，我被撤职（但保留党组成员）。我想正好，无官一身轻，我要搞美术。

我还是太天真。新党组一上台就整我，扭住黄的问题不放，我坚持黄没反党，不该再冤枉人。这个时候，只有李南力和我两人坚持，原先同意我意见的人见势不对，纷纷倒戈，其中就有作家高缨，几十年后他为这事连连向我道歉。

1958年5月的一天，文联开大会，我一进会场，发现气氛十分紧张，三、四个公安人员虎视眈眈。会刚开始，一声大吼，几个公安人员扑上去咔嚓一声把黄贤俊铐起，主持人宣布黄贤俊是右派，逮捕法办。

黄贤俊马上被押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紧接着，主持人说：“文联为什么有这么多隐藏的右派？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黑司令！谁？”他故意停顿，然后突然手臂一挥，干脆有力地指向我：“他，龙实！”

我得承认，那些人很会营造慑人的恐怖气氛，一铐一打，会场空气凝固了，像一场大战。

当场宣布我是右派，撤去一切职务。

在战争年代，我遇到过多次突然袭击，我被敌人逼得跳到井里，但每次我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1958年5月的突然袭击，我逃不脱了。

我被抓出来之后，文联一连串打右派，今天一个，明天一个，人人自危。与黄贤俊要好的一个专业作家，杨禾（他曾当过重庆大学教授），在会场上就吓坏了，不久上吊自杀。比较坚定的李南力也招架不住了，他赶紧加入批判我的队伍，说是受了蒙蔽。他想混过关，但是，为时已晚。

几个月后，我们俩在长寿湖碰头。

文联一口气打了高达25%的右派，平均四个人中打一个。除开职工占的比例，这25%几乎全是作家。在成都的著名作家沙汀当时叹了一口气，说重庆作家被一网打尽了。

四、艰难岁月

在长寿湖，我反复问自己，我是右派吗？我是阶级敌人吗？我承认我没有阶级斗争

的意识、观念，一直以民主革命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没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斗争观来对待他们，因此我也就成了“阶级敌人”？

转眼饥荒到来。

我1960年回重庆过春节，走三四十华里到长寿乘船。一路上，村村有新坟，有的坟头上还飘着纸幡。还看到三四个倒在路上的行人。有一个还未断气，眼睛勉强还能转动，那神情，似诉苦，似请求，又像临终无言交代身后事。最令人心酸的是两个瘦得像骷髅的孩子，两双无神的眼睛，爬在路上寻找沙土中的草种子充饥，满咀满脸泥土，身边没有大人，想是父母自顾不暇，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那年头，我也饿得要死，买止咳糖浆喝，一口气喝八、九瓶。别人说那是药，要出问题，我说，管它的，只要有点糖。有一次，农民来卖没有孵出小鸡的蛋，右派们一个个争抢，打破壳，里面小鸡已经成形，大家连毛带骨活生生吞下去，那场面，像是回到野蛮时代。1960年，我骨瘦如柴，而脸色却浮肿得变了形，很可怕。农场很大很分散，死了多少人，不得而知，光是我们生产队所在的岛子上，就死了不少人。有一个青年，平时朴实肯干，一看就是个规矩人，可有一天，他饿急了，跑到南瓜地里偷吃了一个小南瓜，他不知道生吃南瓜是会中毒的。饱吃一顿过后，他上吐下泻，肚子剧痛，中毒死了。有一天，一个割草的，割着割着，倒下去就再没起来。又有一天，有人看到湖边飘着衣服，不见洗衣人，后来才发现湖面上露出一具尸体。

我也差点步他们的后尘。那天，我奉命检查麦收，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小船靠岸，我才迈出第一步，突然觉得，湖水怎么跑到天上去了？整个山在转……

等我醒过来，天已经黄昏。最先我微微听到湖水拍岸的声音，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看到身边的小船，意识逐渐恢复。我以为我要死了，恐惧迫使我挣扎起来。我勉强把小船划到最近的岸边，然后弃船上岸，连爬带滚地回到宿舍，只说了一声：“我不好！”便又晕了过去，睡了一天一夜，听到耳边有人说：“不会死了！”我这才捡回一条命。

我整整躺了三天，就在那三天中，死了两个右派，一个是市总工会的张樾，另一个是中学教师，他出去放牛，像我一样栽下去，他没能爬起来，第二天人们发现他躺在沟里，死得硬梆梆的。那时，生命脆弱得就像肥皂泡，好好的，一晃眼，没了！

那两年，我最渴望的是当一名炊事员，到厨房煮饭，如果当时有人给我这个工作，并问我愿不愿干一辈子，我会斩钉截铁地回答：愿意！

1961年，我被调回重庆，分到重庆建工学院干杂活，我先后干过工具保管员、收发员、图书管理员等等。文革自然又挨了无数次斗。

我讲两个文革时我经历的“小花絮”吧。

那天，我又到双巷子理发店理发。理发师傅慢吞吞地抽烟喝茶，不理进门的顾客。我正纳闷，突然，一个胖理发师站起来，大声吆喝：“站队！站队！”

大家不知出了什么事，迟迟疑疑地站起来。先来的两个人，以为马上就要理发了，坐在理发椅子上不动。

“你们是聋子吗？下来！”师傅朝他们大吼一声。

接着，胖师傅像在操场上喊操那么神气，提高嗓门喊：“立正！向右看——齐！”

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正是造反派霸气十足的时候，不知这个师傅是哪一路的神仙，谁敢不遵命？

队排好了，师傅又高声喊报数。总共不过七个人，一目了然。

“拿出红宝书来！”师傅下令。

那年头，胸前戴毛主席像章，语录随身带是不成文的规定。

“念！老三篇。”

他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小小理发室，朗朗读书声，仿佛成了小学堂。

该演完了吧？先来的两个人，赶紧占理发椅子。不料又遭到训斥，师傅命令他们站好，审讯似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小学教师。”

“出身成份？”

“地主。”

这下糟了！

“给我排到后面去！”

如是问第二个，第三个，结果相同。

快轮到我了，我好心虚，但表面装镇定。我倒不怕敬陪末座，怕的是给我剃阴阳头，那时走资派被剃阴阳头敲锣打鼓游街是常有的事。我只好说慌了，我响当地说是革命干部，结果我后来居上，第一个理发。

从那以后，我再没进过理发店，我自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让我女儿学着替我理发，直到今日。

另一个也与家庭出身有关。

我认识土木系两个同班的学生，文革前，他们在一块学习，打球，逛街，关系很好。文革开始不久，甲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乙因出身不好，靠边站，两人疏远了。

一天，在教学大楼前，我看到这两个学生，甲昂首阔步，走路一阵风，刚好乙迎面走过来。甲看到乙，喝令他站住，要他报出身成份。他很清楚乙的家庭出身，他是故意刁难。

乙低下头，低声回答：“小土地出租”。甲厉声说：“什么小土地出租，地主恶霸！”他命令乙就地站住，没得到他的允许，不准离开。说完甲扬长而去。

乙果真原地站住，一动不动。

这是发生在上午十时左右的事。下午二时左右，我特意去看，他果真还站在那里，一位教师路过，问清了缘由，同情他，说他真傻，劝他别站了。但一转念，又说：“还是等他来吧！”这位教师不敢作主。

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再去看，他仍然站在那里，虚弱不堪但不敢动弹。

五、知识分子

在我60岁那年，终于宣布平反，调我到四川美术学院任院长。

离开建院时，开了一个十分僵硬的“欢送会”——大家还不适应把一个认识了十八年的“敌人”当同志。

我在“欢送会”上讲了一个人——建筑系主任、教授叶仲玠。

我给你讲讲这个教授吧。

叶教授五十年代初从美国回来，一心报效祖国。在全国高等院校搞院校调整时，叶仲玠从工作出发，对此提过不同意见，1957年因此被打成右派，被反复批斗。七十年代新生进校，要上“阶级斗争课”，要学生仇恨“敌人”，又把叶抓出来，给学生练兵当靶子，又斗又打，

他还被勒令在过道睡地铺。那正是严冬季节，叶仲玠本来就患气管炎肺气肿，顶不住寒冷袭击，他昼夜咳嗽，咳得脸色发紫。一整十多天，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就是这样一个人，天天到图书馆来翻译资料。

那时我在图书馆管理外文杂志阅览室。那段时间，只有两个人是阅览室的常客，一个是精通六国文字的周教授，另一个就是叶仲玠教授，两人都是右派。

叶教授还没进门就咳，他的年龄不算大，但骨瘦如柴，面容憔悴，走路轻飘飘的，活像幽灵。我每见到他，心里总禁不住想，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进阅览室了吧。

他一边翻译一边咳嗽，我劝他，说你又挨斗又有病，何必这么辛苦。

他说：“我的日子不多了，打算趁还有一口气，把计划翻译的三本书，赶快译完。”

接下去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当年他从美国乘船回国时，看到轮船的甲板上有位九十多岁的日本老人，天天顶着烈日翻译一部希伯来辞典。他问老人，干嘛这么辛苦。老人回答，他来日不多，要赶紧做点事，这辞典很有价值，要留给后人。叶教授说，现在轮到他了，他也应当尽快把这三本很有价值的书译完，留给后人。”

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赶紧转过身去。

那段时间，我坐在图书室，心是悬悬的，生怕哪天那咳嗽声突然消失。

它终于消失了，叶教授没能等到平反。

当时，我问在座的人，这种知识分子是坏人吗？是共产党的敌人吗？

这是我当右派20年后第一次当众发表的肺腑之言，我哭了。

最后再说一下黄贤俊。他进牢房后，公安局发现他的确是真疯，但公安局说，你是上面定了的人，没办法。他被关押了好些年，放出来后没工作，无家无室，流落街头。1979年右派改正后，文联找过他，打听到他曾在码头上干过活，后来死在街头，尸骨已无法寻找。

九十年代，他的哥哥从台湾来找他，文联介绍给我。我详详细细地讲了他弟弟的情况，他泪流满面，问我可不可以录音，我说：“你录，都录下来。”

采访时间：2001年12月5日 地点：四川美术学院

采访后记

龙先生已经83岁，但仍然堂堂仪表，颇有大学知识分子的气质。

老先生滔滔不绝，从上午九点直谈到下午四点。

此时，整他的李井泉、任白戈已经走完了“革命道路”，他为之挨整的黄贤俊、张文澄先后撒手尘寰，他整的右派刘盛亚也早在峨边魂散形消。恩恩怨怨，已是历史陈迹，然而一个“整”字仍鲜红地烙印在心头。

中午吃饭时龙先生说：“有个工程师的妻子，坚决不准丈夫入党，放言说，要入党就离婚。别人问她为啥，她说：‘我不要他成为整人的人’。你看，党的形象到了什么地步！”

其实，它什么时候是“好地步”呢？翻开那一本血红历史，每一页上，血淋淋一个大字——“整”。

黄贤俊也许并没有说疯话，他脑子里的确被“整”进了一部机器，机器名叫“无产阶级专政绞肉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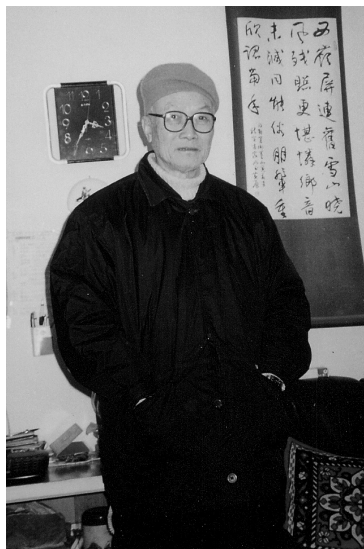
这部机器还在转动，日复一日发出隆隆“整”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张志新被割开气管，到2000年李松禄被割断舌头，从“六四”街头喋血，到“法轮功”牢中呻吟，机声隆隆，“整”声阵阵，正未有穷期！

龙实已经老了，来日不多。

“机器”呢？

补记：

龙实先生2015年在成都去世。他去世前（2013年1月）我为调查刘文彩《收租院》泥塑真相又一次采访了他。



接受采访的龙实先生
(离休前为四川美术学院院长)